

# 中共党史资料

忆陈独秀与安徽党团的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

唯一健在的中共六大正式代表谈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

邓小平与六大期间的留守中央

我和“三家村”

首次公布：

有关罗易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密电的历史档案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庶是怎样被迫认为烈士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66

总第六十六辑

1998年6月出版

D239  
6266

0100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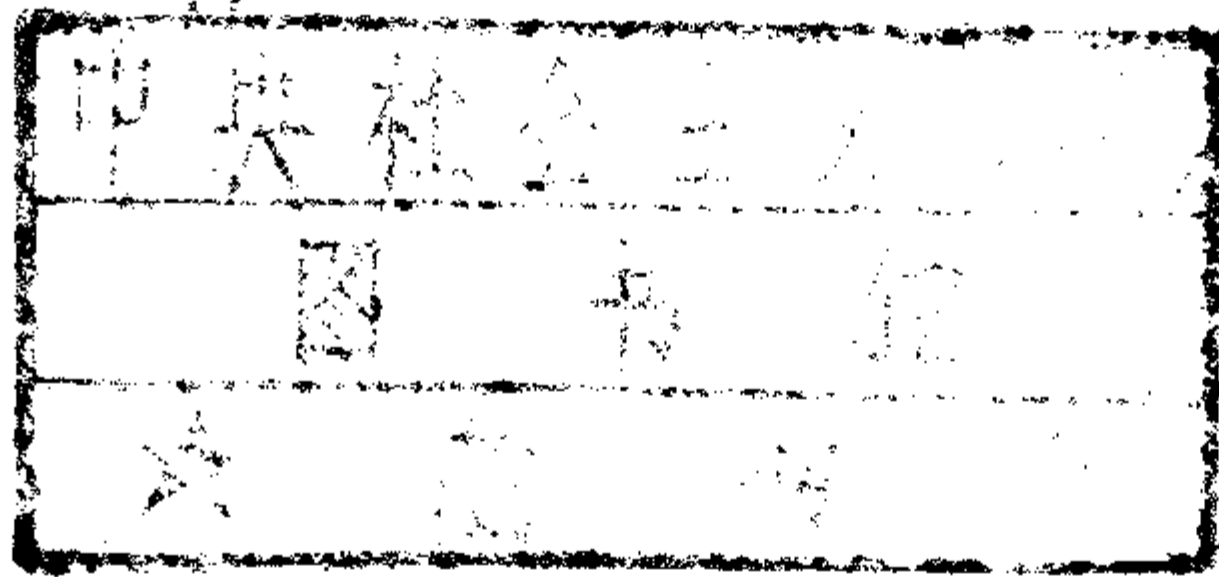


\*201004037\*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年·北京

DH84/5222

## 目 录

### 文献资料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纪要

(1928年6月18日) ..... (1)

### 回忆录

- 忆陈独秀与安徽党团的建立 ..... 濮清泉(10)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上) ..... 罗章龙(17)
-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 ..... 唐韵超(49)
- 我和“三家村” ..... 李 筠(58)

### 专题资料

- 邓小平与六大期间的留守中央 ..... 牛桂云(82)
-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 王 文(92)
- 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 ..... 苏 格(113)
- 知青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 史卫民(130)

## 人物介绍

-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庶是怎样被迫认为烈士的  
..... 钱文益(139)
- 邓小平担任过哪些重要职务..... 王乃德(141)
- 周恩来在苏区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 辛崇贤(157)

## 文摘资料

- 邓小平与高校招生制度的恢复..... 何东昌(162)

## 史实考证

- 一个值得查证的重要史实  
——初期推动陈济棠同红军谈判的中共使者 ... 力 群(166)
- 也谈刘晓何时到上海任地下党负责人..... 翁三新(171)

## 档案译介

- 有关罗易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密电的  
历史档案..... 路 远 选译(177)

## 译文选登

- 在中国的经历及其他..... [越]胡志明著 洪左君译(189)
- 新书选介 ..... (202)

封面照片：莫斯科市郊的中共六大会址（陈 夕摄）

封面题字：舒 同

#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纪要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1. 宣布开幕(大鼓掌)
2. 唱国际歌
3. 通过秘书处、审查委员会、大会主席团名单
4. 追悼牺牲了的同志

×发<sup>①</sup>同志致词：

同志们：我们党在一九二七年五次大会后，我们党的同志与一切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等敌人奋斗。在战场上成千成万牺牲了的工农群众与我们的同志，以及许许多多的同志受异常的残酷的刑讯，或拿到监牢里的，到处都有，这种名单都不能详录，特举其重要的人所共知的来说，……其余广东南昌江苏两湖几次暴动的死的英勇的烈士非常之多，我们大会对于过去死难的同志和其他的烈士，英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当表示热忱的哀悼，我们应当全体起来默哀三分钟。

5. 致开会词

---

① 即向忠发。

×白<sup>①</sup> 同志致词：

我今天是以前五届中央名义向第六次大会致开会词。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革命在我们党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中间，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自从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蒋介石，公开宣布叛变革命以后，先后在沪粤实行大的屠杀，使革命遭受重大失败。嗣后武汉政府的叛变，革命的队伍由南昌暴动而到广州的暴动，更牺牲了很广大的革命战士，这算是第二次的失败了。其次则由广州的暴动的失败而转到一个更为严重的状态里，一切的反革命力量，无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都是一致的行动，来压迫我们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这算是第三个失败时期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与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的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是含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当时中国的革命，进展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中，阶级的冲突，益加显明，因此，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不能不先后叛变革命而变为反革命，国民党更为一切反革命的中心和帝国主义的新工具。在这种大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曾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与敌人奋斗，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可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党的中央不但不能领导群众加紧这种英勇的斗争，解决当时的重大任务，并且自己陷入了机会主义的迷途，使革命受

---

① 即瞿秋白。

莫大的打击。说到这里，我们就很明白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不像顾孟余、陈公博、邓演达等所说的跳过了时代的要求，而是中共中央走了机会主义的道路。好在我们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和中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情绪高涨中举行了“八七”会议，得在组织上极力纠正机会主义的根基，在工作上开始走上了布尔什维克的道路，现在到了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到了完全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使本党走上很健全的地步了。

目前敌人虽然还是很强地向我们压迫，可是我们却能从波尔雪维克的路线上，工农密切的关系上，国际正确的指导上，坚决地英勇地与敌人作继续不断的斗争，而期达到完成中国革命，进而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们党不但能够是中国革命的担负者，而且要是一个国际革命的担负者。所以这次大会的意义，不仅关于中国革命是很重大的，关于世界革命也是很重大的。因此，希望大会全体同志都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党，而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倾向。

此外，还有一点要重复说明的，就是中央在前天会议上，提议向大会要求追认“八七”会议，及在“八七”会议所接受国际的指正案。尤切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固然“八七”以后，已逐渐将机会主义肃清了，但事实上政策上一切主要问题上，尚有许多不大正确的倾向，如盲动主义、先锋主义之类，这些也是妨碍党的进行的。因此，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

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形的机会主义，使党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觉悟者，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定能够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纠正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的指导下完成中国革命进而完成世界革命！

## 6. 致祝词

### A、第三国际代表祝词：

同志们！我代表第三国际致敬礼于中国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之前。伟大的中国革命，使各国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都表同情，因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及资产阶级伟大的热烈的斗争，中国的革命不是民族的而是含有世界革命的意义。虽然有意大利法西斯蒂巴尔干半岛，有资产阶级报纸麻醉他们，但他们知道并且希望广大的中国民众运动是可以消灭帝国主义的，如英帝国压迫下的印度，法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安南，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尼加拉瓜都是很勇敢地起来作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中国革命是站在同一战线的，这不独弱小民族如此希望中国革命成功，就是西欧的无产阶级也正在热望着、援助着。

国民党叛变后，成千成万的工农被残杀，他们现在都很明了国民党是反革命的、是残杀工农的，所以许多群众都环绕于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在中共反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间，也曾有过很大的困难，就是内部曾发生机会主义，可是现在却已经走上正



确的路线。同志们：我们对于中国的帮助是有的，但是还不够，我们必须使英法日各国无产阶级起来，要求撤还驻华海陆军，现在这种运动多少有些结果，因此帝国主义感到这个联合战线的可怕，因为这样广大的工农的斗争，是一定可以达到工农政府的实现。

中国党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组织更广大的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过去在两湖上海广东各地牺牲了很多的同志。但是他们都是为创造新的中国、建设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我们庆祝将来中国革命的成功。

B、意大利共产党代表祝词：

同志们：今天我代表意大利的共产党致无产阶级的敬礼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

中国共产党在秘密困难和白色恐怖情况之下，进到反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资产阶级的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是非常重要的。

在意大利的乡下和工厂里，虽在法西斯蒂压迫之下，而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还是一样的表同情于中国的革命！

以前在国民党未叛变前，革命军前进一步，即以为是自己胜利一步一样，及至去年部分的失败时，也好似感觉是自己失败一样，他们相信中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的困难，完成他伟大的历史的任务。

现在此地的大会，是为的计划未来的工作，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在第三国际指导之下，及苏联共产党帮助之下，

完成其伟大的使命。并相信中国革命不但可以很顺利地成功，而且可以很顺利地推动世界革命的成功！

### C、联共代表祝词：

同志们：我代表联共中央向中国党第六届大会致祝词，并希望这次大会能得到很好的成绩。

各位同志离开中国到此地开会是很不容易的。目前中国的白色恐怖，这种亚洲式的屠杀，是最残酷的，世界找不到的。中国一些新军阀有些曾到过莫斯科的，现在都变成残杀工农的刽子手。军阀帝国主义一切反动力量一齐向中国工农进攻，我们代表中国劳苦工农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但中国革命决不因这种压迫而低落的，在这次大会可以见到各位热烈革命的情绪。

同志们！我们不独要用愤激的态度反对敌人，而且要用冷静的头脑解决一切所有的问题。

一切反动势力，他们有钱，有枪，有刀，使我们最好的战士都在白色恐怖中牺牲了！

联共以前的牺牲与中共目前差不多，那时俄国所处的地位与中共的地位差不多，他也在欧亚之间，那时也曾受了很大的牺牲，在大战中间艰苦的领导群众作英勇的斗争，得着历史上空前的胜利。我们要很好地应用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策略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得着最后的胜利，这是列宁同志所教训我们的。

我们应更广大地组织工农群众，坚决地准备工作，以待新的革命的潮流的高涨。资产阶级有钱有枪炮，但我们有帝国主义所没有的、得不着的大炮，这大炮就是群众

(鼓掌),我们应好好地组织群众(鼓掌),每一分钟,时时刻刻准备我们的重炮,将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打得他永远不会翻身(鼓掌)。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大鼓掌)

D、少共国际代表祝词:

同志们:我代表少共国际向中共六次大会致欢迎词,特别欢迎中国各地的战士,因为许多代表都是各地工农群众的组织者,曾经领导许多工农群众在两湖广东江苏各省实际工作,及指导暴动的同志,大家现在一齐讨论实际工作问题,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很好的结果,少共国际相信中国少共是个国际很好的支部,定可给党很多的帮助,给以很多的工作人才,很能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在大会的日子,我仅代表少共国际,庆祝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E、中国少共中央代表祝词:(X应<sup>①</sup>)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革命唯一的指导者——中国共产党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开幕的一天,这次大会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中国革命是在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发展起来的,中共也同样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而扩大的,可是革命的深入,使一切的反革命如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者,都在反共反工农反革命的一致行动下,团结起来,向我们进攻。同时中共中央又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不能遵照国际的指示以促进

---

<sup>①</sup> 即关向应。

中国的革命，这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了这个缘故，中国少共曾在很短的期间内，离开了党的指导，可幸伟大的党终于能够很迅速地纠正自己的错误，肃清机会主义，领导暴动和斗争。中国少共马上得到其伟大指导者的正确指导，继续一切青年运动的斗争工作。现在我们伟大的指导的党，开第六次大会了，我们相信从此更能加紧地布尔什维克化，走上正确的道路，完成他伟大的使命——中国革命。我们今天代表中国少共请求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起来注意青年运动，解放中国一切被压迫的青年！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万岁！

F、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致祝词：

同志们！我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向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致极诚恳的敬礼。中国工人阶级过去英勇斗争的历史，曾经摇动了统治者——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地主的基础。现在工人阶级经过了几次失败，但是工人阶级还在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团聚自己的力量，准备对敌人作最后的战斗。中国共产党——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领导，将要在新的高潮里，尽他的指导的作用，领导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过去有许多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必定能够扫除这一切过去的错误，确定正确的方针，来领导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作最后的斗争！大会接受我们的诚恳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唱少年先锋队歌

8. 散会

# 忆陈独秀与安徽党团的建立

濮 清 泉

安徽党、团组织的建立，都是由陈独秀直接领导和促成的。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发展全国各地党组织就作了明确的分工。北方由李大钊负责，南方归陈独秀主管。那时人们说“南陈北李”，不仅指他们的政治声望，从组织上也大体上是这样分工的。我记得当时有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高悬耀古今。”在南方，陈独秀和张国焘具体分工负责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的组织发展工作。又因为陈独秀是安徽人，他和安徽的进步知识界交往甚密，所以安徽的组织发展工作也由陈独秀负责。

当时，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后称总书记），工作很忙，不能亲自到安徽来。于是他派柯庆施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安庆，具体负责安徽的建团、建党工作。

柯庆施是在1923年7月到安庆的。他带来的几封信是给省教育厅厅长江彤侯、国民党左派朱蕴山、法专校长

光明甫等人的。他们同陈独秀交谊很深，陈托他们关照柯庆施。柯庆施凭这些关系住在省教育会内，以教育会为掩护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柯庆施还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是陈独秀的表弟，当时任安徽学联的委员。陈知道我参加过“六二”学潮、驱逐省长李兆珍、声援“二七”罢工等斗争。他在信中叫我不要闭户读书不问世事，要为改造中国奔走呼号。让我和柯庆施商讨在安庆建团事宜，建团后再择忠实可靠者建党。我记得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大学生肯定少于中学生，万不能只图量而不图质。”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的联络暗语称共产党为“大学”，青年团为“中学”；“大学生”指党员，“中学生”指团员。

这里需要说明，早在1921年，蔡晓舟、刘著良曾在怀宁县学宫组织召开过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会议，方乐舟、舒传贤、童汉璋、王步文、宋伟年、许继慎、王先强、胡养蒙、余大化等人参加了那次会议。情况报到中共中央，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承认。后来听说是因为这里面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中央没有批准。

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正式派到安庆建团的。当时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经常和陈独秀一起工作。中央在安庆建团、建党，是由于安庆学生运动一开始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有了建立党团组织的基础，进一步推进安徽革命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柯庆施到安庆以后，就和我商讨建团工作。我把安庆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并到各中学找可靠的人分别和柯庆施见面。我首先联络的是六邑中学的王步文，他是省学

联委员；还有甲种工业学校的濮德毅，他也是省学联委员；舒传贤，他是省学联第二任会长；以及许继慎和杨溥泉等（许和杨后来都转入一师）。柯庆施分别和他们谈了话。那时柯庆施虽然不是党的理论家，但在我们看来，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老前辈了，大家都很敬重他。

经过分析和讨论，决定正式筹建团组织。1923年8月间，在省教育会三层楼上靠左边的最后一个房间里，柯庆施召集濮德治（我当时的名字）、濮德毅、许继慎、舒传贤、王步文、杨溥泉等，开了一次建团商讨会。会上，柯庆施讲解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强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要遵守铁的纪律，要有为革命事业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那时对于团员的要求等于对党员的要求。柯庆施说现在人数太少，他要求大家努力联系可靠青年，工作中既要胆大也要心细。到条件成熟时，再召开成立会议。此后，大家奔走了1个多月，我们的人数有所增加。柯庆施认为时机成熟了，就决定在菱湖公园的湖心亭召开建团成立会议。

1923年9月的一天，下着濛濛细雨，我们分头乘小船到菱湖公园湖心亭上，举行建团成立会议。会议由柯庆施主持，参加会议的除上次筹备会议的全体人员外，一师增加彭干臣、高永春、姚光鼎、杨兆成、黄新富（即黄德邻），其他如甲种工业学校、六邑中学、高中（即大渡口中学）等校，也都增加了一些人。当时到会者共25人，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清楚楚。

这次菱湖会议，将安庆团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安庆支部，直属上海团中央领导。会上，大家推举柯庆施为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考虑活动方便，按照团员人数又划分了4个分支。一师设一个支部，由我兼任支书；甲种工业学校设一个支部，濮德毅任支书；六邑中学设一个支部，王步文兼任支书；其他各校合组一个支部，舒传贤任支书。舒传贤是甲工的学生，因为他是活动积极分子，能跑路，所以让他担任联合支部的书记。

安庆建团以后，陈独秀写信告诉我们：组织发展工作要重质不重量，团的工作要以工运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所以我们支部的工作是工运第一，学运第二，妇女第三，农运第四。那时团员们理论水平低，虽有革命热忱，对旧制度不满，对新社会憧憬，但不知道怎样革命。而且北洋军阀统治压迫严重，实际上工运、妇运、农运一时开展不起来，只有学生运动开展了一些工作，起到了一点星火的作用。那时，团员们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理论，而能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太少了，除中央传来的《共产党人》、《中国青年》等刊物外，很难读到自己想读的书籍。团组织的一项任务是争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可靠的青年参加团组织，到1923年冬，安庆的团员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人了。

也就在这一时期，根据我们汇报的安庆情况，陈独秀写信给柯庆施，指示可以建立党组织了。安徽最早的党组织是在柯庆施的筹划下，经我和王步文的努力协助在安庆建立起来的。

安庆建党的时间是1923年12月，地点在安庆北门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的前进堂屋里。关于建党地点，有人说在省教育会三楼左边的后房里，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可能是和建团筹备会闹混了。当时我们对于建党地点考虑得比较仔细，我们认为县学宫不合适，菱湖也不合适。省教育会虽然保护学生，支持进步运动，但省教育会是几个公团的所在地，人来人往，非常繁杂，也不合适。大家议论了很久，也没有确定地点。柯庆施提议在万安局一号借我们濮家老屋开会。他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万安局一号，地处北门后街孝子坊，是座百年老屋，共三进。前进是濮德毅家，后面是我的家，中间由我们的姑母俞家租住。我们三家的家长都是不问世事信佛的老先生，一年四季来客极少，十分僻静。还有另一优点，万安局一号前门在孝子坊，后门通另一条街，一拐弯就是北门。如果前门有什么动静，大家可以从后门出去。一般人不知道这座房子的后门在什么地方，作为会址十分安全。所以柯庆施说：在我看来，你们濮家老屋很合适。濮德毅和我都表示欢迎。这样就决定建党会议在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召开。

根据陈独秀的“大学生”应少于“中学生”，“不要只图量而不求质，宁少勿滥”指示精神，那天参加建党成立会议的只有10人，他们是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治、濮德毅、许继慎、杨溥泉、舒传贤、彭干臣、高永春（高一涵的堂弟）和姚光鼎。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然后致词，说明党和团的关系。那时，我们第一次听到“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第一次听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是

群众组织，团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革命作用”。柯庆施还强调说，做一个党员，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必要时能够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以捍卫党的事业。听了柯庆施的讲话，大家都非常兴奋，立誓要为实现党的伟大目标奋斗到底，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柯庆施为党的书记。关于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王步文和我都提议另选他人担任，当时我们认为自己理论水平太低，工作能力也不够。但是，大家认为建团时间不久，王、濮二人已经比较熟悉团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而且当时大家觉得党团组织就是一回事，所以大家主张还是以秋天建团时的那套组织领导机构，作为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兼管团的工作，柯庆施也表示同意。于是会议决定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第一师范设立一个党支部，彭干臣任支书，党员有我、高永春、姚光鼐。甲种工业学校设一个党支部，濮德毅任支书，党员有许继慎、杨溥泉、舒传贤。另外一个党支部由一中、甲种农业学校等几个学校合编而成，由舒传贤任支书。

安庆党组织建立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安庆支部，直属上海党中央领导。它下面有三个支部，所以它本身具有总支部的性质。中央的党内通令、通报、通告、学习材料等都是从上海发来。我还记得党团组织和中央联系的一些暗语，如“大学”指党组织，“中学”指团组织，“总店”指中央，“分店”指地方组织，“民校”指国民党。被捕叫“进医院”，案情不大叫“伤风感冒”，案情较大叫“要动手术”，被

杀叫“病故”，要上面派人来叫“请来结账”。

安庆建党时的党员只有10人，到1925年9月我去日本时，已增加到30人。我记得杨兆成是1924年入党的，李竹声（后成为叛徒）、薛卓江（后变为特务）、郭士杰、耿忱、方真、周骏（即周新民）、郑鼎，都是1925年入党的。

安庆党组织的负责人开始是柯庆施，1924年下半年，柯庆施调回上海。是年秋天，中央派薛卓汉、徐梦秋到安庆来负责党的工作。1925年初，薛卓汉去上海治病，党组织暂由李竹声负责。1926年，李竹声去武汉，安庆党组织的负责人是郭士杰。再往后，从大革命失败一直到1931年，都是王步文主持安徽党的工作。他对党的事业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兆成、郭士杰也是名垂青史的烈士。

安庆建立党组织之后，党立即积极领导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其他各项工作，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雨历程(上)

罗章龙

**编者按：**第一次国共合作距今已有 70 余年，其中物事纷繁，间或湮没在厚积的历史尘埃中，使后人无从知晓，因而亲历人罗章龙晚年的追忆弥足珍贵。罗章龙于 1995 年 2 月去世。本编辑部征得其家属同意，将其遗稿分两期登载。

1923 年至 1927 年间，在共产国际的动议和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合作。在当时，这确实是推动国民革命进程、争取革命力量发展的一个重大行动。

国共合作的原则，一经确定之后，在 1923 年至 1927 年之间从未改变。我因工作关系自国共合作动议开始后，中共中央为此召开的重要会议、做出的重大决策、发表的历次文告等等，大都躬于其事，并经中共三大中央局决定以中央局委员的身分在上海环龙路执行部以及北方执行部等工作了一段时间，回首往事无不历历如绘。爰述概要如下。

## 国共合作的缘起及经过

国共合作,从开始酝酿时说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事宜。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看法。1921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商谈建立新型政党、革命性新军队、国民党改组等问题。

1923年初,全国工人运动兴起,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与苏俄有了新的认识,下了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据张继后来对我说,孙当时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实际上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们当年开始搞革命、推翻满清时,策动群众仅百八十人,像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也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从这一点看我们不及共产党。”又说:“苏俄国力强盛,是当今社会主义大国,愿意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并赞助我们,可与为友。”

1923年3月孙中山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和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方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1923年6月12至20日，奠定国共合作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我当时以中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的身分出席。

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文件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从1923年至1927年都贯彻了这个决议的精神，原则基本没有变动。

在国共合作中，孙中山特别注重双方平等互助，首先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廷。孙对鲍的意见很尊重，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保留的一个文件，内容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廷的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足见其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

## 北 伐 经 过

1926年9月6日,北伐军克复汉口后,接着10月攻下武昌。不久,鲍罗廷、张特立、谭平山等先后来到武汉主持军政。同时,中共中央派陈潭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史文彬等赴鄂改组中共湖北区委,健全铁总、全总等工会机构,决定武汉工作暂由驻汉中央委员会同鲍罗廷共同商议办理。因此自1926年10月起,武汉政治党务主要由以上诸中委及湖北区委负责主持。

此次北伐第一路迅速成功,首先到达武汉,乃由于中共在政治方面政策正确,作战计划切合实际,将士浴血奋战等因素所造成。北伐作战计划以收复长江流域为第一阶段。布留该尔(即加伦将军)到武汉后,曾就第一阶段作战情况向中共中委和湖北区委作了一次详细报告。报告大意说:第一次北伐作战完全依照上年广州北伐筹备会议原则实施,一切经过大致符合要求。1926年7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誓师大会,动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共6个军(第五军李福林留守广州)。兵员55000余人。兵分三路,第一路以第四军为主力,向湖南进军(唐生智为副);第二路蒋介石自领,以第一、二、三、七军为主力向江西进军,鲍罗廷随行;第三路以第六军为主力,向福建、浙江进军。

第一路北伐进攻湖南,以叶挺所率独立团为主力,所向披靡。7月12日向安仁进军,在淶田击溃敌军一个团。



醴陵战役，独立团俘敌 300 余人、枪。攻至平江时，独立团与第四军三十五团联合击败敌军，俘敌 5000 余人，敌旅长陆潭毙命。8 月 21 日占领岳州，27 日在汀泗桥与吴佩孚主力决战。吴佩孚亲自督阵，决心死战，当场枪杀临阵后退的某旅长，枭首军前示众，以儆效尤。但我独立团轮番冲锋，用刺刀拼搏，苦战一昼夜，在双方重大伤亡之后，将吴军主力击溃，歼敌 4000，俘敌 2000，缴枪 4000 余支，军威大振。随即于 9 月 6 日进军占领汉口。独立团与三十五团进围武昌，于 10 月 10 日晨攻克，俘敌官兵 11000 余人，缴步枪 1 万余支、机枪 40 余挺、大炮 20 门。至此，第一路北伐军首先完成任务攻下武汉，前后历时 3 个月。布留陔尔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数字，详细地介绍了战斗的经过，并对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和中共党员在北伐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里补充一个故事，在汀泗桥战役后，吴佩孚兵力锐减，胜利大局已定，北伐军直逼武昌城下，部队原计划休整后再作进攻。这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匆匆赶来，因为攻下武昌将标志第一阶段北伐的基本胜利，蒋怕其他将领夺了这一头功，遂以总司令的名义坐镇武汉前线，要求部队不失时机，趁敌不备发动进攻。孰知武昌与汀泗桥不同，后者是平原地区，容易四围包抄，而武昌傍山傍水有城墙，状如铁桶，且守敌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固若金汤。而我军在苦战以后，士兵疲惫，急待休整。且在尚未熟谙地形的情况下，贸然进攻，结果伤亡很大，独立团一营营长曹渊牺牲，阵亡官兵达 170 余人。攻城不下，蒋介石亦

渐丧失信心，悄然离去，造成北伐中的一次小挫折。亦见蒋介石在用兵上之外行。后来我军改为围困武昌，先取汉口、汉阳，武昌被围经月，守军终于不支，独立团首先攻入武昌，为北伐战争立了头功。武昌攻下约1个月，蒋介石始克南昌。武汉吴佩孚军队的肃清，使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 吴佩孚败逃

吴佩孚战败后，仓猝率卫队千余人循汉水而上，逃往鄂北，意在入川依杨森、刘存厚以图再起。吴于1928年至大竹县，曾赋值长征诗，承认失败于工农之手，并表示忏悔。6月败逃再逃绥定投刘存厚。1930年5月，离绥定刘存厚赠吴2万元，被刘湘截击，中途困居檀木场，1931年逃往兰州，1932年到五原，随至包头，狼狈到达北平，依张学良为活，张月给4000元。1939年冬困死在北平，终年65岁。

吴仓皇离开汉口，其在法租界黎黄坡路寓所被没收，改作第八军特别党部办公处。吴寓为二层楼洋房，吴生平为官，聚其所得悉藏其中。计有商周铜器、汉玉、宋磁、善本古籍、碑帖、字画、端砚、钟表、麝香、人参、佛像等约500余目，3000多件。唐生智的副官宋英仲（湖南人）与我谈及此事，并出示一副麻将牌，系以象牙为底，钻石镶字，极为华贵。近闻吴所收藏的有史可法殉国遗书，真迹在美发现，为近代史的珍贵文物。书中首述清军兵临城下，决

心以死报国，次陈对老母未报养育之恩负疚至大，未向其妻言，劝其共同赴难。该遗书为梁某所有，梁系某人之军需处长。综吴一生，行伍出身，打仗是行家，迷信枪杆子。曹锟本无知妄人，吴有拥戴癖，尊之如师父，极愚忠愚孝之能事，对百姓平民则满面杀气。曩昔制造“二七”惨案事件，不出3年，至此已身败名裂。

又武昌城攻下时，敌军守将陈嘉谟、刘玉春遁入城内文华大学，想藉外力保护渡江远遁。该校党员即将此事向旧省委报告，转至独立团派兵包围文华大学，并责令该校校长孟良佐(外国人)交出二人。孟唯唯奉命，陈、刘二人遂被俘。后释放令其回乡。若干年后，镇海金志成同志曾向我谈及她家乡人从普陀来，说刘玉春后在普陀山落发为僧云。

武昌攻克后，影响所及，东南震动，首当其冲者厥为江西战局，急转直下，迅获解决。先是蒋介石率滇军朱培德(第三军)进军江西，9月20日攻下南昌。由于孙传芳反攻，南昌复失，蒋落荒而走，部队徘徊德安一带，不敢前进。蒋介石告诉蒋先云欲重整军队后再战，乃向武汉求援。蒋先云曾任蒋介石副官长，随蒋北伐攻南昌，后离江西来武汉，向我谈及此事。武昌攻克后约1月(11月4日)始攻克九江，乃回师再战，攻下南昌，江西局势始定。

武汉和江西两路北伐略如上述，至于东路出征路线，最先是第一军从广东东江向福建进发，经浙江达上海。驻守福建的北军将领周荫人，实力平常，又缺乏战斗意志，因此未经重大战役，何应钦、王柏龄师于12月占领福州。

之后,何等观望不前,且战且止,直至见到长江上游迭奏胜利,势如破竹,才随即于1927年2月17日攻克杭州,占领上海。3月进逼南京,孙传芳退往江北。龙潭战役后,孙遂下野。

## 收回汉口、九江租界

溯自1925年以来,反英运动在中国南部高涨不息,北伐出师指向长江流域时,英国政府就十分恐慌,接连向远东增援,戒备盖亟。1926年9月,英政府调地中海第三驱逐舰队来中国沿江布防,9月间英舰炮击四川万县,造成重大惨案。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英国军舰、鱼雷艇等麇集武汉江面达27艘,其他各国军舰合计35艘,以意大利凡帝开德一号为旗舰,炮衣悉行退去,昼夜生火,处于作战戒备状态。英帝国主义仇视武汉政权是十分明显的,武汉人民反英情绪亦日趋高涨。

1926年元旦,武汉各界热烈庆祝国民政府北迁与北伐胜利。武昌、汉口两地举行大会。人如潮涌,盛况空前。1月3日,英舰水兵突然登陆,袭击游行群众,刺死中国海员1人,伤10余人,引起群众义愤,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对峙局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消息传来,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省党部、中共湖北区委和群众团体均召集会议,派出代表前往现场注意事态发展。鲍罗廷连夜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委和湖北区委会会议商讨对策,就事态发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抉

择,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讨论直至深夜,大家认为英政府目前虽气势汹汹,但其在对外政策上也面临国内反对派的责难,它要顾及在华各地英侨的安全,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对立事态恣意扩大。当然关键亦在我们抗英之态度是否坚决!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1)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坚决抗议英政府的挑衅行为。

(2)支持国民政府对英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废除英政府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派军队进入英租界保护我国居民。

(3)由区委宣传部负责成立一研究国际法约的小组,收集中英关系和有关租约的历史资料。为扩大反英宣传、批驳帝国主义的种种谰言作好准备。

(4)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对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4日,数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在省委和省总工会领导下,工人纠察队同志率先与到会群众冲入英租界,与英巡警发生冲突,群众怒逐英巡警,高呼反帝口号,声震于衢,英警见群众威势极大,纷纷逃匿。接着租界内商店罢市、工厂罢工、学校罢课,市民齐集街头响应,英驻汉领事希伯尔·郭飞(Herbert Goffe)见状大惧,狼狈从后门化装登上江面英国军舰,并派人向武汉政府致意,请求保护个人安全。郭对中国态度素极傲慢,现在忽表软化。

我与宣传部同志亦随众前往英租界,至英领事馆,已十室九空,仅留一教士家属守门,见到我们十分恐惧,我

们对她宣讲政府保护守法外侨的立场。她听后连连点头，并说领事留有一信，望转交政府云云。

当天下午，国民政府派兵进入租界，维持秩序，卸下英米字国旗，人心大快。连日来，武汉群众纷纷结队进入英租界游行庆祝。一次，群众在路经原德国领事馆现为鲍罗廷的寓所时，鲍立在临街的宽敞阳台上，挥手向群众致意，并操英语向市民作祝贺演讲，张太雷代为作了传神的翻译。时我亦在侧，代表中共省委作了即席发言，表示庆贺，群众欢呼雀跃，经时不止，群众革命热情鼎沸数日不绝。

与此同时，九江英租界亦发生类似事件。在汉口群众的影响下也一举收回，英政府终于被迫承认国民政府要求交还汉口、九江英租界，当然其中还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外交谈判，颇费周折。由于群众拥护，国民政府态度坚决，英国政府试图反扑但终未得逞。

##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与 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1927年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参加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的中委有30多人。国民党中央委较著名的有谭延闿、宋庆龄、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公博、邓演达、陈友仁等。跨党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林伯渠、于树德、杨匏安、毛泽东、韩麟符等。三中全会选出中央常委9人：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徐

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平山等。谭平山为中共提名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中共党员虽只占 1/5 的少数，但主要决策均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鲍罗廷以高等顾问名义参加联席会议，实际上拥有否决权。国共联席会议是在 1926 年 5 月 15 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定设立的。

武汉政府组织在汪精卫未到武汉前，分工为：政务委员会主任邓演达、财务委员会主任陈公博、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王维焘（京汉铁路局长）、教育部长孙科、卫生部长刘瑞恒、农政部长谭平山、劳工部长苏兆征、司法部长徐谦。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仅出任劳工、农政二部部长，在省府则仅任工农厅一席。农政部原议为农民部，旨在推行土地改革政策，组织农民协会。但汪精卫、谭延闿等认为目标太显露，不如改称农政部较为含混。中共中央勉从其意，而实际上面目全非，农政部被架空，遂成为闲曹，但一切有关事务仍由各省农协自理。谭平山在部办公只是橡皮图章，签发公文而已。农政部设置有土地委员会，委员虽多左派，但无实绩，外界讥为委员会，谓其推诿不负责任。劳工部原拟推史文彬担任（史为党龄最长的铁路工人，京汉铁路“二七”斗争的工人领袖，方从保定狱中释出不久）。因史谦辞，改推苏兆征，史任司长。1927 年 2 月 21 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办公地址在汉口南洋大楼。

湖北省政府人员为：詹大悲任财政厅长、李汉俊任教育厅长、董必武任工农厅长、张国恩任民政厅长、危浩生任秘书长。

## 《汪陈联合宣言》

1927年4月8日深夜，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次日清晨召集原在武汉中委谈话，听取汇报并略述上海局势。第3日即4月10日上午在鲍公馆正式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仲甫在会上就当前政治形势作报告。内容分为几项：(1)上海工人暴动失败后的局势。(2)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商谈经过。(3)当前关于武汉工作进展诸问题。陈强调：就当前政局观察，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颇关重要。先是1927年4月3日，汪精卫自欧洲返中国，抵上海后即往晤仲甫，商谈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时北伐军已于3月21日占领上海，25日克南京）。汪陈二人会商结果，决定发表两党合作宣言，在上海各报公布。

该宣言发表于1927年4月5日，综其要旨为说明“共产党坚决承认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问的重要。”无产阶级独裁制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不怀疑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最后劝告两党同志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

中共中央开会时，仲甫报告商谈经过时说：当时上海革命危机在酝酿中，宣言真正旨意在争取舆论向蒋介石示威，使蒋孤立。同时奠定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基础，始



克完成国民革命。在中央会议上鲍罗廷说：“宣言非常正确必要，且极有力量，符合国际指示。”宣言所谈上海事虽未明指蒋介石，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眼人一见便晓。宣言对武汉政府一字未提，实则给予武汉政府很大支持。事后证明宣言使武汉国民政府延长了约百天的政治生命。

## 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及其工作

在4月10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曾决定下列诸事：(1)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2)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行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3)重新布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1、中央与省委阵容：仲甫来到武汉后，中央及地方党委组织人员得到进一步充实。当时中央、省委与各方面组织主要负责人大致如下：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依次为中央委员张国焘、谭平山、罗章龙、苏兆征、史文彬、毛泽东、陈潭秋等，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秘书等部门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组织部兼宣传部长罗章龙、秘书长周唯真、工委书记林育南、农委书记陆沉、妇委杨子烈和军委顾顺章、叶挺、周恩来。省委各部工作人员有：澎湃、吴德峰、向警予、谢怀西等，汉口市委书记吴汝铭，组织许白昊、许之桢，宣传宛希俨、向警予，工委项英，农委陈荫英，妇委王亚璋等。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委员贺昌、关向应、刘昌群、李子芬、李求实等。参加国民党省政府人员为

恽代英、董必武、谢晋、林祖涵、谢远定、吴玉章、高语罕、宛希俨、于树德、毛泽东、谭平山等。

2、省委办公处：湖北省委办公处先在武昌粮道街尚书巷刘祠，后迁胭脂山原刘玉春公馆，省委房屋虽美仑美奂，富丽堂皇，但在武昌围城时，门窗、电灯、电线破坏无存，家具搬走一空，省委干部只好在地板上开地铺，并搬用砖石、木板垒成桌椅，作为办公用。

某次召开全市活动分子大会，请鲍罗廷作报告，因人数众多，桌椅奇缺，到会 300 余人乃以稻草铺地，席地而坐听报告。鲍入室见状，颇感诧异。会毕，鲍临行告省委：缺乏家具，对工作效率有碍，应设法解决，后来才分次租到一些木器，勉强敷用。

省、市委干部人数虽相当多，约近 300 人，但因工作繁重，每人工作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夜以继日，尚虑不足。大家十分劳累，又因伙食粗粝，营养不足，特别是 5、6 月期间，天气炎热，常露宿室外，精神益感疲乏。某夜，汉口市委干部齐集在江边趸船上开会，会毕露宿船头过夜。其中一位同志连宵熬夜失眠，天晓前，回到寓所时将通行口令忘记，被纠察队拘留。他精神困顿，就在拘留所地板上呼呼大睡，经部队人员唤醒查明，始知是省委干部，才让省委派人接他回去。工作劳顿尚且不说，常有意外事故发生。某次省委派人到前方劳军（京口），时值 5 月，正是风季，轮船中途遇到大风，白浪滔天，船本来就超载，几经摇摆不幸失事。仅带队的罗章凤（武汉警卫团党代表）、李鸣柯（军校大队长）等少数人泅水脱险，其余男女同志多

人遇难。

3、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直辖宣传机构有《民国日报》，由沈雁冰主持。《楚光日报》由宛希俨办理，宣传训练班由徐活萤（晴岚）负责。国民通讯社由邵季昂任社长。北伐宣传列车由袁达时任主任，汉口血花世界（民众乐园）由李之龙、唐性天主办。为印刷兼发行党的刊物、书籍起见，在汉口后城马路济生路口设立长江书店，由苏新甫任经理，并自设印刷厂，由毛泽民任经理。省委宣传部英文秘书原约定由范鸿劫担任，时范在北京。一月间范一度来鄂，我留范在汉工作，范云：此行告假一月，尚须返京一行，料理诸务，并在京结婚后携眷南来（其未婚妻为北京司法部员某之女）。我嘱其速去速来，范遂返北京。不料一去竟陷北狱，为张作霖所绞杀。

4、武汉的工人运动：省委调动党的优秀男女干部400多人，以全力开展武汉工人运动。在短期内成立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200余个，有组织会员52万人。并在宜昌、沙市、黄冈、黄石等县组织各级工会，人数超过20万人以上。省委宣传部先后在武汉各城市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500余所，参加学习人数前后4万余人。省委设立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派许之贞任所长，省委委员董必武等曾往工运所讲课，讲授地方党史、联合战线问题等。学生千余人，均为各产业工会会员，大部为党团员及工会干部，其中女工占1/3。武装纠察队轮流参加训练，有快枪三四百支，蒋先云任总教练。培养工会干部1千余人，地址在英租界一三

里,后迁黄陂会馆。

5、湖北农运:自1926年起,中国农民运动普遍开展,各地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春湖南农民协会有会员200万人,湖北亦近110万人。广东、江西、福建、河南各省农民组织和斗争均有发展。全国农协会会员不下600余万。1927年3月14日,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以鄂东各县为中心,有农协会会员280余万人,即在黄安、麻城、黄冈等处开展反抗地主恶霸运动。当地领导干部主要有邱群生、刘振一、王健、秦绍勤、郑位三、萧人鹄、蔡济璜等50余人。在黄安曾公审枪决大地主阮纯卿、李介人、张延英、吴惠存等,并解除地主团防武装,成立农民自卫队,为日后鄂豫皖农民暴动张本。

3月30日,各地农协代表在武汉召开全国农协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农民国际代表卜里茨(Blitz)、约克(York);湖北省农协代表陆沉、蔡以忱、陈荫林、郭树勋、符间一、刘子谷等;湖南省农协代表滕代远;江西省农协代表张兴万、方志敏;广东省农协代表彭湃;广西省农协代表谭寿林。当即决议筹组全国农民协会,统一组织,加强农民武装自卫,开展土地革命等议案。

广东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国民党中央搬迁到武汉,设于武昌北城黄巷,仍委毛泽东为所长,有学生数百人。发旧枪25支,7月15日后农运所解散,枪亦被缴去。省委主办农政训练班有学生500人,枪200余杆,政变后随军东下。

6、工农武装: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即全力组织与

开展工人运动和革命学生运动。1922年在工人运动高潮中,斗争渐趋激烈,在工会中工人纠察队普遍建立起来后,遂要求进一步建立武装队伍。当时条件局限于棍棒、刀斧之类,虽购有少数自卫手枪,但为数很有限(从洋行军火商处购进)。1923年“二七”罢工后,工会干部渐渐认识到工人武装的重要性,后来经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等革命运动高潮,由于革命需要,各地党与群众迫不及待,渐渐发展工农武装,同时提出改造旧军队的问题。

在几年时间中,党在南北各省陆续组织了一些武装纠察队,其中较著名的有京汉及津浦铁路工会武装纠察队,省港罢工武装纠察队,江西安源、湖南水口山、锡矿山等地工会纠察队,两湖农民协会武装纠察队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各项枪支总数在5千支以上,而且都是汉阳造的新枪。在工人纠察队方面,党十分注意组织训练、宣传教育、干部培养与武器供给等问题,并在工作中培育了一批武装干部。

同时我们也进行关于改造旧军队工作,比较为人们所注意的有叶挺、贺龙的部队,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学生队以及其他军事组织机构。当时接受党领导的军队总数不下5万人。还有不少军队在政治方面接受中共的影响,虽难以估计,但也不可忽视。

新建置的军队、武装队伍大都是北伐前后成长起来的。其中有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原驻武汉,后移防九江。第四军的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师长贺锦斋、贺炳炎)原驻鄂东地区,后移防

九江。驻武汉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政委罗荣桓)、张发奎部军官教导团(原武汉军分校学员改编)。在南昌方面有第九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等。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当时中央及各地主要党组织大都成立了军委的机构,罗致了一些军事专门技术人才,推动了这方面工作向前发展。最先是北方区委成立军事工作人员专门小组,其中有张隐韬(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郭增昌(山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骑兵连长)、茅延楨(安徽人,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张兆丰(河北人,西北讲武堂毕业,步兵营长)、郭寿生(闽侯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李之龙(湖北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金佛庄(浙江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上述诸人以外,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军官还有:刘伯承、段德昌、张云逸、刘志丹、李天柱、宣侠父、徐向前、周士第、粟裕、陈士榘、蒋先云、陈赓、李鸣柯、韦拔群、曾钟圣等,均属知名将领或后起之秀的革命军人。

7、省委军运:湖北省委干部有长短枪 400 余支,并经常从海轮上购买手枪子弹,以资补充。省委干部全体均参加军事训练,实弹射击,由蒋先云、陈赓等担任教练。湖北省委军委工作颇繁剧,武汉中央军校各军事机关、部队公安机关政治部各党支部武装工作党员凡 1200 余人,初由省委指导。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由校务委员会 5 人负责,名义上是汪精卫、谭延闿、侯连瀛、邓演达、恽代英。实际上驻校为邓演达、恽代英 2 人。各连队中 1/4 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主要负责人为李鸣柯、陈伯钧、许光达与张宗

逊等。余 1/3 为左派。7 月间军分校学生改编为教导团，属二方面军，在建立工人纠察队同时又在二十四师新成立教导队，有学兵 1000 余名（大队长孙树臣、副队长申朝宗、中队长李鸣柯，南昌暴动后改为警卫队）。

#### 8、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

在国共合作下的武汉政府时期，政府政令所及范围很广，推行革命政策，在财经方面，我们面临着种种难题。由于北洋军阀王占元、萧耀南等盘踞武汉历 10 余年，对人民敲骨吸髓，极尽压榨之能事，因此民穷财尽，饿殍载道，岌岌不可终日。

据说王占元家财值光洋千万元。萧耀南政尚贪污，其同乡部属无不满载还乡，一方称富，甲于东南。因此武汉民生凋敝，经济财政千疮百孔，混乱失序。加以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家幸灾乐祸，从中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大局糜烂，益不堪问。

北伐军光复武汉后，亟应更张，一新面目。这时帝国主义更是极力加紧经济封锁，中外资本纷纷抽逃，工厂关闭，造成经济危机，通货贬值更是阻力重重，无法前进。时省财政厅长詹大悲乃博访故旧，筹设财政经济改革委员会以从事财经改革事宜。该委员会聘请工会、农会主要干部和财政经济专家罗葛荪等 30 余人参加工作。他们厉除积弊，提倡廉洁政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清查财经部门物资，大刀阔斧实行扫除贪污，兴利除弊，奖励清廉，与民更始。又采取现金集中，增加生产，管制物资，节约开支，财政上开源节流，工会参与工厂管理，制止金融资本家反

政府的行动,作了大量工作,于是人心振奋,观感为之一新。

一次,在武昌司门口某处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销毁商场和税务机关的各种伪造账簿、私刻印信、伪造单据等,人心为之大快,人民对革命政府威信大大提高。

当时在武汉政府辖境内,劳动人民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小学教员工资晋级,一般市民物质文化水平也有显著改进。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迁鄂前后4个月内,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当时北京某报所记武汉通讯,谓如龙蛇起陆,虎兕出土,雷霆震惊,其声势浩大可以想见。但同时武汉国共合作政府亦正处在强大敌人威胁面前,革命蕴藏着严重的危机。

### 1、当前形势

中共中央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必须对内加强团结,对外动员群众,合力御侮,才能继往开来,引导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召开的。五次代表大会筹备事务主要由中央与省委秘书处联合办理,报告与决议等文件草案是在国际代表参加的各委员会进行制定的,筹备会决定了大会会场、大会主席团名单和标语等事务。在确定会议开幕事宜后,五大筹备处商议特约国民党中央谭延闿、徐谦、汪精卫等



人列席大会。仲甫让我前往邀约，我心嫌其人，颇有难色，因建议由代英捎口信通知他们到会，仲甫默默不悦。代英接言道：谭延闿与徐谦均为玉马金堂学士人物，徐与兄尚有同名之雅（指徐字季龙），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说，与他们实在无话可说。最后，乃由张国焘与我同行。与汪见面时，汪满口答应，但神不专注，谭延闿则首肯，连称一定到会参加。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正式召开。出席代表80人，列席4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团成员都出席了大会。自4月27日起至5月9日止，会议共历时13天。会场在武昌都府堤武昌师范附小风雨操场召开。风雨操场为一所砖木结构的平房，无天花板，设有讲演台，可容千人。主席台两侧悬有巨幅红布标语：右为“把国共合作进行到底！”，左为“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会场四壁主要标语如次：“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武力镇压中国革命！打倒世界资本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耕者有其田！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开幕时，由我代表会议筹备组登台宣布大会筹备会推荐的大会主席团24人名单，会场起立热烈鼓掌通过。这个名单包括的人数较多，代表性很广泛，这些人都是来自各方面斗争最前线的，这也是以前几次大会所未有的。随后由总书记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词毕由汪精卫

代表国民党致祝词，接着罗易致词。其他国际代表相继讲演，国民党代表谭延闿静坐台上，双目微阖，除闻声鼓掌外，终席未发一言。大会开幕仪式完成时，有人建议此次为建党7年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大会，宜摄影以留纪念，但未同意，遂作罢。

2、工农运动与党组织：仲甫代表上届中央在大会作工作报告，从报告中约略可以见到建党7年来革命巨舟正向涨满潮汐的大海航行。如1921年党成立时，党员寥寥可数，仅50人左右，现已成为工农民众的中坚组织，有党员约6万人，团员5万人，合计10万多人。革命工会会员几乎包括全国各产业工人。据1927年3月统计：中国南部各省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无锡、上海）、浙江（宁波、杭州）等省主要城市均先后成立了综合性工会，统计全国工会有会员290余万人。全国农民协会登记会员950万人，军队及工农武装力量近5万人。中共政治影响已遍及东南10数省几亿人口地区。

3、中心问题与决议：五大讨论中心问题见于下列几个重要决议，即：1)关于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国问题之决议；2)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3)土地革命问题决议；4)职工运动决议。前两项决议案是总的政治路线，包括决定国共合作、土地改革方案等问题，均以第三国际决议为蓝本，而且由国际代表与仲甫亲自起草。后两个决议由中央工委、农委起草，经过大会起草委员会讨论后由大会通过。主要精神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与施行工农民主专政。

第五次大会宣言由国际代表执笔(英文稿),主要内容强调工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斗争同时并进。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他们不自觉地趋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尚未进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现在的革命由于阶级分化与帝国主义干涉,必须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协作,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联合一致,农民必须与小地主建立同盟。革命政权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最后提到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革命。

大会选出 45 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中委 31 人、候补中委 14 人。

## 第二次北伐 国共分歧

北伐军克复武昌后,国民政府之一部自广州移武汉办公,政府组织初具规模。时蒋介石所率军队局促江西一隅,迭遭挫败,士气沮丧,蒋思回粤练兵,重整旗鼓,对武汉心怀嫉妒。适浙江、江苏二路北伐军进展颇速,孙传芳军心动摇,无力支持,且在武汉方面吴佩孚败绩,江西局势好转,于是蒋介石野心复作。

1) 蒋介石兔脱之一幕:先是 1927 年 1 月武汉政府电蒋邀其来鄂。1 月 9 日蒋自南昌轻装来武汉,本意在窥测武汉虚实,设法和缓反对空气,并希望暗中拉拢张发奎、唐生智及其他动摇军官,以为己用。蒋介石到武汉后见军民气盛,工农斗争潮涌,内部无懈可乘,意态颇为消沉。在

南洋大楼招待会上，鲍罗廷用教训口吻对蒋讲话，要蒋遵守党纪，服从中央，留武汉工作。蒋自以为身为总司令，当众受鲍训斥，极感难堪。但强自抑制，勉力支吾说，本人暂留南昌，目的在督促东路军事，与敌作最后决战。会后蒋连夜悄然乘自备小艇离汉口回江西而去，鲍闻蒋不辞而离武汉讯息，知事态蹊跷，颇以为悔，并预料蒋此番回到江西后，决不会从此罢休，但亦无可如何。当时外间猜测纷纭，谣言乘机四起。有人怨鲍鲁莽，不该当面斥蒋，无异打草惊蛇。武昌某支部老教员说：军事与政治对敌，本属阴谋勾当，因此采用公开激怒蒋的作法实在有失明智。古人说：机事不密则害成。鲍对蒋急不择言，无异纵虎归山，确属误事不浅。当时省委方面更有人责鲍何不当场将蒋扣留。但是春木说，此事关系重大，鲍个人不敢擅专，一定要请示国际，国际当时政策对蒋只限于运用公开批评方式，所以亦不会同意扣留蒋的办法，否则西安事变当在10年前演出。1月9日蒋脱离武汉，事后亦有人责备仲甫应负造成日后祸患责任，其实仲甫当时尚在上海，并不知蒋到武汉情事，鲍亦来不及将此事与仲甫商量，故仲甫实无由知悉。至于鲍罗廷因事出仓猝未能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致使时机稍纵即逝，事后亦自引咎。因此鲍后对人言：“自身积错可以沉舟”，殆与此事有关。蒋不满鲍罗廷由来已久，蒋在北伐前即表示苏联接济如送牢饭（即吃不饱，饿不死的意思）。北伐出师后，苏联已断绝供应，故蒋视鲍如眼中钉，自经此次受辱，遂于回到南昌后即来电致孙科等斥鲍专横，干涉内政，主张解除鲍顾问职务。

2) 武汉反蒋运动：时武汉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孙科、顾孟余等乘机主张欢迎汪精卫复职，树立自己一派势力。在中共支持下自2月中旬起，武汉开展反蒋运动，公布蒋介石反革命罪状，并提出：“提高党权，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等口号。3月9日武汉决定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并即电蒋参加，蒋如来武汉即可设法制服蒋。蒋知不利于己，拒不参加，一面派谭延闿来武汉周旋，同时积极布置军事，作与武汉决裂准备。谭到武汉时态度更变左倾，同时陈公博代表汪精卫亦来到武汉。于是在国民党左派名义下，三中全会按预定计划进行。在三中全会上，决定对蒋介石施行纪律制裁，揭举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口号，同时决定设立农政、劳工二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长并号召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坚决赞助工农运动等，由是革命联盟暂获巩固。

蒋介石在南昌闻三中全会对己施行制裁，大为恚怒，召集部下决定肃清江西、安徽、江浙中共势力。自3月初起，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工会领袖，破坏工、农会组织。蒋介石于3月11日在赣州主使杀害陈赞贤，3月16日在南昌、17日在九江、22日在安庆、24日在芜湖、29日在杭州等处先后袭击中共及工会组织，大逞残杀，而以上海四一二惨案为最著。当时上海资本家立即给蒋1500万元，预定事毕再给蒋3000万元。蒋如虎附翼，益逞凶残。4月12日后约1星期，罗亦农等自沪脱难来汉报告四一二惨杀情况。于是中央会议立即讨论对付蒋介石问题，当时决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惩办蒋介石。4月15日武汉国民党

中央通过提案,开除蒋介石党籍,国民政府下令革除蒋介石总司令职,以冯玉祥代总司令,唐生智为副司令,并下令通缉蒋介石归案究办。湖北省委根据决议,决定于4月17日在武昌阅马场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罪行,到会工农及市民共10余万人。会上群情愤激,国民党中委高某(中共党员)登台演讲,痛斥蒋介石反革命罪状,到会群众大受感动。高身材魁硕,声如洪钟,向会上群众大声斥蒋道:国民政府不是蒋某私人的马桶可以随着他屁股后面走的,只有他到武汉来服罪,听命于政府,断没有政府反去迁就他一个独夫的道理。时湖北省委即刊印《蒋介石裸体跳舞》小册子数十万份。该小册子系湖北省委宣传部秘书刘子青所写,历述自1926年3月20日事变起到最近止,蒋介石破坏革命的种种行动,分析透澈,痛快淋漓,邓演达阅后,大为动容,立予翻印10万册,遍发各军(该册底稿系政治部科长章伯钧从省委宣传部取去)。其他机关纷纷翻印,后蒋介石曾悬重赏通缉刘。但事经30年后郭某忽出头将此文著作权攘为己有,报章宣传误信为真,有人谓郭某此种行径实属冒名顶替,乃与杜少陵诗所称:公然抱茅入竹去……对面为盗窃无异。

蒋先云于4月从南昌来到武昌,向省委会口头报告蒋介石曾亲口对他所说过对于武汉政府的各项策划,非常详细。会后先云并写成一个书面报告长达万余字,在报告中他建议早作军事准备与蒋决裂。当时省委会上一致同意先云的报告,且有人谈到乘蒋目前羽翼未丰,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可将其制服,如此则东南半壁可以收

复,武汉政府进战退守措置裕如,并用潜力深入革命,北方军阀将无可施为。

3)东征问题辩论:讨蒋会后湖北省委开会讨论对蒋军事判裁问题,会上一致认为一纸褫职命令,徒托空言,于事无补,建议中央应速决定出师东征,捉拿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次日中共中央会议正式讨论东征问题,出席中央会议如国焘、文虎、荷波等主张迅速动员东征,否则养痍遗患。多数人发言一致同意主张立即东征,其理由:(1)全国正处于革命高潮,蒋破坏革命甘为贼首,讨蒋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于战事有利。且蒋初到南京,人心未附,军心动摇,预计师行所至,必有望风归顺者。(2)就双方军事实力言:李宗仁第七军 1.5 万人,第十六军 3.5 万人,赖世璜第十四军约 5 千人,浙军第十七、第十九军约 1 万人,皖军第二十七、第三十七军约 2 万人,叶开鑫暂编第五军约数千人,柏文蔚第三十三军约 4 千人,广东军团约 2 万人,以上合计约 12 万人,共有机关枪 150 挺,炮 60 尊,其中观望阴持两端者大有人在。武汉政府能直接指挥军队约 12 万人,其质量远胜于蒋方,且有强厚的工农群众组织为其后盾,故当前真正优势应属于武汉。(3)此外尚有一重大理由即如果东征可顺便将唐(生智)、张(发奎)军队送走,使他们向东南发展,后方扼守武胜关,可以全力深入工农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政治权力与武装力量,其利甚多。但会议上同时持反对意见者亦大有人在,反对理由是:(1)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对蒋首鼠两端,如汪、谭均不主张东征,他们说北洋军

阀未全部解决，国民党内部不宜用兵贻人口实。(2)出兵东征则后方空虚，恐北方军阀南下侵入鄂境。(3)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东南沿海帝国主义势力强大，目前应避免与帝国主义接触，否则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面前，不降即溃。此乃由于当时对帝国主义内在矛盾认识不清，过分恐惧情绪作梗，也造成对东征策略的犹豫与怀疑。其实当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尚无在远东引起战争的决心，省港罢工，上海工人暴动，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收回以及后来许多事实均足以证明。(4)最后理由是冯玉祥盘踞西北，拥有强大实力，冯对武汉信誓旦旦，可以为可靠的联盟者，所以出师北伐，把冯从陕西迎接出关，足以藉冯力以制蒋，将来革命形势有变化时，西北亦不失为缓冲地带，此即所谓西北路线的形成。因此中央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停止东征，改道北伐，北伐成功实行联冯制蒋，届时冯玉祥从北方出兵南下，直指金陵，蒋可以不战而服。但后来经过事实证明结果与此完全相反。蒋介石知武汉决定不威胁南京，他一方面利用四川军阀及夏斗寅等袭击武汉，一方面暗中与冯玉祥勾结反共，自是以后东南属蒋，西北属冯，武汉偏安，势难久持，此乃由于国际对冯信任过深，为冯所卖，以致一误再误，弄得全盘皆输，诚非始料所及！

4)第二次北伐成功与失策：东征既已中止进行，武汉国民政府乃决定誓师北伐(所谓第二次北伐)。第二次北伐仍以第四军为主力。1927年4月20日在南湖举行誓师典礼，随即第四军、二十军乘车北开。越二日我军出武



胜关,攻下信阳,5月26日师次临颖以重大牺牲击溃奉军富双英军,6月6日占领郑州及开封,打通了陇海全线,第二次北伐乃告完成。第二次北伐成功后,北洋军阀土崩瓦解。4月,阎锡山向南方投降。孙传芳军全部崩溃,孙下野后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北京方面先是1926年直皖系军阀失势,段祺瑞执政府消灭,关外奉系军阀统兵进入北京,自称大元帅。1928年6月张作霖见局势不利退回奉天,在皇姑屯被炸死。张宗昌亦败逃大连(后于1932年遇刺身亡)。至此北洋军阀统治告终,继起者乃蒋、冯、阎等新军阀,南方则为粤、桂、川、滇等新军阀。

5)郑州会议:武汉出师占领郑州及开封。此时冯玉祥军乘势东出与武汉军会师。6月10日召开郑州会议。13日会毕,汪、谭、唐等返汉,6月15日北伐军奉令复员回师武汉。此次郑州会议系由冯玉祥为主角,蒋介石幕后操纵。郑州会议参加人为:谭延闿、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于右任等。当时关防极严,会议详情外间无由知悉,以前重要军事会议鲍罗廷均被邀出席,此时鲍已去职,不得参加会议,中共方面竟无人参加。传说郑州会议冯拿出大宗现金送汪、唐等,作为取得河南地盘的报酬,同时汪等同意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与苏联断绝关系,以孤立共产党,至于分共问题自然亦在议程以内。因此有人说蒋先云牺牲大为不值,死既未归葬,不过为汪等在郑州会议上博得冯若干赃款,完成一笔反共交易,先云地下有知当不瞑目。

据汪左右说:冯在郑州时暗奉蒋意旨密语汪,用非常

手段拘捕陈独秀及中共其他重要分子，实行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任其逃脱，将如黄蜂出窝，不堪收拾。但汪当时有顾虑，恐怕这样做激成巨变，危及自身，所以仍主张用软工夫对中共虚与逶迤。郑州会议开完，冯见汪态度犹豫，深感不满，汪恐冯下毒手，未及辞冯，急登车南开，仓皇返武汉云。汪、谭、唐左右随行到郑州开会者有谭嗣余、孙科、徐谦、邓演达等。中共方面各军政治部主任亦有随往者，但均未列席。会毕后，仲甫询以郑州会议实际情况，彼等均茫无所知。当时中共选任干部，工人运动居于第一线，重要干部多集中在这方面。至于各军政治工作人选多属一般干部，所选任的多数是既缺乏政治修养又无斗争经验，一般被称为政治荷花太少（林伯渠等例外）。各军政治工作人员原应起政治领导与监督作用，其次应起搜集情报作用。但他们对军队行动却茫无所知，对敌方政治阴谋如蒙在鼓里。反之对方却是长于纵横捭阖阴贼险狠的人物，以此抗彼，成败之数，可以逆睹。这些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在“清共”时一筹莫展。汪、唐在郑州会议前对鲍与仲甫非常恭顺，会后神情异常，但各军政治部主任向中央汇报工作仍盲目乐观。如彭泽湘、王度甚至谎报军情，仲甫见状大愤，向人说：“我们的耳目都被堵塞住了，怎么办？”但是仲甫在《向导》为文却仍说道：“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sup>①</sup> 不知何所据而

---

<sup>①</sup>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198期，1927年6月15日。

云然,可见其受蒙蔽之深。中共曾派刘伯坚担任冯军政治部主任,但冯对刘严加封锁如同禁锢,因此刘对冯一切奸谋事前毫无所闻。在北伐期间冯玉祥自称有兵 28 万,机关枪 600 挺,大炮 600 尊,所以处举足轻重地位,为各方所重视。当时冯一方面派李鸣钟向蒋输情,同时又派刘骥到武汉向武汉政府骗去几船军用物资,从襄河用一营兵运走(据刘伯坚谈刘骥得款巨万,在武汉以重价买坤伶东伯华为妾)。刘骥亦曾秘密到南昌参加蒋介石的军事会议,凡此一切武汉政府明知故昧,鲍罗廷对冯行动亦甚隔膜,所以造成郑州会议的失败。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湘军原派有人分任第六及第二军政治工作,蒋到南京后,第六军军长程潜首先附蒋,第二军谭延闿所部鲁涤平等亦全部投蒋,二人遂被逐,只身逃武汉。由于仓皇离职,中共原在第二及第六军党的组织亦全部溃散。

6)徐州会议:郑州会议后冯自取得开封政治分会主席,6月19日志得意满,应蒋介石召赴徐州与蒋见面,交换谱谍,结为兄弟,参加徐州会议。出席徐州会议者有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李烈钧、冯玉祥。在徐州会议上冯拍胸担保:拖垮武汉政府,要汪公布反共态度。21日蒋冯联名通电,声讨武汉政府联共行为。7月8日冯玉祥实行清党,遣回武汉总政治部派去之工作人员,驱逐共产党。当时有种议论说东征原可以送走左派(指汪、唐军队),惜未实现。北伐实际是迎狼入室,反属多余之举,所谓有损无益。由郑州会议结果看来,可见北伐攻下郑州反使南北

隔离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得以联合反共，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于是武汉政府遂陷于四面包围之中，而最后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屈服。假如早及时出师东征，纵令相恃不决，亦不会促成冯蒋结合的反共局面，武汉政府仍有可能击退蒋的进攻。又在郑州会议前国际对冯玉祥曾寄予极大希望，因此鲍罗廷在讨论东征问题时曾提出西北路线，意思是说中国革命沿海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不易取胜，环顾国内，惟西北地形空阔，且靠近苏联疆界，缓急可恃，足为中国革命未来后方地带。但自郑州会议以后，西北路线却被冯玉祥堵死，由此直到冯失败时为止，中共在西北遂无立足余地。（待续）

（星原 雨笙 整理）

# 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前前后后

唐 韵 超<sup>①</sup>

我原名唐宏经，曾用名唐圣修、唐福山、金涛、金红。1901年3月1日出生于辽宁金县董家沟一户农民家庭。16岁时，因家庭生活贫困，经人介绍，到大连日本人开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大连的爱国知识分子于1920年和1922年先后倡导和组织成立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和“中华增智学校”等进步团体。他们在教授青少年文化的同时，也组织社会青年学习新文化、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我报名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特别是1922年5月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罢工斗争迭起。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大连工人阶级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受到强烈震动，认识到要想不当亡国奴，不受日本人的欺压，就要像

---

<sup>①</sup> 现年97岁高龄的唐韵超同志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中共六大正式代表。

关内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团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3年12月2日，我和工厂里的几个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大连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全市性地方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我被选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并于1926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大连“福纺”纱厂1000余名中国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我作为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工运部长，并以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的身分，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大连地区有史以来，有领导、有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百日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翌年3月，经党组织多方面营救获释。

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我同一些幸免于难的党团员逃往奉天（沈阳），继续寻找党组织。1928年初，我在奉天兵工厂做工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由我担任工运部长，领导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当时，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由于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影响，处于低潮。许多地方党团组织被破坏，工会被解散，一些尚未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的地区，也因日本统治严酷，无法开展工作。我上任后，深入奉天、抚顺、辽阳、沟帮子、西丰等地的工厂、矿山和南满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同资本家进

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1928年4月，在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省委常委，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不久，省临委接到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央给满洲省临委5个名额。当时，党内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通知要求最好选工人、农民作代表，使领导干部中多增加些工农成分。组织部长吴丽实找我商量派谁去合适，我刚到省委工作不久，全东北地区的情况尚不完全熟悉，这样，由吴丽实提名，决定让我、王福全、于冶勋、朱秀春、张任光代表满洲省委出席这次会议，并由我负责带队。我们5个人中，除张任光是学生出身外，其余4人都是工人出身。

鉴于当时国内形势的紧张局面，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安排到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批前往莫斯科。当时行走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到苏联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从满洲里和绥芬河越境。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傍晚，我回到旅馆，把中央的要求向他们4人做了传达，之后他们先期过境，我则留在了哈尔滨。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

记不得是途中的哪一个大站，停车时，我们下车到站台上活动活动。一个苏联铁路工人见我们是中国人，一边用手比划着，嘴里一边发出俄语的卷舌音，我们不懂俄语，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火车又开了好长时间，才得知张作霖在沈阳被炸死了。

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到了莫斯科。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木架子马车把我们一行拉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代表，因为有几个省的



代表还没有到，会议没有马上召开。有一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找到我，对我说：老唐，你怎么把团员也带来了？这时我方知朱秀春竟是个团员。我一时没了主意，问他：这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说，让朱秀春写个入党申请书吧。就这样，经过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朱秀春在莫斯科加入了党组织。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政治报告（王明翻译），瞿秋白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之后，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长时间的讨论。

六大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我作为一个入党时间不长，从事省委工作时间很短的工农干部，能够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特别是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心情非常激动。因此，开会的时候总是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我记得，中央报告中曾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听了以后，深感党中央的报告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

7月6日，在职工问题讨论中，我简要谈了满洲职工运动的情况。我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一部分。东三省有许多大工厂、铁路和矿山，产业工人至少有50余万。像这样聚集了广大的产业工人的地区，如果我们党不注意它，把它放弃了，实在可惜。

东三省过去的职工运动之所以没有成绩可言,是因为我们党没有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小的斗争是有的。过去有行会性质工会的组织,现在连这样的工会也没有了。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以及我们党不太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所造成的。

从前党只注意南方如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工作,以为把南方工作做好了,可以进行北伐。其实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党注意南方各省的工作,我只是希望大会同样地关注满洲的职工运动。

我还介绍了当时满洲各地职工运动的情况:(一)大连。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策源地,有产业工人4万多人。大连过去有过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当上海和广东的工人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北方党和工会指导下的大连工人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北方所有的组织——党和工会都被破坏了(过去北方的组织,先有工会,后有党的组织)。这表现在三个时期:在1926年福纺纱厂大罢工时,我们党指导下的工会,援助罢工工人,结果使资本家让步。但是党也受了部分损失,工会许多干部人才被捕。第二时期,经过第一时期工会的打击后,我们党领导工人重新恢复了工会的组织(1927年7月),但是又遭到更大的镇压,工会被封闭,工人被逮捕,党的组织被破坏。第三时期,1928年1月,党的组织重新恢复。但在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工人被捕四五十人,党组织可以说是没有了。不仅大连如此,从大连到长春的工会和党组织也

受到摧残。(二)鞍山。鞍山工厂里的工人,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日本人,共约几千人,工作非常艰辛。(三)抚顺。抚顺的煤矿有千台以上的机器,4万多名工人。他们受到的压迫非常厉害,甚至受到警察督视。由于现实的压迫,这些工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四)本溪湖。产业工人的数目不清楚,但他们曾进行过斗争。这里的工厂是中日合办的,1927年因与奉系军阀发生冲突,日本打死了20个工人,工人们自发地举行罢工。(五)奉天。工人有7万多名,都是没有组织的。他们很信仰张大帅,但我们党给终没有去做工作。这些工人月薪仅有三四百万奉票,抵不过十几块现洋,生活非常困苦。他们也曾有过反对日本建立领事馆的示威游行,后来被张作霖镇压了下去。这些工人其实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宣传的。(六)哈尔滨。因为苏联的原因,哈尔滨铁路工人的生活是很好的,月薪在80元以上。但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并不容易。他们完全不懂得他们生活的好处,是苏联工人专政的原因。由于这些工人之上由管帮负责,管帮不允许我们去做工作。苏联将余款分给工人,遭到张作相的反对,对于这一点,工人们并不知情。现在哈尔滨还有其他产业工人的组织。

在发言的结尾,我又再次地希望大会特别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代表更好地消化理解六大精神,中央领导同志不仅主持会议、作报告,还亲自给我们辅导。开会的20多天时间里,我受到了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受到过的教育,也更增添了会后做好革命工作

的信心。

大会闭幕前，选举了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7月11日，六大会议结束。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17日在莫斯科召开。应共产国际邀请，中国部分代表留下，继续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我是其中一个。我们留下的20几人，住进了莫斯科国际旅馆。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工会大楼里召开的，中共代表苏兆征致了开幕词。这次会议大约开了一个半月左右。会后还组织代表进行了参观访问。我和苏联、意大利、德国等代表10余人分在一个小组里，参观了乌克兰的农业区。参观结束后，经海参崴返回中国。

这时，周恩来也从苏联回国。路经奉天时，他向满洲省委作了传达六大决议精神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和普遍组织武装起义，而是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高潮。他指出在政治上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周恩来的报告为满洲省委的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即将召开的满洲省委党代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几个参加六大的代表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六大精神。省临委书记陈为人根据六大精神，总结和检查了前一段省委的工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省委《关于接受全国第

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和《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并决定改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我仍任工运部长。

满洲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过去急于组织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省委努力于工农运动和反日运动的领导，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对内部的训练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满洲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

同年12月，为进一步贯彻六大精神，总结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黄土坑附近党员牛思玉家召开会议。正在进行中，突然冲进十几个警察包围了会场。除一人脱险外，省委书记陈为人等13人被捕。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1929年夏，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我和被捕的同志一起出狱。之后，我又重新投入到满洲省委的工人运动之中。

# 我和“三家村”

李 筠

史学界关于“三家村”的研究，大致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辩冤，从事实真相和道理是非说明“三家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而是当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文字狱。此案于1979年得以平反昭雪。接着，开始了三个人个案研究的阶段，分别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个人经历、学术成果进行收集、整理和评价，出版了《邓拓文集》、《吴晗文集》、《廖沫沙文集》和他们的传记。如：《邓拓传》、《吴晗传》、《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以及美国历史学家马紫梅女士的《时代之子——吴晗》等等。在这基础上，开始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即“三家村现象”的研究，把他们三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整体历史现象，探讨“三家村”怎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三家村”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作用以及“三家村”本身的文化历史价值。花城出版社《三家村文库》的出版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为了促进“三家村现象”研究的深入，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愿意做提供资料的工作，把我知道的关于“三家村”前前后后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提供出

来,以供党史研究者参考。本文主要是资料性的东西,不是研究“三家村现象”的论文,当然,叙述中也会反映作者的某些观点。

## 《前线》创刊的前前后后

提起“三家村”,不能不提到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这是因为:第一,《三家村札记》是《前线》杂志上开设的一个杂文专栏;第二,“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是《前线》的主编,廖沫沙是常务编委,吴晗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第三,特别是由彭真撰写的《前线》发刊词,与“三家村”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有必要把《前线》杂志的成立和办刊经过作一比较详细的介绍。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倡导创办理论刊物。通知下发后,中央创办了《红旗》杂志,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创办起一批理论刊物。

根据中央的指示,1958年5月2日,彭真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建立理论工作队伍的决定(草案)》。在这次会上,彭真首次透露了他要办一个理论刊物的计划。彭真说:“北京做了许多工作,有许多典型经验,没有总结,没有提高到理论上来,北京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够有力量”,因此要好好办一个理论刊物,否则没法“指导实际工作”。彭真亲自指定市委常委张文松和市委宣传部暂时负责刊物的筹备。

要办刊,首先要解决的是刊名、主编及编委人选、刊物的指导思想。在这些问题上,北京市委给予了高度重视,期望和要求也很高。

7月14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会听取市委宣传部《关于创办市委理论刊物的意见》。当时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二三十个刊名,如跃进、公社等,彭真都不满意,要求宣传部再提几个。在主编人选问题上,彭真考虑到邓拓。他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的邓拓,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因不能充分“理解”“引蛇出洞”的“阳谋”,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和报社内积极组织大鸣大放,遭到了毛泽东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受到冷落的邓拓不得不离开《人民日报》。

邓拓被罢官后,彭真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邓拓到任后,彭真在10月初召开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以邓拓为首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的成员是:邓拓(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陈克寒(市委书记处书记)、蒋南翔(市委常委、高教党委第一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高教部长)、杨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教党委第二书记,后调科学院)、范瑾(市委常委、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程宏毅(市委常委、副市长)、廖沫沙(市委委员、统战部长)、赵凡(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张文松(市委常委、教育部长)、张大中(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陆禹(市委委员、工交部副部长)、李



晨(市委委员、教育局局长)、王汉斌(市委候补委员、办公厅副主任)等 13 人,其中常务编委 8 人。

接着,邓拓抽调人马,着手组建《前线》编辑部,并确定编辑人员的分工:萧远烈,协助邓拓、张文松负责总的日常编辑工作,后任命为编辑部主任;许文,负责工业交通,后任命为工业组组长;吴瑞章,负责农业,后任命为农业组组长;李光远,负责思想理论,后任命为理论组组长;李筠,负责文化教育,后任命为文教组组长;韩佳晨,负责评论。以后苏星曾担任过短期的编辑部副主任。《前线》从创刊到结束,除韩佳晨调走外,其余 5 人都坚持了下来。

关于刊物的名称,彭真亲自审查,对宣传部提供的名单仍觉得不满意,他曾提议刊物取名为《战线》。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斟酌,直至 11 月 4 日,彭真才最后将刊物定名为《前线》。为此,他给邓拓写了封信:“邓拓同志:请你最后再和书记处同志们一商。刊物的名字是否即定为前线。”后来,彭真解释说:“前线”两个字有战斗性。“我想了很久,提出了这个名字,意思是北京什么工作都应当站在最前线”。于是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便有了个能体现北京市指导思想的响亮名字。彭真还亲自为《前线》题写了刊名。

那么,《前线》总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前线》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前线》是北京市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它将用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指导自

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北京市党的组织及时地反映现实,指导实践,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

这个发刊词的构想体现了彭真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思索与认识。1958年10月底,彭真在北京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发刊词要“同过去的文章不同,这次的锋芒要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不良倾向,不是针对资产阶级”。“这个发刊词主要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批判主观主义,即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会后不久,彭真将张文松,项子明、项淳一、王汉斌、张彭5人召到自己家里,详细口授了发刊词的内容。事后,依记录整理出了发刊词第一稿。彭真亲自动手改写,经过几次反复修改,终于写成《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稿子写成后,彭真将其印发给蒋南翔、胡绳过目,以征求大家的意见。11月8日,彭真专门召集市委常委讨论发刊词。会上有人提出,发刊词中“他们太喜爱舞台上员外老爷的四方步了”这句话太尖锐了,最好改得缓和些。彭真说:“我就是写的尖锐些,文章糊里糊涂没有棱角,我最讨厌了。我写这些东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脑子里都有模特儿。”在讨论中,彭真还特意就他提出的“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一口号,征求大家的意见。李琪认为这个口号“(主客观)两方面都讲到了,可以。”

1958年11月25日,《前线》创刊号与广大读者见面。而时隔几十年后再回头细读这篇发刊词,益发觉得它的分量。

发刊词的第一个主题,是强调要正确认识主客观的关系问题。即根据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大限度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以客观上可能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现实的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

在1958年那个时代,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确实不简单。发刊词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反映了彭真的胆识。“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做得对或者不对,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都当作客观事物对待,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多就多、少就少,该怎样就怎样,严肃谨慎地对待。”这些彭真式的口气和用词,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篇发刊词的出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正确思想与左倾思潮的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发刊词便成了“彭真独立王国的反党纲领”。

发刊词的另一主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的吹毛求疵派。彭真在论及这些问题时,用词是非常尖锐的。例如他在谈到反中庸主义时,就正面指出:我们极少数同志也沾染上了马列主义的市侩、“乡原”作风。

创刊号发出后,有些读者来信请求解释“乡原”。邓拓于是让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解释它的出处及含义,最好与发刊词联系写。“乡原”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孟子又做了一番解释。用现在的话来说,“乡原”就是贼光油滑、八面玲珑的市侩,是中庸主义者的别名。文章写出后,邓拓

将原题《释乡原》改为《要识破“乡原”的真面目》，发表在1958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对于这篇发刊词，邓拓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再地强调，发刊词是《前线》整个刊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编辑部工作的准则，任何工作都必须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而实际上，发刊词也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市委比较大的工作会议上，发刊词曾多次被印发学习，作为检查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个标准。

《前线》创刊号出来后，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安排创刊号的具体内容时，邓拓要求市委书记们每人写一篇，“这样创刊号才有分量，才能打响第一炮，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没有这样重头文章是不行的。”《前线》第1期发行量达到18万份，以后基本维持在3至5万份左右。

##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挫折，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始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这实际上是对极左错误的一次有力的拨乱反正。而“三家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则是应该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解决面临的严重困难，北

京市委的态度是认真的积极的。除了认真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解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外,在思想文化战线,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反右倾扩大化的错案,坚决迅速地予以甄别纠正。邓拓是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在30年代曾写过《中国救荒史》,他对现实的认识更为清楚。1961年6月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邓拓在“绪言”中很尖锐地指出:“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较。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话说得很对,在困难时期,确实需要多读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克服物质的匮乏。

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的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最初是写《诗画配》,尔后在《五色土》副刊上开了《燕山夜话》的栏目。时间是1961年3月19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生命的三分之一》,大力提倡读书。

《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文章写得好，并认为邓拓既然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直接了当地向邓拓提出，让他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我们一再磨他，邓拓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于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拉上马了。

记得是在1961年9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边吃边谈，定下来四件事：一是专栏的名称。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邓拓还提到过，“札”字最好用老写的“劄”。二是署名的问题。邓拓提出就效仿马铁丁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如何。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为马南邨，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于是叫吴南沙。后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另外，指定我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到1962年9月或是10月的时候，“三家村”又第二次在四川饭店碰头，请吃饭的目的主要是催要稿件。编辑部主任萧远烈简要说了读者对专栏的反映，希望三位抓紧按时供稿。然而这次会面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稿子照

样难催。缺稿的时候，只好将《前线》现有的稿子补上。因此，《三家村札记》198篇文章中，有5篇不是邓、吴、廖写的。其中李光远写了《从善如登》，李文写了《关心业余创作》，张世绩写了《禁于未发》。有两篇是我写的：《不平等的平等》、《谈海派》。这两篇后来被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作为黑话摘引上了。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共坚持了3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杂文专栏难以持续下去。吴晗给邓拓写了封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写了。邓拓、廖沫沙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家村”，就应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它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八大的思想没有能够贯彻下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从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来纠正经济建设方面“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但是几次纠偏，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指导思

想上的错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又重新泛滥，国民经济出现了3年严重的困难。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也使文化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央在1961年实行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在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期间，许多带有法规性质的条例相继出台，诸如《农业60条》、《人口及粮食问题9条》、《手工业35条》、《商业40条》、《科研14条》、《高教60条》、《工业70条》和《文艺8条》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就是这调整时期的产物，它是思想文化回归到正确路线上的一种表现，和《前线》发刊词一脉相承。

当然，《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炼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左”倾的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

具体到文章中，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廖沫沙《怕鬼的“雅谑”》发表于赫鲁晓夫焚毁斯大林



遗体后不久。写完这篇稿子后，廖沫沙打了电话让我去取。后来他告诉我，此文是从反修的角度入手的。廖沫沙还写过《向老虎求教》、《看看历史上的“蠢猪”》，但是当时有规定，反修的文章一律由中央报刊发表，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家村札记》没有采用。

1962年5月，吴晗在《前线》第10期上发表了《说道德》，认为对统治阶级的道德可以批判地继承。稿子送来后，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因为说道德，总不能割裂传统。但这篇文章在对马列词句的引用以及理论的阐述方面有不够周严的地方。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一个名叫张文清的读者来信，他从学术角度，对吴晗的《说道德》提出不同意见。我把信送给邓拓，邓拓说给吴晗看一看。吴晗阅毕，又写了一篇《再说道德》。于是张文清再来信，与吴晗争鸣。后来，编辑部给张文清去信，声明他的稿件已给吴晗看过，并将稿子送给一位专门研究道德的同志，请他提出意见，《前线》不再刊登了。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别人的文章，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看法，吴晗于是写了《三说道德》，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因发表了两说道德，在批整“三家村”时，《前线》被严厉地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并扣上了“包庇吴晗压制革命群众言论”的帽子。

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

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臧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

## 批 判 初 起

经过调整，到1962年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3年困难的紧张局面得以缓解。但是在贯彻调整方针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与“三面红旗”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向正确思想进行反攻。文艺界也接受并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在文艺战线和社会科学战线反对“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江青在上海组织了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有害论》。结果，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有鬼无害论》遭到了批判。

《有鬼有害论》发表后，廖沫沙很被动。北京市委不能不管，于是在统战部组织了内部批判。会上廖沫沙作了检讨，说自己的文章有些文字用得不恰当，不应当宣传鬼等。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廖沫沙又再次检查了错误。廖沫沙写书面检查的时候，找过我和《北京晚报》的同志，请

我们帮他找些相关的材料。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查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编者按说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当时北京市委觉得用这个办法就可以把帐还清了。彭真也说过：“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廖沫沙在统战部实际上已靠边站，后来到了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然而中央上层对“三家村”的批判仅仅是开了个头。1964年8月，华北局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彭真、刘仁都前往参加。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从北戴河打来的长途电话，让我在两天内赶写一篇批判吴晗道德继承的文章，写完后送往北戴河。同时，刘仁、邓拓电召吴晗到北戴河写检查。

我的文章写完后，送交北戴河由邓拓修改定稿。过几天，稿子返了回来。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著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

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金世伟的文章送回来后，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边的话再发”。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组织对邓拓的批判时，刘仁在发言中提及到金世伟这篇文章，并说了这句话：对吴晗，中央认为不公开批判。

现在看来，对吴晗的批判从1964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最高领导人的授意。否则，北京市委不会采取如此阵势，以“金世伟”之名，加了编者按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北京市委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金世伟的文章被扣下不发，并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张，而是中央考虑所做出的决定。究其因，也许是最高领导层觉得公开批判的时机未到，也许是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戏剧改革为名，到北京进行调查研究。市委指定宣传部长李琪陪同。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江青很难侍候，很霸道，不讲道理。她以特殊的身分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企图砍杀北方昆剧院和地方剧种，不许老演员登台演出。当时北京市委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对江青进行了抵制。李琪对江青很有意见，给彭真写了封信，说江青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简直比武则天还难侍候。后来，别人告诉李琪：江青来北京就是专门来摸北京市委这个“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眼中无我”、“破坏戏剧革命”等大帽

子纷纷而下，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时，她在上海方面则秘密开始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 最后的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文汇报》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确实非同寻常。

上海的做法，违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彭真指示《前线》、《北京日报》不要转载。

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研究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让我也参加了。邓拓在会上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当即他给吴晗挂了电话：“你看了文章，怎么样？”吴晗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邓拓也觉得吴晗讲的有道理。在这次会上，邓拓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最后，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给《北京日报》抽调一批人组成学术批判小组。《前线》分

工主要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指定我为《前线》学术批判小组的负责人。

到了11月底，随着形势的发展，拒载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周扬商讨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的问题，决定在11月29日见报；为避免震动太大，只《北京日报》一家转载；转载时，加了彭真审定的编者按语：“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就该展开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载姚文，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加上了按语，希望通过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

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北京市委仍力图将气势汹汹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人把批判向“左”的方向推进。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北京市委的基本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接着他解释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邓拓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自已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

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形成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问题等等。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问个为什么你那时候要写《海瑞罢官》就完了。不是一棍子打死吴晗，不要一边倒，倒向姚文元，或者倒向吴晗。要实事求是，辨明是非，就按《北京日报》的按语搞。对写文章的要求，总的是言之有物，有针对性，有资料，有观点。

邓拓还谈到文章的具体分工问题。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4稿才改为《海瑞罢

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为什么写罢官，因为周信芳有海瑞上书、海瑞背纤。为了不重复，才写的海瑞罢官。我们要从这里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他对海瑞很感兴趣，最突出的是是什么？原先以退田为主，后来改为除霸为主，但为什么要改为海瑞撒职呢？当时剧本的中心是什么？为什么突出这件事？1961年定稿时为什么不考虑当时的形势呢？吴晗的历史观也有一点儿问题，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要弄清楚，道德问题、历史和历史剧的问题都是题目。海瑞是中小地主的代表，问题是把他划到哪个阵营去。

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写作前让我把金世伟的文章找出来给他。邓拓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章前加了《前线》编者按语，指出：赵凯同志的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该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让他再改写。邓拓重新改写，最后经市委书记处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



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邓拓曾跟我说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过去都发表过错误的文章,也没有做自我批评,所以彭真在定稿时没有采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我写的《对待〈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发表我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文被说成是“继向阳生《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之后,抛出的又一篇为吴晗救命的大毒草”,“一个劲地把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所谓‘纯学术’问题上拉”。同一天,《北京日报》还刊登了我署名为“险峰”的文章《百家争鸣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文汇报》曾就《北京晚报》“称兄道弟”一组文章,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展开讨论,同时发表了署名劲松的批判文章。邓拓看过后对我说:“劲松这篇文章有来头,是张春桥写的。”“这种情况使北京很被动,我们也要赶快批评一下。”我的文章写完后,李琪称赞道:“真是南有劲松,北有险峰!”

在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还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于是吴晗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海瑞罢官》中的若干学术问题进

行说明和解释,辩解了《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在某些问题上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

但是这场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一场预先策划好的政治阴谋,搞吴晗只不过是给个突破口罢了。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邓拓感觉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曾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是一个人写过的,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且加了编者按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汇报》在1965年12月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的编者按。当时邓拓很不服气,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又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他怀疑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我向吴晗查寻蒋星煜是上海的什么人,并让他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也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信最终没有发出。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海瑞罢官》的主题

从“退田”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政治批判的分量加重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力图把学术讨论文章的局势控制一下。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这次6报刊编辑部会议我参加了。根据邓拓的授意，我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帐，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就批判吴晗的情况和继续开展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其目的仍是试图约束这场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的性质；规定采取的方针，反对自以为是。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的空气上升，政治批判有所抑制。1966年2月18日、21日、24日，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传达贯彻执行。

在这一时期，有件事须交待一笔，这就是1966年2月初，关锋夜访邓拓。邓拓当时感到很奇怪：我和关锋根

本没有来往,他找我干什么呀?第二天,邓拓告诉我: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受康生的指使,关锋跑到邓拓办公室,对邓拓施加压力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他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接着提出,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以继承,却又非两面性等等一些意见。

邓拓对关锋的答复是:《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范瑾和书记处同志要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我就写了。原来曾想在文章中做些检查。邓拓还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还是谈了。

后来邓拓告诉我,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一伙的用意何在?

1966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但也批准了江青一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炮制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对准了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显然,当时真正代表毛泽东意图的,是《纪要》。1966年3月1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揭了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定《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4月中旬,彭真在政治局开始受到批判攻击,《二月提纲》遭到否决的命运,北京市委只好以不断检查

的方式，来摆脱益发困难的处境。

1966年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一定范围的批判。这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但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

这样的举动显然过不了关。北京市委的党报党刊迫不得已地自己出来组织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刊发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但是时隔不久，《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北京日报》的4·16按语被认为是对“三家村”的“假批判、真包庇”受到了批评。紧接着《五·一六通知》发表，揪出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北京市委被改组。从“三家村”身上点引的“文化大革命”的厉火开始蔓延全国。

(傅 頔整理)

## 邓小平与六大期间的留守中央

牛 桂 云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邓小平正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长的职务。他当时与留守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任弼时一起，在上海主持和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在这一段时间内特殊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到上海以后的 1927 年年底开始的。在这之前，他是党中央的政治秘书。在他任中央秘书期间，曾经筹备并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关于当时的情况，他于 1980 年在汉口参观八七会议旧址纪念馆时曾回忆说：在八七会议召开时，“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 20 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有到任。1927 年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 20 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 6 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sup>①</sup>可见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邓小平为这次会议的顺利举行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主要是协助周恩来和李维汉工

---

<sup>①</sup> 《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0 页。

作。那时，周恩来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7年11月回到上海。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会计等科，并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组织局主任先由罗亦农担任，后周恩来为代理主任，从1928年1月起，周恩来为主任。李维汉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领导成员。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就是协助周恩来和李维汉处理这许多方面工作的。1984年3月，他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sup>①</sup>

邓小平从开始担任中央秘书长到1928年4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协助党中央领导，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各地党组织迅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导各地农村党组织发动秋收起义；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建立党的秘密机关，恢复整顿在白色恐怖下处于散乱状态的各地党的组织；处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等等。

从1928年4月至9月中共六大选出的新的中央领导人回到上海之前这段时间，邓小平和留守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维汉、任弼时一起领导了国内全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治形势、主要任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革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sup>①</sup>特别是,中共六大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当作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来到莫斯科负责筹备和召开中共六大;由李维汉等主持国内工作。瞿秋白和周恩来是在1928年4月底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的。这样,从1928年4月至9月间,就由李维汉、任弼时和邓小平主持留守中央的工作。

关于留守中央的工作情况,李维汉回忆说:“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又说:“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他还具体地述说了当时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和工作的地点。他说:留守中央是“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邓小平和李维汉、任弼时碰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地方,就“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sup>②</sup>。

当时住在这里的朱端绶,在1990年她82岁高龄时,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我是在1928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24岁。”“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



机关,来了只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她还说:“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sup>①</sup>这时,党中央的许多文件都要经过邓小平来处理。

黄玠然(曾因党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工作,而准备接任中央秘书长职务)也曾向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介绍邓小平当时的工作情况。他说:政治局开会时,“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他还说:“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长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sup>②</sup>

从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亦是留守中央的重要领导成员。因为他参加留守中央的常委会议,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留守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和主要工作他都参与研究,并且具体将其付诸实施。4个多月的留守中央,做了许多重要

---

①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② 同上,第174页。

工作,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当然与邓小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具体说来,邓小平和李维汉、任弼时等留守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这期间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开展反帝运动和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出卖山东、满洲权益的罪行。留守中央刚开始工作,就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向济南大举进攻,并残酷屠杀山东军民的济南五三惨案,而蒋介石却严令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济南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留守中央领导人及时分析了这一形势,于5月9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通告指出:“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参加到公开的反日团体)。”通告要求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的党组织“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制定当地行动大纲执行之,并将执行情形,报告中央。”<sup>①</sup>随后,中央连续发布了4次通告,有的地方还派了人去,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和满洲的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不抵抗的罪行和高唱与英、美等国修约论调欺骗民众的伎俩。特别是留守中央在领导这次反帝斗争时,强调指出:要努力“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主要的路线是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sup>②</sup>。这样,留守中央就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运用灵活的策略,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了。因此,许多城市掀起反帝运动,使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民族运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199页。

<sup>②</sup> 同上,第270页。

动逐渐走向复兴。

第二,在领导城市和农村的革命斗争中,注意克服“左”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决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强调“目前全党的工作重点就应当是争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反对把起义当作儿戏。”同时指出“党在农村苏维埃地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队伍,以期这些队伍今后逐渐汇合成为一支全国性的红军。”<sup>①</sup>中共中央刚一收到这个决议,立即于1928年4月2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起草一个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的通告,停止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留守中央开始工作后,在领导城乡的革命斗争中,就很注意克服“左”倾错误。为此,留守中央先后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等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对城市工作,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切实领导工人日常的斗争,在小的斗争中聚集群众的力量;纠正过去把罢工看成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为了造成罢工形势,而用恐怖手段威胁群众,以武力制止工人进厂做工的错误斗争方式等。对农村工作,留守中央提出: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分粮一直到秋收时抗租没

---

<sup>①</sup>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353页。

收土地，在群众与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须实行割据与暴动。我党应立即抓住这一秋收时机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出，留守中央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盲动主义的思想影响，但在努力克服“左”倾错误。特别是留守中央在这些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目前农村工作应当特别注意”，“防止离开群众受农民意识支配的盲动主义倾向”；“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之配合发展”；“加紧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注意“建立并发展农民协会（或用其他名义）的组织”<sup>①</sup>等。由于注意防止“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留守中央工作期间，农民暴动和农民游击战争有了进一步发展。

第三，规划和指导军事工作。留守中央认为对于军事工作必须加强领导，首先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于是在1928年5月25日发出《军事工作大纲》。《大纲》指出军事运动的原则是：“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同时指出要运用“黑夜袭击，游击战争，巷战，野战等”灵活机动的战术<sup>②</sup>。大纲规定：在割据地区建立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官兵成分“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苏维埃军委即为党的军委，是该割据地区的军事最高机关；红军中之党组织“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人数多的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红军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sup>③</sup>。这些规定，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1928年6月4日，留守中央为了加强对湘赣边界革命斗争的领导，发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转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这封信批判了“以为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民权革命的阶段而是社会革命”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526—528页。

② 同上，第225、226页。

③ 同上，第233—236页。

错误理论；不顾主客观条件“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单纯的军事行动”和过左的烧杀政策；同意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局面向四周发展”；同时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sup>①</sup>。同年11月6日，由湘赣边界特委召集特委委员、军队及地方党的活动分子开会，讨论了这封信。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同日“依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了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同志）、毛科文（农民同志）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sup>②</sup>。1928年11月25日井冈山前委在对中央报告中说：“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sup>③</sup>。由此可见，这封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提出加紧士兵运动。留守中央根据国民党新军阀打下北京后，其军心动荡加剧，兵变不断发生的情况，提出应派得力同志到敌军中去工作，加紧士兵运动。为此，留守中央于1928年7月10日发出《中央通告五十八号——兵运策略》。该通告指出：目前“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中]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通告还要求各级党团组织“接到此项通告之后，应即于一周以内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这一工作具体进行的计划，兵委人数不宜过多（至多不能超过五人），组织须求严密，能认真工作”<sup>④</sup>。通告强调指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47、251、256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51—252页。

③ 同上，第251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95、501页。

出：从积极方面看待士兵工作，派出得力同志去做敌军的工作，要利用敌人征兵、下级军校招生时，多派同志进去。留守中央对军事工作的这些指示，基本精神与六大给国内的指示电，要求“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加紧组织红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项工作在当时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五，整顿和改造党的组织，逐步建立党的秘密工作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在革命低潮时期，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如果仍然按着大革命时期的旧工作方式做工作，显然是不行的。因此，留守中央提出必须采取适当的工作方式，以保护党的组织与党员。1928年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在这个通告中，提出了整顿党的组织和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办法。其基本原则是：“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组织形式保存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缩小党的支部，“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要扩大“党内民主”，“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但同时必遵守集中的原则，一切问题经支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同时指出：“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工作）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为使党可以影响并领导广大群众，则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连系起来”<sup>①</sup>。这些适合当时实际的办法下达以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以及秘密工作确实起了好的作用。

第六，传达和贯彻六大的国内指示电。六大在开会期间，为了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01—202、203、205—206页。

使国内尽快了解并执行大会精神，给国内发来了一份《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电稿指明：“第六次大会无疑义的同意第九次国际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案。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屡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革命浪潮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加紧日常工作”。电稿强调：“党与群众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农民的游击战争之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sup>①</sup>留守中央收到这封电稿后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按照来电的要求，发到各地进行了讨论”，“及时地传达了六大精神，指导了全党工作。”<sup>②</sup>

毋庸置疑，在短短的4个月期间，留守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工运、农运、兵运、反日运动、党的组织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28年9月，李立三在中共六大结束返回国内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肯定了留守中央几个月来“工作上的路线是很正确的”。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sup>③</sup>。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在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各项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其功不可没。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5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8页。

#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王 文

发生于 1951 年秋至 1952 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曾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被合称为建国初期的“五大运动”。可是长期以来,这个运动在党史和国史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即便有些论著有所涉及,也只是针对运动前一阶段的京津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学习,而对后一阶段,即结合三反开展的“人人过关”的批判和组织清理几乎均未提及。

建国以来,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曾经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今天,回顾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于认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于正确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无疑是有益的。

## (一)

1951 年 6 月 1 日,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很快发现,教师们一方面有热情,愿意接受新思想,改造旧北大;另一方面思想状况也很复杂,致使一些具体工作不易开展。如讨论院系调整时,都强调“以我为主”,各不相让;讨论改革旧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时,或崇尚欧式教育、或崇尚美式教育,而对于把教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缺乏了解或不以为然。针对这个情况,马寅初等校领导认为有必要在全校教职员中统一思想,于是他们利用暑期组织教职员进行了 40 多天的政治学习。暑期学习效果明显,人们精神面



貌和工作效率都有改善,这使马寅初等人深受启发,又进一步倡议在全校教职员中开展一次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认为,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都能真正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以便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sup>①</sup>。

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政府委员会议,会后,马寅初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大政治学习的情况。当马寅初谈到可以北大为试点,如果效果好,这个运动还可普遍推广时,周恩来对此表示肯定,并嘱马将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在与会者就餐时,周恩来又把马寅初带到毛泽东面前作了汇报。9月7日,马寅初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报告称: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决定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的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sup>②</sup>

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及时而迅速的。中央认为这种政治学习有必要在全国高校推广,决定首先在京津两市的北大、清华、北师大、燕京大学、北农大、辅仁大学、北方交大、华北大学工学院、协和医学院、北大医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中国矿业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外国语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20所院校中展开。中央指定由彭真、胡乔木负责领导,由钱俊瑞、蒋南翔、杨奇清、金城、宋硕等成

① 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立一小组负责组织这场学习运动。行政上在中央教育部成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马叙伦部长任总学委主任，钱俊瑞、曾昭伦副部长任副主任，委员由各高校主要领导组成，计有马寅初、林砺儒、陈垣、叶企荪、陆志韦、孙晓村、茅以升、杨石先、刘锡瑛、张国藩、曾毅、胡传揆、李宗恩、蒋南翔、刘仁、黄松龄、刘子久、胡耐秋、张宗麟、张勃川、郝人初等21人。天津成立了总学委“天津总分会”，各高校成立学委会分会。这样，京津各高校的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全面展开。

在各院校纷纷进行学习讨论时，9月24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开会，详细研究了运动的目的、内容、方法。会议认为学习运动目的是改造思想，用改造思想来推动学校改造。值得注意的是，会上提出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但要慎重，勿求速成。学习时间定为4个月。学习内容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学习方法是通过对报告、阅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状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向京津各高校的30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从自身经历讲起，谈到自己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也曾犯过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但是从不灰心，因为犯了错误可以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所以，“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激励知识分子的同时，周恩来又指出，“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然后，他讲了7个问题。一，立场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树立“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

民立场”，虽然知识分子一般都有民族立场，但这还不够，还要“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另一方面，要“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二，态度问题。首先要分清敌我友，对世界形势，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的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接受的”，但不能允许敌视新中国。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美好将来，为全人类光明的前途服务。四，思想问题。主要针对着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强调要改造这一类旧思想。为了改造自己，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五，知识问题。指出知识分子一个大毛病，就是自负，不重视活的知识，不重视实践。所以知识分子要“补课”，“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六，民主问题。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还要有集中”，“这种民主是最有力量的”。七，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周恩来特别强调思想改造要靠自觉，他专门举了他的老师张伯苓为例。张伯苓系原南开大学校长，晚年曾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与周恩来的关系很亲近。解放后许多知名人士在报上公开声明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拥护共产党，周恩来并没有勉强张伯苓这样做，以后张伯苓逐渐认识到新中国的好处，周恩来“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改造思想要有耐心，“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

周恩来的讲话亲切诚恳、精辟透彻，在京津高校教师中引起巨大反响，大家由对周恩来阐述道理的折服，倍感学习改造的必要。

老教授陈垣说,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真是搔着痒处,我更觉得要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sup>①</sup>。马寅初感慨道: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sup>②</sup>。

但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坏人才需要改造,我们不需要”,有人说“什么改造不改造,我不早就为人民服务了吗?”有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不以为然,觉得批评自己难,批评别人是“狗咬狗一嘴毛,没啥意思。”<sup>③</sup>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抵触情绪从一开始就存在着。

继周恩来报告之后,彭真、胡乔木也先后作了辅导报告,推动了运动深入发展。各高校成立了由行政、党、团、工会及教师代表参加的学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人多为党员负责干部。京津唐 3800 多名教师普遍加入学习。各校按系或按组成立学习小组,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检讨。马寅初、陆志韦、周培源、陈垣、梁思成、白寿彝等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在报上撰文做自我检讨。总学委会出版了“教师学习”周报,发给每个教师一份,以供指导。各校有油印或铅印学习小报、墙报。各院校学委会每日向总学委电话汇报一次,三日做一次书面汇报。总学委还每日派人到各校了解情况。总学委指定的学习文件主要有:列宁的《论纪律》、《青年团的任务》;斯大林的《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与美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论自我批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

在热烈的学习浪潮中,各高校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

① 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195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② 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③ 《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一些思想状况》,《宣传通讯》,1951年第27期。

从清华大学华罗庚教授的话中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他说:近几周来整个的清华园已经卷入了学习高潮,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如饥如渴的要求进步,这种气氛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近来我们的谈论中心也都集中到“怎样才可以把清华现有的力量,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来。并且一般都认识了,我们学校的进步,远远地落后在各种建设之后。认识到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牛车的轮子,去配上飞速的经济建设——奔驰的列车<sup>①</sup>。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在我国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sup>②</sup>在毛泽东热情洋溢的号召下,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思想改造行列。

11月中旬,中宣部就文艺界整风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报告,指出文艺界存在的三个缺陷:(一)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二)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三)严重的自由主义,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学习。为此,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全国文联决定组织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北京文艺界的学习:根据中宣部的报告,中央于11月26日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

---

① 1951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482页。

11月25日,教育部向全国教育系统发出通报,要求所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参照京津高校的做法,在教师中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2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思想改造学习的动员会。院长郭沫若针对一些科学工作者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评,号召科学工作者“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1952年1月7日,全国政协发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要负责组织领导各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正确的革命观点;学习党的政策,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自1951年10月23日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开辟专栏,陆续刊登一些知名学者的检讨文章。这些文章起了示范带头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知识分子中间迅速展开。许多人抛弃了“爱面子”、“唯我独尊”,在讨论会或报刊上大胆披露心迹,自我揭短亮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情。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检讨了自己自以为是,对工作忽冷忽热、一曝十寒,深有体会地说:必须摒弃经院式的学习方法,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方法,才能真正分辨新旧,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方能改造自己,取得进步<sup>①</sup>。中科院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戴芳澜检讨了自己轻视实践、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并且觉得清理自己的思想,好像洗了一个澡,去掉了很多障碍,精神上倒很痛快,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添了自信心,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sup>②</sup>。

---

①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1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② 《从头学起从头做起》,1951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应当指出的是，知识分子普遍检讨，一些学界名流的检讨文章在报上刊登，这个现象，不但是我们研究这场运动应当注意的，也是我们研究建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研究整个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时都不可忽略的。检讨提供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可以品味出字里行间的一些复杂的意味。

从这些标题中就可以看出文章的内容：《批判我的崇美思想》（清华教授葛庭燧），《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清华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清华教务长周培源），《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清华副教务长钱伟长），《批评我的“国际学者”思想》（燕京大学教授赵承信），《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津沽大学副校长李宝震）。这些文章的内容一般是：剖析自己的历史（出身、所受教育、在旧社会的政治关系等），分析自己的思想，再谈对思想改造认识和自己的决心等等。应当说，许多人对党的态度是真诚的，对新中国是热爱的，对自己存在的缺点是有一定认识的。

但在这些检讨中确有不少过头的现象。表现是思想“升级”的很多。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提升为“极端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前留学欧美，说成是“逃避革命”。不少人认为词句越尖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越大，就是觉悟越高。有些分析太简单，道理上不能说服人。梁思成解放前曾在美国经费资助的“北平美术社”做过学术演讲，他检讨这件事时说：“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如果中国的主权没有保障，这种向帝国主义匪盗讲解我国文物精华的行为只是开门揖盗，只会引起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更残暴的掠夺。我归根是为他们服务的。”<sup>①</sup>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

---

<sup>①</sup>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195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则认为：我过去教书用英文写纲要，甚至于鼓励学生用英文写报告，可以说是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毒<sup>①</sup>。

这里特别有一个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文化侵略问题。许多知识分子曾留学欧美，为了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一般都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旧中国的文教事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主要是美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因为经费来自于外国而受其操纵。解放初，党和政府收回教育主权，逐步割断了文教机构同帝国主义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教育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性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左”的偏差，如没有把文化侵略与文化交流区别开，有些学校甚至同外国大学交换图书、资料的工作也中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国际上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我国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同美蒋严重对立，党号召要彻底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这一切使得当时人们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特定的时代印记。当然，认为要学生用英语写作就是崇洋媚外，认为苏联某些生物学说是“无产阶级”的、而西方科学家的一些生物学说是“资产阶级”的，不用说在当时也是简单和片面的。诸如西方国家与旧中国文教联系中哪些属于文化侵略哪些属于文化交流，在教会学校任职是否就一定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以及这类学校的办学经验是否一无可取之处，这类问题要求急于站稳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作出全面准确的回答也是不现实的。运动的领导人也觉察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胡乔木曾指示要以研究文件为主，避免就事论事<sup>②</sup>。

有认识局限方面的问题，也有运动中“随大溜”、“表态”的问

---

① 林传鼎：《我的反省》，1951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② 《宣传通讯》，1951年第28期。



题。群众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运动一起，同声齐和，事物的真象有时就不一定看得真切。中央虽主张不追不逼，认识靠自觉，然而运动高潮一来，形势本身就容易形成一种压力。人的心理有一定的从众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既然要求检讨思想、划清界限，有的人也就跟着表态，而其实所说的与所想的又不尽符合，民盟中央常委邓初民曾指出过这种现象：个别人在学习小组会上，来一番沉痛的自我检讨，在报纸上写一些自我批评的文章，不能说这就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改造<sup>①</sup>。

思想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正如燕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所说，长期以来（往往是几十年），他们脑子里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思想常常在这个体系之中来回打圈子，永远冲不出它的范围<sup>②</sup>，虽然很多人决心“另外铺设新的轨道，使自己的思想列车在新的轨道上向前开行”，但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党对这种情况是了解并有所思考的。

1951年11月3日，此时运动已开展了近3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彭真负责起草的《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这是党在分析了正在开展中的运动的情况，为了掌握引导下一步的方向而作出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件在提到此次思想改造时用了“初步的”定语，指出“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是指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些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东西”。

---

<sup>①</sup> 《思想改造文选》第3集，光明日报社1952年版，第61页。

<sup>②</sup> 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态度》，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第二,文件明确提出运动的两个目的,初步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即在学校中进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之后再进行系统的组织上的清理,号召教职员和学生向国家忠诚老实地交清自己的历史,并检举所知的反革命分子。又指出:不要过早地、生硬地发动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当时提出要在学校搞组织清理,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1951年4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展了“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不搞思想意识问题。1951年5月21日,中央向各地党政机关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加以清理。如在华东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2万7千多机关干部参加了审查。

第三,从这个文件本身以及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党是有意识地有侧重地把运动的范围界定在教育界,并且运动的落脚点在组织清理。中央认为,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在学校进行了长期的反动教育,并用欺骗、威迫和利诱的方式,在教职员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中发展了大量的反动党团员和反动党团所利用的外围组织。解放后,仍有一些敌特分子利用学校做掩护进行破坏活动,如有些大学出现反动标语和爆炸事件,所以有必要对学校进行清理。另外,对于教育界以外的其他部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党认为非短期之功,故持慎重态度。如对于科学院系统,认为由于“党的力量较弱,不如各高等学校有学生群众,故应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sup>①</sup>。以后的情况表明,教育界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进行过程中,与三反运动结合,渐渐与其他工作相融合,

---

<sup>①</sup> 《中央关于在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宣传部的复示》,1952年6月。

运动的轮廓界限、规模声势均不能与教育界相比较。较为典型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与组织清理)主要是在教育界进行的。

正当各地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开始行动之时,“三反”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面对新形势,中央遂即又有新的布置。

大致来说,从1951年9月到1952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三反”运动的指示》,这是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内容是政治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的范围主要在京津地区,参加者最初是高校教师,继而文艺界、科技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形成一个各界知识分子广泛参加的运动。

## (二)

1952年1月,在全国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从此,思想改造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3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是极其具体、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在运动中基本上消灭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

在这个指示中,中央明确要求教师“人人过关”：“每个教师必

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并提出四类“分层过关”的办法,即:(一)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二)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三)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四)最后每校极少数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

在中央的号召下,北京各高校教师停止了政治学习,学生也被免除学期考试,集中力量,迅速开展三反运动。北京市于1951年1月7日成立了高等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党内指定李乐光、蒋南翔、张勃川、程今吾等组成党组,领导运动。决定在各校行政和总务部门的职员中,以反贪污为主;在教员中针对铺张浪费、损人利己、不负责任等思想,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各种腐朽思想为主;对于青年学生,主要指导他们在运动中认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行为对国家的危害,加强爱护公共财产教育。

各院校纷纷召开动员会,校长带头检讨。各校负责人,如马寅初、汤用彤、叶企荪、林砺儒、陈垣等都在大会上做了一次或两三次检讨。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一次检讨未过,紧张得一夜未睡。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会上被群众当场检举其属下3人有贪污浪费行为,搞得非常被动。清华大学冯友兰,第一次检查承认1949年前有名利思想,想当大学校长,1949年后有进步;第二次检查以名利思想为主,还承认有反共拥蒋思想,1949年后进步不多;第三次检查以反共拥蒋思想为主,承认1949年后无进步,但只剩名利思想,没有反共拥蒋之心。均未获通过。其间,金岳霖、周礼全曾来看望冯友兰,金与冯为检查事抱头痛哭<sup>①</sup>。

---

<sup>①</sup>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面对声势浩大的运动,青年学生积极踊跃。为了发动学生推动老师,各校将师与生按系编组,每个教授讲师都在师生联合组里做检讨。检讨会的场面非常紧张。季羨林在40多年后回忆说: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剑一样,射向我的灵魂<sup>①</sup>。燕京大学教授赵承信在第二次检讨中痛陈自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伤心落泪,全场为之感动,许多人痛哭,一学生激动之余当场坦白自己曾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这种紧张的气氛很容易导致事物走向极端。北大工学院曾出现两天无人领导的状态,群众组织了无党无派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壁报上漫骂领导,形势混乱。燕京大学在召开大会时由于没有能掌握住群众情绪,出现了3个职员被拉上台罚跪的现象,面对此情此景,教师们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可以看出,进入三反时期,思想改造运动的火药味明显加重了。中央文件中的提法和运动中的做法都表明了这一点。周恩来曾试图制止纠正当时过火的做法。3月7日,他致信陆定一,要陆专门开个会议,说明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不能急,北大、清华要马上制止急躁情绪;三反联系到政治问题时,如果是过去的事又坦白交待了,可以过关;思想问题不可能一次得到彻底解决;有些政治问题未交待,则在三反后另案处理<sup>②</sup>。这时中央文件中也主张区别对待机关和学校的三反斗争,在学校着重于思想批判。然而,各地在运动高潮中往往没能把握住政策。1952年5月中南局宣传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一般仍未能很好掌握学校特点,在三反中采取和机关大体相同的步骤和作法<sup>③</sup>。

关于贪污浪费现象,在学校等部门不能说不存在。如北大化学

---

① 季羨林、钟敬文等:《我与中国20世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③ 《宣传通讯》,1952年第8期。

实验室自来水管漏水7年未修；唐代壁画在地下室被水浸坏；协和医学院教职员护士私拿公家药品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批评并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总结教训，加强管理，但是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大搞人人过关，再加上基层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就势必出现较大的偏差。1952年4月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高校三反运动向中央的报告中称：交大1758名学生，初步交待手脚不干净的有517人，占总数近30%。复旦教师294人中，不干净的有169人，占57.5%，教授、副教授163人，不干净的101人，占62%。这样的统计数字显然有很大水分，这种做法对于真正的思想改造有害无益。更有甚者，如中南地区“曾发生逼供、肉刑和变相肉刑（例如罚跪、挂牌子、“打排球”、吊打等等）、随意扣押处分等违反政策的现象”，“因有些学校没有很好交代政策，贪污分子畏罪或受坏分子威胁而自杀的共计17人”<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一些教师惶恐紧张，心神不定，冯友兰一度觉得不如辞职自谋生活，闭户著书。上海高校有些教师甚至准备改行去做生意，南昌大学教师“对思想改造持抗拒态度的占教师的总数百分之十至十五”<sup>②</sup>。

发动高校学生揭发批判教师的做法，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运用学生的力量”，既是中央的明确要求，又是各高校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据1952年2月18日北京市委向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称，学生群众一起来，一些行政领导和教授就“不得自动地或被迫地放下臭架子，进行自我检讨。”“北大的汤用彤、马大猷、罗常培、钱端升、清华的叶企荪、周培源、潘光旦、钱伟长……都在群众面前检讨了自己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自私自利思想，或崇美、亲美思想。检讨好的，群众让他们过关；检讨不深刻的，

---

<sup>①②</sup> 《中南局宣传部关于中南各级学校“三反”运动给中央的报告》，1952年5月。

群众就不让他们过关。潘光旦已检讨了5次,并且哭了一场,仍未过关。”“经过这一番斗争,大学里的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被一般教授和学生们崇拜为偶像的所谓名校长、名教授如叶企荪、陆志韦、潘光旦等都倒下去了。……许多学生很幽默地说:在三反斗争中,我们的旗帜倒了!”青年学生追求进步、思想活跃、热情奔放,这是他们的长处,用这个长处发动运动,是很容易打开局面的,但同时也容易产生强烈的冲击力。中国向来讲究“师道尊严”,在大学里,教师非常注重维护自己在学生面前的形象,一些名教授更是学生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当学生力量向着一贯稳定的师生关系撞击时,对一般心灵脆弱敏感的教师们的震撼和创伤是可想而知的。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被发动起来的学生们终于破门而出,冲向社会,这些历史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有了三反斗争的铺垫,运动很快转入组织清理阶段。中央向各地强调:“必须认识,如果在此次思想改造中不能达到组织清理的目的,那么,这个运动便是有头无尾的”<sup>①</sup>。

在经过3个月的思想批判和过关检讨后,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率先于3月底4月初发动“忠诚老实运动”,开始组织清理。北大、清华等校于5月中旬也开始进行,各校一般在两三周内完成此项工作。领导机构仍以“节约委员会”的名义。不依靠各校行政领导,专门抽训一部分党团骨干组成工作组,担任实际责任。在学校内公开号召开展检举揭发运动。提出的原则是,“不追不逼,启发自觉”,“认真审查,宽大处理”。

以北大、清华、北师大、燕京、辅仁、北农大、重工业学校和工业学院8所院校为例,90%以上的教师和学生交代了问题<sup>②</sup>。1952年

---

<sup>①</sup> 中央批转《华南分局宣传部关于中山大学清理“中层”工作的总结报告》的指示,1952年8月29日。

<sup>②</sup> 《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清理“中层”运动的报告》,1952年6月。

5月,蒋南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把当时所交代的问题主要分为三类:一般性的问题,如隐瞒年龄、学历或隐瞒社会关系等,大多数交代的是这一类;政治性问题,如参加反动党团组织,或曾有反动言论或著作,燕京大学1529名交代者中,此类有411人;重大政治问题,如曾任反动党团组织的骨干、加入过特务组织、有血债嫌疑、叛变自首等。据6月份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8校交代的属重大问题者有436人,其中计反动党、团、会道门及其他反动组织的骨干分子174人;曾任日伪美蒋军政宪机关要职的174人;参加特务组织的37人;帝国主义间谍和有间谍行为的6人;有血债的7人;叛徒及其他38人。北大某教授交待他曾于皖南事变前夜参加过顾祝同主持的重要军事会议。重工业学校某学生交待他曾于解放前捕中共干部3人交日本宪兵队。在证件方面,交出了收发报机4架,手枪4支,军刀匕首9把,手榴弹1枚,烟膏约50两及反动文件、证件、无线电零件多种。

对于各大学中一些担任政府高级行政人员或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教授,以及一些年老或重病者,当时北京各高校采取的方针是不编入小组,不要求交代,自动交代者欢迎。对于所有交代者的处理,是“边坦白,边审查,边作结论”,随时加以处理。最后除少数高级民主人士外,每人须重新填一张新的履历表。有的学校运动后设立了“教师进修部”,将一些被认为落后的教授讲师送去学习。少数被认为有较大政治问题的人受到了登记管制。

在研究了北京高校做法的基础上,中央于1952年5月向各地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指示》在肯定三反运动以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经验后,要求各地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指示》提出在清理工作中必须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交代历史应先从党、团员开始,动员党、团员带头,树立模范然后推及党外”。“每个



学校清理工作时间不要过长,以三个星期左右为宜”,必要时可以短期停课。《指示》要求各地在暑假前大体完成大学里的清理工作,中学的清理工作可在暑假中进行。

遵照中央指示,各地高校相继转入组织清理,虽然时间进度不一致,一般都在暑假前完成。

在上海,由华东局直接掌握,按照“先公后私、重点掌握与分批前进”的原则,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以交大、同济、复旦、华东师大为重点,第二批在扈江、震旦、圣约翰及大同4所私立大学和市立上海工专中进行,第三批在东吴法学院、上海学院等私立7院校进行。运动高潮时,上午上课,下午学习批判,搞得非常紧张,圣约翰大学中文系主任蔡振华因学习紧张,加之肺病严重,“以致一日之内陡然死去”,中央为此特别提醒各地注意,“今后对年老的教师和患病的教师必须多予照顾”<sup>①</sup>。

在西安,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4所高校的清理工作于5月底开始,6月底结束。西北大学采取让几个曾参加国民党党团组织的教授和学生在会上做现身说法报告,然后负责人进行政治鼓动的做法,使交代运动迅速发动。

在广东,中山大学自8月1日到13日,历时13天,完成清理工作。2407名教职学生中,2365人交代了问题,交代人数占总人数的98%。所交代的问题,多系同学、同事之间的互相检举。

中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与高校有着明显的不同。

1952年4月17日,中央向各地推荐了西南川北区利用寒假把中学教师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和清理的做法,要求各地“在今年暑假期内,仿照川北办法,对中学教职员进行一次思想改造与清理组

---

<sup>①</sup> 中央批转《华东局宣传部关于上海第二批高等学校“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的指示,1952年7月。

织的工作”。5月中宣部在给华北局宣传部的复示中认为，中学的“思想改造与清理组织固然是两个步骤，但以在集中的领导下衔接起来进行较为妥当，也更有效”，所以两个步骤要合为一体，“放到暑期中以集训方式在省（市）去进行（人数太多的地区也可以集中到地委），由省委市委（或地委）直接领导”。

在短时间内集中大批教师搞改造和清理，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是由于没有充分准备，思想改造难免流于形式。不少教师的检讨公式化。如沈阳九中校长张泗洋检讨自己有名利思想，于是大家都照样检讨自己的名利思想，许多党团员均把入党入团的动机说成是向上爬、为名为利。沈阳六中代理校长丁秀玲，是市模范教师，对党忠诚，工作一贯积极，她检讨说这些都是为名为利。丁秀玲这样检讨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样一来不就是没有好人了吗？其次，由于众多人员集中一处，给生活管理带来了相当的不便。如沈阳市暑假集中1800余教师于市内五处地方。集中后，有的宿舍由于臭虫、蚊子很多，许多人无法入睡，白天开会无精打采。伙食管理不善，大家意见纷纷。另外还有100多名女教师怀抱婴儿参加会议，领导者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只得让带婴儿的女教师和身体不好的年老教师先行检讨“过关”，让其回家。另外，由于要求过急，各地过火粗暴的事件时有发生，曾受到中央关注的“米嘉瑞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米嘉瑞是热河凌源中学的老师，平时表现尚好，只是同事认为他有些骄傲。运动中他被扣上了特务帽子，在连续批斗3天后，得了精神病，见人便握手鼓掌、又哭又笑，并站在桌子上喊：“拥护毛主席思想改造政策，打倒官僚主义的高校长。”校长将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报告上级，予以逮捕，不久米嘉瑞死于狱中，十余天后省委得知此事，马上做了严肃处理并报东北局。为了提醒各地注意，中央转发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报告。

1952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各地须做高、中、初等学校思想

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综合报告的通知》，《通知》中说：“今年秋季开学以前，在全国百分之九十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要求各地认真总结，于10月20日以前将总结材料上报。此《通知》发出后，各地陆续开始总结工作，历时一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

关于这场运动的收获，西南局向中央的总结报告中认为，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基本上摸清了各校师生员工（主要是教师）的政治面貌。二、打垮了一向在高等学校中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各种反动思想在群众心目中真正成为非法的东西。在学校中树立了党的高度威信，并初步确立了工人阶级思想领导地位。三、发展了进步力量，改变了高等学校中的政治力量对比。四、在高等学校中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削弱了各种宗派，推进了各项工作。1953年1月10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西南局的报告，肯定了这一总结。

从整个运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以三反运动为界，运动前后阶段在内容、方法上都有不同。

前一阶段在京津地区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开展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虽然有一定的偏差，但基本上是健康的、有效果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对于认识自身确实存在的缺点差距，对于打破狭隘，走出象牙塔去投身实践，都是有帮助的；通过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知识分子开拓了思想视野，开始尝试以新的世界观来认识事物，对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也有了比较深入的体会和理解。

但是在三反开始以后，领导者轻率地发动群众批判运动，搞人人过关，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检举揭发，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粗暴的、过火的，不仅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反而伤害了知识分

子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党的隔膜。

建国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党刚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走出,历史的惯性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思想上和阅历上都十分复杂,党对他们是不熟悉和缺乏领导经验的。客观地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出现一些偏差与失误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毕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些本可以随着环境变化、随着历史发展而加以克服的失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随着“左”的错误发展,“思想改造”一词后来被严重扭曲,几乎成了整人的代名词,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 炮击金门的决策及其影响

苏 格

1958年炮击金门事件,是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一些文献档案的直接或间接的解密和当事人回忆录的问世,使得当今的学者对毛泽东“炮击金门”的战略构想能够有一更深刻的理解。本文力图再现炮击金门战略决策的过程,及其对日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深远影响。

## 海峡危机的前奏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内政。但是,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开始染指台湾。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加强了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惕。

1955年,周恩来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阐明了中国对美国的原则立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sup>①</sup>,使中美建立

---

<sup>①</sup>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周恩来讲在西方引起了广泛注意,见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2),第160页。

了大使级会谈的渠道。然而，美国处心积虑不让会谈取得成果的做法使中国政府感到：美国是在拖延时间，以求从事实上将台湾海峡两岸分裂的状况永远固定下来。

1957年10月至11月，第19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由于美国的压力，大会通过邀请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出席大会，中国、印度和苏联等17国退出会议，以抗议这种公然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动。周恩来此后专门就此对驻华各国使节发表了谈话。周恩来指出：一方面，美国拒不承诺从台湾撤军，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如果中国同意，那就“等于承认美国在台湾的地位为合法”。周恩来重申：“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是个内政问题”。关于同美国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已经作了不少努力，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美国要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是不向别人挑衅的，但是对别人的挑衅我们非回答不行。你不回答，他就会说你默认‘两个中国’”<sup>①</sup>。

此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又有了新的发展。他在11月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而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对改善中美关系毫无诚意的事实，也促使毛泽东酝酿调整对美政策。1958年6月，在外交部务虚会期间，毛泽东就表示：他在1954年曾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他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中国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即不承认新中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对华禁运与封锁），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

---

<sup>①</sup>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53—261页。

社会主义<sup>①</sup>。

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方的原因中止后,半年时间美国既不派大使级代表谈判,又不声明终止谈判。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日内决定派遣大使级代表参加商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意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破裂。美国政府声明称其决不接受这种“最后通牒”式的声明,但又不愿关闭中美之间唯一的会谈渠道。杜勒斯宣布美国将派遣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为美方新的谈判代表,并建议将谈判地点移至华沙。但是,杜勒斯又故作姿态,称美国要等到北京“最后通牒”规定的两周时间之后,才正式向北京转送有关备忘录,以示其没有在“共产党之压力”下屈服<sup>②</sup>。

### 美方的捕风捉影与军事威胁

7月28日,美国驻英使馆致信王炳南大使,通报了美国的上述建议。中方没有答复。比姆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于8月4日同中国驻华沙大使馆联系,希望同王炳南在8月7日举行会谈。但是届时仍未收到中方的回复。比姆再次询问,中方仅答复说此事已经向国内汇报。华盛顿此时急于同中方联系是有多方原因的。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革命爆发,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7月15日,美国以“保卫美国人生命安全”和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为借口,悍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接着,英国又入侵约旦。此后,苏联在中东也有所动

---

<sup>①</sup> 陈毅:“在外交部党组务虚会上的发言”,参见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环球同此凉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67页。

<sup>②</sup> 肯尼思·杨(Kenneth t. Young),《同中共谈判》(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第139—141页。

作。中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注意的焦点。世界各地进步舆论纷纷谴责美国介入中东问题,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美国此时宣布其远东地区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国民党集团借机扩大事态,加紧了军事演习和对大陆的空中侦察,摆出了骚扰大陆的态势<sup>①</sup>。美国如果在此时重开大使级会谈,可以给其增加一个了解中国动态的渠道。

当时美国注意到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宣传<sup>②</sup>。美国情报机构也探听到大陆沿海的一些军事准备,包括沿海机场的活动<sup>③</sup>。此外,赫鲁晓夫从1958年7月31日到8月3日访问了北京。美国十分关注中苏联合公报中关于中苏双方对反对侵略和保障和平“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的表述,以及双方代表团包括的军方高级官员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猜测中国可能会在沿海岛屿,甚至对台湾采取某种行动,但具体是何种行动他们无法判定。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借机宣布金门马祖处于紧急状态<sup>④</sup>。

美国一方面试图同中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武力恐吓。这是杜勒斯惯用的手法。8月10日,杜勒斯发表了一个措辞十分强硬的声明,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声称“要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一短暂政权的完结”。同日,美国国务院还向美国驻



斯还命令此份备忘录内容可以公开<sup>①</sup>。然而，杜勒斯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对手。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发出6天之后，中共中央就正式作出了炮轰金门的决定。

美国对中国方面即将采取何种措施一直在猜测，并紧张地研究对策。美国政府分析中共进攻的意图有如下可能：(1)封锁沿海岛屿；(2)对沿海岛屿进行两栖进攻，或对台湾发起进攻，或对两者同时发起进攻；(3)中共空军可能对台湾机场进行打击。艾森豪威尔的基本想法是，如果受攻击的是台湾本身，美国将“全面”介入<sup>②</sup>。8月1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葛瑞正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制订对策的要求。8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如下对策：(1)如果中共用海空力量封锁沿海岛屿，美国将给国民党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海上运输和补给；(2)如果中共空军袭击台湾，而台湾空军无法抵御时才可动用美国空军。如果中共轰炸台澎，美国将攻击大陆机场；(3)如果中共大举进攻沿海岛屿，美国除提供海空保护，以击退进攻外，还将通报联合国；(4)中共大举进攻台澎，美国将全力击退进攻。在上述二至四项，参谋长联席会议均提到动用原子武器<sup>③</sup>。艾森豪威尔的想法，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火药味”要淡一成，他认为，“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美国应该防止敌对行动的扩大”。他指示：如果美国被迫介入，即使美国断定中共的目标是台湾，美国最初的反应也将限于对船只和机场进行空袭，而不对内地施行攻击<sup>④</sup>。

---

①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1958年8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第36期, 1958年11月3日。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Waging Peace),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5, 第294页。

③ 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商务印书馆(台北)1985年版，第54—56页。

④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Waging Peace), 第295页。

当时杜勒斯不在华盛顿，军方和国务院在是否由政府出面发表一个强硬声明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国务院的意见是通过发表强硬声明，使共产党方面不敢“轻举妄动”。而军方倾向于不发表，这样可以“使中共琢磨不透”。艾森豪威尔亦倾向于此。其原因有三：首先，此举将对中共产生威慑效果；第二，美国事先也难以判定自己将采取何种举动；第三，使蒋介石猜不透美国在何种情况下才会全力支持他，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反攻大陆的行动有所抑制<sup>①</sup>。

杜勒斯回到华盛顿之后，国务院于8月22日召开了会议，作出下列决定：(1)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向台湾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并向台湾当局提供登陆艇、导弹、火炮和军需；(2)以杜勒斯向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摩根公开回信的方式，向中共施压。因为在此前，摩根致信国务卿，对所谓中共军队集结的情况表示“严重不安”；(3)为了安抚台湾，指示驻台“大使”与台湾方面澄清防御条约的范围，即若中共大举进攻，则可以报复，但小规模进攻不在此列<sup>②</sup>。杜勒斯虽极力主张以国务院发表声明的方式向中共进行“战争边缘”式的讹诈，但他又知道艾森豪威尔不倾向于由政府事先发表声明。杜勒斯采取公开复信的办法，至少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其一是遂了他的意愿；其二是答复了国会议员；其三是缓解了台湾方面的猜疑，因为此期间蒋介石也一直在向美国施加压力。而且，杜勒斯还不至于违抗总统的旨意。

杜勒斯于当地时间8月23日，也就是北京时间22日，发表了致摩根的回信。回信称：国务院对中国军队集结一事“深感不安”，这意味着中共可能强夺金门或马祖。杜勒斯在信末恐吓说：共产党的上述举动在他看来，将构成“对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威胁”。因此，

---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Waging Peace)，第295—296页。

② 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第56—58页。

他希望也相信“这种情况还是不要发生”<sup>①</sup>。但是,以“战争边缘”的手段来威胁中国,那只能是杜勒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这封信发表的第二天,中方炮击金门的行动就开始了。

## 炮 击 金 门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炮轰金门、马祖的作战方案。而原来列入该次会议议程的17项议题中,并不包括炮击金、马<sup>②</sup>。炮击金门的方案虽然刚确定,但其战略构想,毛泽东在7月份就已经基本形成了。7月中旬,当时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接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的电话,电话传达了毛泽东让其担任指挥炮击金门的任务。叶飞接受了命令,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思路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当时叶飞已经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的职务,虽然按国内惯例,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军区政委,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是负责党务和福建省的全面工作。叶飞的疑问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不由军事将领来指挥,反要党的行政干部来领导呢?<sup>③</sup>

叶飞和张翼翔副司令员、刘培善副政委立即赶赴厦门前线,进行具体准备。至7月26日凌晨,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全部进入发射阵地,作好了射击准备。然而,7月27日,北京给福建前线发来了一份电报,内容是毛泽东写给彭德怀和黄克诚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称:“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毛泽东联系到当时的中东局势,分析道:“中

---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Waging Peace),第296页。

② “潇洒莫如毛泽东——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林克访谈”,王凡:《知情者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③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1993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因此不必着急。至于台湾方面此时摆出的骚扰大陆的架式,毛泽东信中却说:“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强调了要“政治挂帅”,叶飞领会这是指此次炮击金门是不同往常的一次行动,不能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sup>①</sup>。

与此同时,空军入闽行动也正在聂凤智指挥下完成。聂凤智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此时已由中央军委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到了8月中旬,一线机场已进驻了6个歼击机团。同时,炮兵调来3个师和1个坦克团。东海舰队也已部署就位。就在“万事俱备”之时,叶飞被毛泽东召至北戴河。毛泽东在听完作战方案汇报后,所考虑的问题却是:“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林彪在此后还给毛泽东一个条子,建议能否让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毛泽东的考虑和林彪的建议大大出乎了军队指挥员的意料,因为告诉了美国人就意味着告诉了国民党,那么炮击就势必失去奇袭的效果。但是,担任指挥员的叶飞逐渐对毛泽东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的战略意图有了更深的理解<sup>②</sup>。最后,毛泽东认为美国不可能因为有一两个顾问在炮击中伤亡而宣战,毅然决定不向美方暗示<sup>③</sup>。

8月23日,炮击金门开始了。傍晚,福建前线的近500门大炮一齐向金门开火,不到1个小时就发射炮弹2万发,硝烟顿时吞没了金门、大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到28日,共发射炮弹10万余发。此后数日,在金门海域还发生激烈海战,台湾向金门的补给船,也受到解放军海军的重创。金门炮击一开始,美国和世界的注意力

---

①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②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③ “潇洒莫如毛泽东——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林克访谈”,王凡:《知情者说》,第132页。

都让金门吸引过来了。美国在该地区调遣的兵力骤然增多,仅10天左右,美国在台湾海峡就集结了7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40余艘驱逐舰。美国空军巡逻队和海军陆战队航空队也进驻台湾和菲律宾。此外海军陆战队3800人在台湾登陆<sup>①</sup>。

美国虽然集结了重兵,但摸不清中国的意图。华盛顿军政部门一派紧张,如临大敌地研究对策。8月23日,杜勒斯首先提出三点建议:(1)如果炮击金门导致局势危急,可能导致美国干涉;(2)台湾反攻大陆的活动,虽有利于提高国民党的士气,但此举将牵动全局。要改变共产主义体制,决定的因素在其内部的变化,而不是外部的刺激;(3)视可能,将台海危机提交联合国<sup>②</sup>。8月25日,艾森豪威尔主持讨论后,决定向台湾增加援助,包括导弹和舰艇,准备承担台湾的空防,还准备给台湾的补给船护航。关于军方有人提出的动用原子武器的想法,艾森豪威尔指示不给国民党透露这张底牌<sup>③</sup>。8月29日,美国确定了美舰只护航到金门3海里外的公海,并于次日通知了台湾方面<sup>④</sup>。此期间,美国官方发表两次声明,一次是8月28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声称美国不会将中共对沿海岛屿的进攻看成是“有限的军事行动”。另一次是9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声称美军已经作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威胁解放军不要试图强占金门、马祖<sup>⑤</sup>。

---

① 参见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② 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第72页。

③ 霍尔珀林(Morton Helperin):《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第112—115页。

④ 霍尔珀林(Morton Helperin):《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第199页。

⑤ 郑永平:“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载资中筠、何迪辑:《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

## “打打停停”、“谈谈打打”

然而,9月3日毛泽东突然命令,“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9月4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国的一切领土。同时宣布:“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sup>①</sup>。由于金门岛在12海里的范围之内,此举显然是为了以静观动,看美国如何动作,以弄清美国在台湾和金门马祖问题上究竟准备介入多深,其长远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在此期间,蒋介石于8月27日和9月4日两度致函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台湾采取共同行动。具体要求包括:(1)允许台湾空军轰炸大陆机场、军港和炮兵阵地;(2)由美国就保卫金门发表官方声明;(3)美海军对台湾赴金门补给船只护航;(4)授权美国驻台司令不经请示华盛顿直接决定的权力。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对其提出的要求又不愿、也不能全部满足。例如,作为美军三军统帅,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军队的指挥权让出的<sup>②</sup>。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罗得岛新港的“夏季白宫”商量对策后,于9月4日发表声明,大意是台湾和金门马祖同为“自由中国”范围,根据其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国会通过的有关联合决议,美国总统已获授权保卫上述地区。美国在向中国方面进行威胁,又在声明提及已中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暗示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以同“中共政权”达成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协议<sup>③</sup>。

---

①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Waging Peace),第298—299页。

③ 《美国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1958年9月29日,第445—446页。

9月6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除了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外,主要包括两点内容:(1)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就“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2)中国一贯倡导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尽管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粗暴地破坏了国际关系中最起码的准则,中国政府仍然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和缓和消除”。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sup>①</sup>。当天,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周恩来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同时,又忙于向国民党方面解释美国参加谈判将不损害台湾的利益<sup>②</sup>。

苏联因素对此时的中美关系也产生了微妙影响。中国炮击金门的决定事先曾通报苏联,但是赫鲁晓夫仍担心中国军事行动会就此扩大,从而影响苏联同美国关系的缓和,甚至将苏联拖入同美国的战争。9月5日晚,葛罗米柯秘密访华。周恩来向苏方表示炮击金门和马祖并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对国民党军队施以惩罚,挫败美国推行的“两个中国”政策。苏联在知道中国行动的“底牌”后,赫鲁晓夫于9月7日发表致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表示苏联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给予援助”,同时呼吁美国撤军<sup>③</sup>。9月19日,赫鲁晓夫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但该信被美方退回。苏联还通过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表示,苏联愿意出动空军以对美蒋海军产

---

① 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Waging Peace),第300页。

③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1958年9月7日,《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0—945页。

生威慑作用。但此建议以后被毛泽东指示以婉言谢绝<sup>①</sup>。

9月7日,美舰开始在白天给蒋舰护航。我军前方请示:美军直接介入,是否打?毛泽东指示:“照打不误”。但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当指挥员请示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是否还击,毛泽东指示:“没有命令,不准还击”。9月8日,美国第七舰队旗舰重巡洋舰“海伦娜”号亲自出马,率领6艘驱逐舰的特混舰队护送国民党运输船队向料罗湾码头实施补给。当解放军炮兵群向卸货的蒋舰和金门岛发起压倒性的攻击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美国护航舰队一炮未发,在旗舰指挥下一齐转向180度,逃至公海。中共最高决策机构至此掌握了各方的情况:中方力图避免同美国直接冲突,美国也力图避免同中方的冲突,而国民党则力图将美国拖下水<sup>②</sup>。在当天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已被自己制造的绞索套住”<sup>③</sup>。

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讲话。讲话除了对中国的例行攻击以外,还提到赫鲁晓夫给他的信件。艾森豪威尔一方面宣布美国无法接受让其撤军的建议,表示美国在“武装侵略”面前,“决不会后退”;一方面又声称“除了付诸武力以外,还有一条好得多的道路”,这就是“谈判的道路”。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已经指示美国驻华沙大使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sup>④</sup>。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在王炳南大使返回华沙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并指示其

---

① 关于葛罗米柯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曾要苏联“采取一切手段对入侵美军施行袭击”的说法,与中方与会人员的回忆有原则出入。见魏史言:“葛罗米柯关于台湾局势同毛泽东主席谈话的记忆与事实不符”,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8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5页。

②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④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台湾海峡局势的电视广播演说”,1958年9月11日,《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第946—951页。



在日后的会谈时,多用“劝说”的方法,譬如说:美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也不小。美国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与六亿人民为敌呢?毛泽东还指示在交谈中要谦虚谨慎,不要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因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sup>①</sup>。然而由于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松动,会谈陷入了“程式化”,没有任何结果。

## 美蒋矛盾的深化

9月8日炮击后,蒋舰仍在美舰护航下设法给金门补给,但当大陆炮声一响,美舰就逃向公海。此时,美国面临着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压力不仅来自美国的盟国,更来自国会和公众,要求美国放弃其金门马祖政策<sup>②</sup>。艾森豪威尔9月11日讲话和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举行之后,台湾方面和美国的矛盾也逐步激化起来。蒋介石于15日发表谈话,将炮击金门视为共军“进犯台湾的序幕”,他认为中共最终意图有三:第一步是将美国赶走,第二步是进入联合国,第三步就是成为五强之一。蒋介石特别指出:“美国 and 整个自由世界”绝不能“犹疑不决”、“姑息萎缩”。此后,叶公超公开声称,国民党不赞成“停火”;此后国民党“外交部”发表声明反对金门、马祖问题“中立化”的建议。9月28日,蒋介石再次发表谈话,声称:“无论盟帮态度如何”,国民党的政策都不容“瞻顾徘徊”<sup>③</sup>。

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谈话。有记者谈到美台当年在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时所进行的换文中对双方使用武力的限

---

①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3页。

② 参见郑永平:“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载资中筠、何迪辑:《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第145页。

③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60—164页。

制时,杜勒斯回答道:美国并不认为在台湾海峡“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义务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美国表示了“默许”,并没有“赞同”。当记者问及在何种情况下国务卿认为“可以实现撤退”时,杜勒斯竟然表示:如果该地区实现“可靠的停火”。杜勒斯还称在金门马祖部署大军是“愚蠢的”,而要继续驻扎下去更是“不明智,也是欠谨慎的”<sup>①</sup>。杜勒斯的这番话十分明确地反映了美国的意图:美国打算以让出金门和马祖为条件来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在海峡之间确立一条永久的分界线,达到“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目的。美国的这一打算,引起了海峡两岸出自不同原因的深思与共同的反对。

蒋介石对杜勒斯讲话极为不满,认为国民党对之“并无接受的义务”<sup>②</sup>。而中共中央也因炮击金门以来,摸清了美国的意图之后,正在酝酿着重大的政策调整。杜勒斯的主张和蒋介石的反应传到北京之后,更促成了中央的决策。原来中央的计划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后来在了解到美国的动向后,遂决定“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在美国人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时,我们不让其脱身,要的是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央制订的策略是:“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最后,达到使“美军不劝蒋军撤走”的目的<sup>③</sup>。10月6日,彭德怀发表了实为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宣布从10月6日起暂停炮击7天。台澎金马军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

---

①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节录)”,《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第965—968页。

②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64页。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62—267页。

人护航为条件<sup>①</sup>。外交部发言人呼吁台湾当局“以和平为贵，以爱国为重”，“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不应该让美国人干涉”<sup>②</sup>。此后，外交部又针对美国鼓吹的“永久停火”建议发表谈话，指出：我军停止炮击金门多久，纯粹是我国内政问题，美国人根本无权过问。“中国同美国没有打仗，当然谈不上停火。”<sup>③</sup>10月13日，彭德怀再次下令，从即日起，再停止炮击两周。条件是：“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sup>④</sup>。

在金门炮击暂停期间，台湾和美国方面各打各的算盘。10月15日，蒋介石在回答《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提问时，用尖锐的语言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和“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了台湾无可争议的是中国领土。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还亲临金门，深入战壕巡视。当时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还受蒋介石之托，三赴金、马前线慰问国民党驻军。10月21日，杜勒斯利用金门炮击暂停的时机，匆忙赴台同蒋介石会谈。就在杜勒斯前往台湾途中路过阿拉斯加时，解放军对金门恢复了炮击。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现在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是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打乱了他的计划。”<sup>⑤</sup>

炮击的确打乱了杜勒斯向蒋介石施压的计划。杜勒斯在阿拉斯加发表声明，称他此行旨在完成“和平的使命”。因为在一周前，中共宣布其至少再停止攻击两星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台湾将是

---

① 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② 1958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③ 1958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④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⑤ “潇洒莫如毛泽东——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林克访谈”，王凡：《知情者说》，第133—134页。

“有益的”。然而，杜勒斯称：“如果共产党恢复他们的战斗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我们的措施就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sup>①</sup>。杜勒斯原意是压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造成“划峡而治”的既成事实。如果当时继续“停火”，杜勒斯势必全力压蒋介石撤出沿海岛屿。但毛泽东有意安排的恢复炮击，就给了蒋介石坚守金、马一个顺理成章的借口。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杜勒斯同意了《联合公报》第二条的措辞，即：“双方公认在当前情况下，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御上有密切之关联”。而蒋介石接受了公报中的第六款的限制，即：“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然而，这一使命的“基础”，在于“人心”，“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并非凭借武力”<sup>②</sup>。

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福建前线逢单日不一定打炮，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和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便“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文告特别揭露了美国“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提醒台湾同胞“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sup>③</sup>。10月25日以后的炮战，演变成纯粹政治意义的行动。例如，11月3日，毛泽东指示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目的是“影响美国选举”和“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此次行动是对准军事目标的。除此之外，炮是象征性地打在沙滩上，没有军事意义。这样，通过金门炮战，海

---

①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大陆恢复炮击金门发表的声明”，1958年10月20日，《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第989页。

②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74页。

③ 1958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

峡两岸形成了一种对付美国人的“默契”<sup>①</sup>。

## 炮击金门的战略意义

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何时打，何时停，何时象征性地打，何时真打，完全操之于我。例如，平时我方的炮是不打蒋军阵地和居民驻地的，逢年过节一般都停击三日，以后炮弹头里还不装填炸药，而装载宣传品。然而，在1960年6月18日，艾森豪威尔干涉中国内政，对台湾进行“正式访问”时，中国政府实施了“万炮齐发轰瘟神”行动。6月17日，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宣布按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和19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日子，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公告特别提醒金、马同胞“务必呆在安全地带，以免误伤”<sup>②</sup>。

“炮击金门”，毛泽东把话说透了，“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sup>③</sup>。我方围绕台湾问题的外交斗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sup>④</sup>。而美国“划峡而治”和“两个中国”的蓄谋遭到彻底的失败。

---

① “潇洒莫如毛泽东——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林克访谈”，王凡：《知情者说》，第141页。

② 196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③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3页。

## 知青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史 卫 民

1973年6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并不是按计划在这个时候召开的,而是因为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的关注,使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安置办公室等专门机构,工作重点就是把中学毕业生成批地从城镇送往安置地点;中央和各地制定的知青政策,也是侧重于安置。各地农村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牧场的基层干部,肩负起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等责任。各地党政机关都按照中央的指示,指派专人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央和各省、市的调查组、慰问团等亦经常下到基层访问知识青年,从上到下都很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各地的调查情况看,几年来,农村、农场等妥善地安置了大批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入团、入党的人数激增,还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提拔为基层干部,知识青年无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改造,各方面的成绩颇为喜人。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的调查组、慰问团已经发现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知识青年也上书反映所面临的困难,但都没有引起重视。更为严重的是摧残知识青年的事件在各地屡屡发生,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一定要对各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严肃处理,但基层单位具体执行起来却问题很多,很大一部分案件只

是进行了一般性处理,甚至有些案件处理不了,坏人逍遥法外。对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人们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涉及其内部的问题。各地都召开过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或座谈会,也主要是总结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好经验。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主席,陈述自己的子女在农村生活的窘境和在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招干的“走后门”现象,揭露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于1973年4月25日回复:“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引起了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视。4月29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等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周恩来强调指出:“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在讲话中,周恩来谈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归侨、成分、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要提高,要考虑解决已经下乡的这部分青年的实际困难。要研究口粮问题,调查多少口粮才够吃。卫生部门要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有严重地方病的地方知青不要去。要关心下乡知青的婚姻问题,女孩子妇女病很多,是个问题,既要关心女青年的健康,也要对女青年进行卫生常识教育。归国华侨除安置在华侨农场外,一般不要去农村。不能乱改下乡知青的成分。选择地点安置知青时要考虑到青年能够在那里站住脚,不能长期靠补助;边疆地区潜力很大,要逐步开辟。要看到多数青年是好的,问题是做工作。要给青年精神食粮,把他们管理教育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农村需要这些有文化

的青年。对于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参谋长奸污女知识青年数十人的罪恶行为，周恩来愤怒地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这是林彪的团长。不要手软，要大胆管，公安部要派人去。青年下去要有干部带领，特别是跨省安置的，城市要派出干部一起下去。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么搞在计委劳动局下面一个小组了？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发展的需要。

这次会议虽然只提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问题的一些初步看法，却为后来的知青政策调整定下了基调。会后，国务院组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小组”，前往12个省、自治区进行工作调查。5月30日，调查小组起草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上报国务院。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将李庆霖的上书、毛泽东的复信和中共福建省委5月17日发出的《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印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要求向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传达。同时通知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其中1人专管知青工作）来中央汇报和研究统筹解决知青工作问题。

1973年6月22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123人，来自中央19个部门（包括各报刊、出版单位），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大军区及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州、云南5个生产建设兵团。

会议期间，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徐秀峰、于明向国务院报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存在严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四师十八团，70%以上的人员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识青年。这个团的部分领导人，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青年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镇



压。据1972年4月统计,十八团30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被吊打的知青,绝大多数仅是有骂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劳动偷懒等缺点、错误,还有的人仅是看到干部吊打别人,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而被吊打的。

对这些严重事件,四师党委也曾派人做了调查,但却不做严肃处理,以致其他单位也不断发生类似事件。在传达了中央有关知识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后,十八团还继续发生打人事件;十七团正在团部附近修建黑洞洞的禁闭室,准备对有错误的知识青年实行禁闭;十七团二营还以办“学习班”的形式捆人打人。

7月6日,周恩来在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一、请登奎电话告周兴同志,负责保护这两位分社记者。二、请中组、总政、国务院政工组、农林部、公安部各派一位得力同志,飞往昆明,请省委、革委会、军区政治部派一调查小组与中央各部门派去的人合在一起,前往现场,经过分开调查,然后容许找群众分开谈话,容许控诉。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代,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组长应由省委指定一位负责同志担任,中央部门去的同志可选一人为副组长。一切调查和报告,均先在省委作出决定,后执行。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

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于7月8日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递交了检查报告,一致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非常重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决心遵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处理。报告中说:“云南建设兵团的问题较多,四师十八团的问题,其他师、团也存在……几年来,名曰省委、军区党委都管,

实则都没有很好去管,有了问题互相‘踢皮球’,军队推地方,地方推军队……”“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已经抽调干部组成了调查小组,集中学习中央[1973]21号文件、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研究已掌握的材料,提高路线觉悟和政策思想水平,准备和中央来的同志一道去解决4师18团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拟再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分头到建设兵团的各师,同他们一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结合贯彻21号文件,深入路线教育,并严肃处理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

7月9日,周恩来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国锋同志:请将新华社云南分社的报道(不要印分社记者姓名)和这一报告印发给工作会议同志一阅,请他们各回本省严格全面地检查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生产队以及国营农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按照这次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所规定的各项办法,予以彻底实施。”

会议收集反映上来的还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任人唯亲与“走后门”情况严重、对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甚至蓄意包庇纵容坏人、领导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知识青年思想不稳定等5方面的问题。

7月中旬,周恩来将反映河南省“青年队是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种好形式”的《会议简报》18期推荐给毛主席阅,并指示新华社派人到河南省进行调查了解。

7月25日,会议领导小组将讨论修改后的《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于当天晚上开会,讨论了这个报告,周恩来等人也都认为不要再搞运动,他在会上特别指出:可以给各省打个招呼,黑龙江原定开个5万人的大会,没有开,你们回去还是层层教育。各县有了一些典型材料,更容易通一些。上山下乡怎么提法好?还是提工作较好。周恩来还指示会议

领导小组,立即将下乡女青年邢燕子、侯隽、徐明光接到北京来,请她们对《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意见。

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问题的六条意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作为附件随《报告》一同下发。

8月6日晚9时至11时,中央政治局的各位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同志,周恩来在接见时作了长篇讲话。

他首先要求将国务院的报告发到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党委,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两个附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自治区根据附件制定自己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办法后下达。

在强调了发展农业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重要性后,周恩来指出:过去知识青年下去,热情很大,但我们安排得不好,所以要开这个会。对会议讨论决定的知识青年的四种安置方式,周恩来做了具体解释。

第一种,插队,可以个别的去,可以一批一批的去,有跨省的,有不出省的,有回老家的。每个公社有几个干部带着,干部兼公社、大队的职,带工资下去,专管知青,不仅管政治,也管生产。干部可以轮换,3年或更长时间轮换一次。青年可能各种思想都会有,对下乡的意义认识不一定清楚。光靠去的干部不行,还要靠当地干部、贫下中农帮助他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总可以改造好的。一个小组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干部、贫下中农也是一种锻炼、考验,看能不能帮助他进步。能回老家的,还是回老家,比较便当。大城市的青年,17岁下去比较好,要满17岁。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20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

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到了结婚年龄住房还有困难的，要再补助些。去边疆的，补助经费要多些。

第二种，是以青年为主，有带队干部、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成立单独核算的青年队，就是河南的办法。在人比较少、地比较多的地方，给下乡青年分点地，大家都安排下。河南的同志想一想，做出点经验来。

第三种，办集体所有制农场。投资要多些，好处是可以开荒或恢复熟荒。一般都在边疆，补助也要多点。把权力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实事求是地订出各自的规划。

第四种，搞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一个通病就是开支大，开支不是给青年用了。开支大不赔钱的还没有。开支大问题主要是按照军队的办法办，司、政、后一大套，非生产人员多。生产建设兵团头大脚轻，非常不适应生产，不好领导。最近介绍一个外国记者去访问一个兵团，那里原先有一片住房质量很差，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外国记者路过那里，他们就把那片房子拆了重盖，而别的地方还是原样。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对比起来看，也很不好啊。住在那好房子里，心也不安。还有不管什么人去，就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一番。这个风，省、地也有，非刹不可。要从我们上边刹起，遇到这个就是不吃，使他冷场。这是不好的风气，利用客人来了大吃一通，真正用到生产上的投资反倒少了。兵团要用记工分的办法。

周恩来还指出，现在精神食粮太少，不光是出自然科学的书，还要有文学的、历史的等等。不光是精神的，还有物质的；如盖房的木料，要保证供应，不许挪用。有的地县扣用了，要处罚，要赔出来。毛主席提出要统筹解决，这次会议就是按照主席指示统筹解决，把工作搞好。各省有好的典型经验，要告诉我们。文件传达下去，已经下乡的600万知识青年会写信来，负责信访工作的同志要有准

备,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要向上反映,不要压下来。各个地区来了至少两三位同志,回去要好好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又说:“我还得说两句。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设个组管这个事,大家不希望摆在农林口,要摆在省委管。确实需要有个专门机构,一定要有女同志参加。”

应当指出,这次会议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中一个重要转折,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根基。此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

1973年以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分散安置在农村社队(主要是边远贫困地区),或是集中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或是返乡务农。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计划1973—1980年动员1300万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并对知识青年的去向做了新的构想。1973—1976年,实际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为687万人,其中到农村插队的为486万人,到集体场队的有126万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为75万人,农村插队虽然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但已不再强调过去那种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分散安置办法,而是希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相对集中,便于管理并有利于解决生活问题。同时,也不再强求向边疆贫困地区大量输送知识青年,而是挖掘城镇郊区社队的潜力,尽可能在远近郊区安置下乡知识青年。集体场队是在知青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新事物,从1974年开始试验并推广,其性质明显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插队。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前途问题,显然有了新的考虑。过去强调的是送下去扎根,基本不考虑城市回收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知青工作会议之后,各级领导已经认识到必须有上有下,造成良性循环,于是在安置新的中学毕业生时,大多已经考虑到城市的回收问题。有的城市(如北京市),逐步采用一届顶一届的办法,知识青年下乡

锻炼的时间为 2 至 3 年,随即招回城市安排工作。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绝对人数,在 1973—1976 年中确有增加,但是周期缩短,回收速度加快,与以前的做法有了极大的不同。对 1973 年以前下乡的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招生及病、困退等途径,启动并加快了回收步伐。尽管从理论上讲,还是要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方向,宣扬在农村扎根的思想,但政策的转变,实际已使运动本身开始走向终点。

##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庶是怎样 被追认为烈士的

钱文益

提起张国焘,无人不晓,说起张国庶,却鲜为人知。张国庶是张国焘的同胞兄弟,化名周之德,1905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市金山镇高山村,在家排行老三,1923年考入萍乡中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次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担任共青团萍乡县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克萍乡后,他参加萍乡各界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曾任国民党萍乡县党部执行委员、萍乡县总工会主席等职。1926年冬,由共产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春天回国,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他不仅积极支持配合中央苏区武装斗争,而且深入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领导发动农民暴动。1930年5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不幸在南昌被捕。

张国庶被捕后,敌人曾以高官厚禄相许,诱他投降,他严辞拒绝。敌人又施以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同年冬,张国庶被国民党特务装进麻袋沉入赣江而壮烈牺牲,时年25岁。当时的《南昌晚报》作为新闻报道说赤匪头子周之德被处决。张国庶牺牲时,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解放后,张国庶因化名为周之德,家乡又找不到他为革命牺牲的其他材料,故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5年原中顾委委员孔原回乡省亲,在萍乡烈士纪念馆,没有看到当年的老学友、老战友的英名,非常感慨。回京后,亲自找原国家主席、曾在中央苏区组织部工作的杨尚昆了解,证实张国庶确

是一位党的好干部，没有叛党行为，是为革命壮烈牺牲的，并亲自写出了证明材料。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也出示了张国庶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证明。同时还调来了贵州省档案馆原审讯张国庶的国民党特务南昌侦缉队长的交待材料，也旁证了张国庶没有叛党行为。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对张国庶追认烈士问题非常重视，1986年11月20日，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张国庶为革命烈士，并在萍乡市烈士纪念馆陈列烈士事迹。

张国庶被追认为烈士后，张国庶的弟弟张国静深有感触地说：“大哥张国焘反党叛党臭名远扬，三哥张国庶壮烈牺牲英名永存。”



# 邓小平担任过哪些重要职务

王 乃 德

邓小平从 1922 年夏在法国参加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到 1989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

## 在旅法留苏期间的职务

1920 年 10 月,邓小平抵达法国,开始了勤工俭学的艰苦生活。1922 年夏,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 年 2 月,旅欧少共机关刊物《赤光》出版第一期。邓小平参加编辑、出版工作,被他的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周恩来是他的直接领导。此外,邓小平和其他人还办过《工人日报》,担任旅欧青年团支部宣传干事。1924 年 7 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同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由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团的日常工作。

1925 年春,邓小平在里昂做工时,担任中共里昂区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中共组织和共青团工作以及华工运动。同年夏,邓小平与中共旅欧支部其他同志一道组织和领导旅法勤工俭学青年、华工和各界华人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6 月 7 日,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行动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行动委员会中文书记。

1926年1月,为躲避法国警方的监视和驱逐,邓小平等人秘密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先入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时曾任该校第七班党组书记。同年底,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邓小平和刘伯坚等人启程回国拟到冯玉祥军队工作。

## 在冯玉祥部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职务

1927年3月,邓小平由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辗转抵西安。不久,到冯玉祥统率的国民联军所属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并任该校中共组织书记。

1927年6月,冯玉祥在其部队和所辖区域遣送共产党人离军和出境后,邓小平根据党的指示离开冯部,赴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7月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秘书。

同年8月7日,邓小平列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后,邓小平继续留在汉口中央机关工作。同年底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

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第十七号通告中称:11月9日中央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常委下设组织局、党报委员会、职工委员会。中央组织局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工作,批阅文件,组织各种会议,管理秘书工作,负责会计和经费分配以及与各省来人接谈等等。规定中央秘书处受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周恩来一度代理组织局主任。邓小平主管秘书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印、外部交通、文件保管、内部交通、翻译等5科以及密写文件处、文件阅览处和文件保管处。此外,邓小平和周恩来、余泽鸿等人还领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随着中央机构调整和变动,组织局取消,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处理中央日常事

务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精心选择了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 1141 号一幢小楼房，作为秘密存放中共中央档案的库房，建立了党中央地下档案库，完整系统地保留了档案资料，是对党的一大贡献。

## 在广西担任的领导职务

1929 年 3 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逐出广西。俞作柏、李明瑞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省绥靖司令，掌握广西军政大权。俞、李主政后，一方面全部开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方面表示愿和中共合作，并要求中共方面派人到其军队工作。据此，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开展对俞、李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统一领导党在广西的工作。

大约在 1929 年 9 月间，邓小平到达南宁，以广西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分，活动于广西上层。同年 9 月 10 日到 14 日，他与贺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等人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建立红军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指示。按照中央指示，广西军委成立，邓小平兼任军委书记。11 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前敌委员会，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为常委，邓小平任书记，对左右江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12 月 11 日，邓小平与张云逸等人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随后，广西前敌委员会改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邓小平继续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党和军队工作。

1930 年 2 月 1 日，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既定部署，李明瑞、俞作豫在广西龙州率部起义。中共左江特委和军委在龙州召开群众

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会议名义通过警备第五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的决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此时邓小平不在广西),红八军受红七军前委领导。同月上旬,邓小平由上海回到广西龙州,召开左右江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了红八军临时前委,邓小平兼临时前委书记。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总政委。

11月7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又名邓岗)的主持下,红七军党员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邓小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消灭两省军阀”,“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江北发展”。对此,邓小平、张云逸在会上表示不同意这一“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但被否决。会议改选了红七军前委,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当选为委员,邓小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兵委,邓拔奇任兵委书记,从组织上增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力量,使邓小平坚持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实际上被剥夺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会后,红七军按照前委的决定进行整编。整编后的红七军由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等3个师和炮兵营、特务营、教导大队。邓小平兼十九师政治委员,辖第五十五团、五十六团。

因执行攻打柳州、桂林的“左”倾冒险主义遭到失利,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前委由邓小平主持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会议认为,就红七军目前状况,攻打柳州、桂林已不可能,决定部队先休整一段时间并开展群众工作,尔后向广东北江发展。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将2个师4个团缩编为2个团。以邓拔奇为书记的兵委亦被撤销,红七军又回到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之下。

## 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的职务

1931年2月中旬，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第五十五团进占江西崇义县城，发动群众，配合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斗争，并在崇义地区建立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不久，红七军前委取消，中共红军第五十五团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书记，受中共赣南特委领导。因敌军到崇义城附近，红五十五团撤出崇义县城，转至上犹、遂州边境地区活动。中共五十五团委员会决定邓小平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有关红七军今后行动。邓小平由杰坝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余惠接任中共五十五团委员会书记，并任该团政治委员，率部向湘赣苏区挺进。

邓小平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写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地汇报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发展经过和左右江地区党组织状况及土地革命等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自己在广西工作的经验教训。但是，因为他的不少观点与当时的“左”倾领导产生了分歧，中央根本不听取这个报告，于是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到苏区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

同年8月，邓小平与金维映等人经闽西到达瑞金。此时，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和余泽鸿也在瑞金。经大家研究，一致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上任伊始，立即着手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大批无辜被捕的干部群众；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在短时间内平息了事态，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

1932年5月下旬，因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古柏调省苏维埃裁判部工作，邓小平离开瑞金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任职时间只有1个多月。同年6月，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决定建立会（昌）寻

(乌)安(远)中心县委,以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会昌、寻乌、安远3县的领导。7月,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上属江西省委领导,下辖会昌、寻乌、安远县委。同时,他还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

在任期间,邓小平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决抵制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受到了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打击。1933年2月,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3月底,邓小平中心县委书记一职被撤销,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5日,江西省委又撤销了邓小平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邓小平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接到命令要其“返回省委”。邓小平回到宁都后,即被指定在江西省委驻地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劳动。

1933年6月下旬,由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的帮助,邓小平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协助王稼祥、贺昌处理日常工作。邓小平在这个岗位工作了两三个月就转任总政宣传干事,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直至1934年12月中旬。

## 在长征中和长征以后的职务

长征初期,邓小平仍任《红星》报主编,他和《红星》报被编在军委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

1934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又一次出任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列席了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太会议。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也是邓小平人生经历的一个转折点。他由被打击转为被信任和重用,从此得以施展才干,开始了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同年6月,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1936年2月下旬,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部长的邓小平,参加了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的战役。他带领宣传部的干部战士随一军团主力渡黄河,先在军团政治部、后随红八十一师,到晋西,下晋南,转战山西的十六七个县,行程千里。他领导宣传、扩红、筹款和其他群众工作。他所在的红一军团在东征中扩红5000余人,筹款20余万(银元),并缴获了很多军用物资。同年5月初,邓小平和部队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同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参加西征战役。11月12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提请军委任命关向应为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红三十一军军长,并请明令发表。14日,军委主席团批准邓小平接替朱瑞(改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1937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杨尚昆等人负责北方局工作。14日,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电示陈光、聂荣臻、邓小平等:“因中央决定调动杨尚昆红军总政治部兼前敌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根据军委指示,邓小平接替杨尚昆,邓须于一星期内赶来前总驻地云阳镇。罗荣桓接替邓小平”。

##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职务

1937年8月25日,邓小平任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9月6日,和朱德、任弼时、左权在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20日,作为八路军代表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委员。

同年10月中旬，邓小平受八路军总部委托，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韦国清等五六百人，远离八路军主力部队，为执行毛泽东关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的战略任务，到汾阳、孝义等地活动。

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由傅钟接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8日，邓小平到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就职。从此，他和刘伯承率部开辟太行山区，创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作战。1939年8月，太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山北部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和其他工作。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决定改太北军政委员会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仍担任书记。该委员会是冀南、太行、太岳3区党政军民各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6月，晋冀豫军区撤销，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成立，邓小平兼任太行军区政治委员。1941年3月16日，他受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18日提议被通过。他于7月7日出席了在辽县桐峪镇举行的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全体会议。9日，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议员。30日，被选为驻会委员。1942年4月25日，任一二九师整风检查委员会主任。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太行分局，邓小平任分局书记。分局领导太行、冀南、太岳、晋豫4区工作。1943年4月25日，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主任。同年还兼任一二九师生产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负责全师的大生产运动。9月，彭德怀、刘伯承先后离太行返延安。10月6日，中央决定太行分局并入北方局，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由邓小平主持前方总部的工作。北方局下属太行、太岳（与晋豫合并）、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直接由八路军前



方总部领导。21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分局领导冀南、冀鲁豫和水东区（黄河以东）工作和党组织。平原分局上属北方局。

从1941年开始，邓小平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重任。他坚持“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并领导华北各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不止一次地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彰。1945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等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称为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人民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职务

1945年冬晋冀鲁豫军区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部队整编，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8个纵队。从这时起，人们称这支部队为“刘邓大军”，毛泽东在一些电报中则称“刘邓军”。刘邓大军在继上党战役、平汉战役之后，又在陇海铁路南北与国民党军先后九次较量，九战九捷。

1947年5月15日，邓小平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中央指示、转入战略进攻等问题。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就中共中央中原局组成问题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次日，中央复电同意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中

共中央中原局常务委员，邓小平兼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陈少敏兼组织部长，刘子久为民运部长；同意李先念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刘邓一起工作。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约12万人于当晚在山东寿张县的张秋到濮县的临濮镇之间300余里的正面，突破国民党军之“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将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地外的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划属中原解放区，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为第二、第三书记；重建中原军区，南征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全部改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以后又兼任中野前委书记），陈毅（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局下属7个区党委，中野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纵队及三十八军。中原军区下辖7个军区。从这时起，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体系，建立了有几千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同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发起。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2月17日，在继续担任这两个职务和总前委书记的同时，又于3月14日被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至6月，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等人指挥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和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8月1日，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

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 建国初期的职务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参加开国大典。19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2日，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月，领导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和具体布置。2月22日，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西南军区下辖8个军区。1952年8月7日，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还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3日，任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第二副书记。11月16日，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3年1月13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草案)》确定，邓小平在政务院副总理中，负责监察、民族、人事等工作。4月28日，这个决定正式发出，政府领导人分工作了调整，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等工作。5月19日，任中央保密委员会成员。6月9日，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和总的经常主持人。同年8月至1954年6月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2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由陈云、邓小平等人参加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15日至28日，邓小平以全国人大代表身分，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

席。同月，邓小平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在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 八大前后的职务

从1955年开始，邓小平参与召开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他担任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党的章程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并主持修改党的章程和党章修改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并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被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同月28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此开始主持书记处的工作，长达10年之久。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再度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年4月，中共中央国际问题宣传小组成立，由周恩来、邓小平领导，负责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同年9月26日，邓小平被继续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60年9月至10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和26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宣言起草委员会。1961年9月9日至26日，率中共代表团赴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12日向大会致贺词。1963年7月1日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率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会谈。1963年11月1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批准，在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期间，邓小平代行国务院总理职务。1965年1月3日，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

副主席。3月20日,经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周恩来出国访问期间,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

## “文化大革命”中的职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了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六。邓小平所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不再提及。1969年10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继母下放到江西新建县。

1973年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29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邓小平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在同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被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2月,遵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予以追议;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1月,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五人小组成员。五人小组全权负责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4月,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75)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中共

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排在其他副总理之前。会后，副总理分工：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在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主持国务院工作。1975年5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各方面的整顿，实际上进行了改革的初步尝试，短时间内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四人帮”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毛泽东也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 1977年至1989年的职务

“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决议。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出席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并致闭幕词。当选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邓小平等人为毛泽东主席著作编

辑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五届全国政协主席。2月28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任命邓小平等13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结束了自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由邓小平等8人组成。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这是邓小平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第一个实际步骤。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邓小平等5人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是邓小平等人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又一个实际行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2年9月1日至11日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席大会并致开幕词。大会选举邓小平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选和调整了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仍任政治局常委、委员。1987年10月24日，在中共十三大预备会议上被任命为大

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但退出了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选举。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在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商谈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在此之前，邓小平从1987年起多次提出退休。这次谈话，邓小平重申要完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过退休生活。请求中央将他退休时间确定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日，他致信政治局，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在1990年3月20日至4月4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至此，邓小平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

但是，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注着祖国统一大业，关注着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92年10月11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2日又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



# 周恩来在苏区纠正肃反 扩大化错误

辛 崇 贤

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使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受到伤害。周恩来来到苏区后,在制止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由秦邦宪负总责。周恩来离开中央的工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2月初,周恩来由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临行前,临时中央负责人同他谈话,要他到苏区后按照中央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以反右倾为主的反倾向斗争,坚持攻打中心城市。

12月15日,周恩来来到闽西永定县,踏入闽粤赣苏区。刚一进苏区,他不顾旅途的艰险和疲劳,立即了解情况,听取当地负责人的汇报。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他们在进行的以肃清“社会民主党”为内容的肃反斗争中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大搞“逼供信”,把许多好同志错误地杀害了。周恩来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心情十分焦急。他很快离开永定赶往汀州,继续了解情况。他沿途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他向一个红军团长询问中央苏区打“AB团”的情况,那个团长说,过去据说有“六千AB团”,其中有很多并未完全审问清楚,但因处于军事作战时期而被处决了。周恩来发觉肃反给苏区带来了严重的恶果。12月18日,他急切地给中央政治局写报告反映情况,请求予以坚决制止。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斥的殆有过之无不及。群众之死于社党之罪的并不都是社党领袖，甚至因其与社党领袖假共党之名在一起开会的也被列为社党而杀了。因此，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党接近，恐怕结果又是社党。究竟社党与共党之别在那里，何种情形方可算罪，群众简直答不出。扩大红军，说群众不积极，十二军团长团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贫农），给以严刑（只据别人一点口供，还说不打不招，等审问清白，连释放都难，因为身体已伤），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sup>①</sup>

周恩来知道，当时中共闽粤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卢永炽正赴上海给中共中央送款。他在报告中请求中央见到卢永炽后，将闽西反社党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与他详细一谈。最好作一有力的决议指示。周恩来认为，“中央如对闽西有决议，对中央区亦有力也”<sup>②</sup>。

而事实上，卢永炽并未去中央，而在中途潜逃了。

周恩来给中央写了报告之后，在长汀停留数日，又作了许多调查，会见了项英及省委同志，还参加了三次省委会议。12月25日，周恩来又给中央政治局写报告，痛惜地说：“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sup>③</sup>

周恩来在苏区沿途发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问题，便随即制止。在长汀时，他在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遇到闯进去向省委汇报的县委妇女部部长。当周恩来知道了她的身分后，问道：“这个女同志干

---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6 页。

②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76 页。

③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5 页。

什么去呀？”那位妇女部长答：“抓反革命！”周恩来和蔼地进一步问：“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是怎么抓的？”妇女部长爽快地说：“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她答不上来。周恩来便耐心地解释说：“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12月底，周恩来到达瑞金，着手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和总结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教训。在会上，他亲自作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由于过去深刻的检讨了过去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

组织上的错误,都给了 AB 团社会民主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以潜入组织来利用肃反机关,摧残革命分子的机会。”<sup>①</sup> 肃反扩大化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很多革命组织与其机关,因为“打 AB 团”而打坍了,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决议案明确要求,“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sup>②</sup> 还指出,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的转变,同时要求苏区各级党部对这一决议,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并将执行的情形于 2 月(远的省份迟到 3 月)中按级报告到中央局。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苏区中央局针对有些省委的报告,给予具体的指导,帮助尽快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 年 2 月 19 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闽粤赣省委写信,信中说,根据苏区大会和闽西工作的情形,根据伍豪(周恩来)同志经过闽西时考察和这次李光明同志来中心的报告,闽西在肃反中犯有严重的错误。苏区中央局要求他们予以坚决纠正和制止。

1931 年 12 月 18 日和 25 日周恩来给中央提交两次报告,促使临时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有了一些认识。1932 年 1 月 21 日,中央为肃反问题给闽西省委致信。信中指出:中央认为闽西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党要绝对禁止对于没有确切的反革命证据的工农分子实行逮捕,严刑拷打与杀戮。信中指示:只有反革命团体的领袖,反革命团体中最顽强狠毒的分子,才处以死刑。其他次要的分子,尤其是工农分子,必须允许他自首,改过自新。并明确指出: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信中要求闽西省委必须根据中央过去的决议与这次的指示信,在党内立刻开始这一工作的自我批评,使全党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9 页。

同志彻底了解我们过去的错误,与今后行动的方针。并要求闽西党向广大群众解释党在肃反工作中的政策,还必须将纠正肃反的严重错误问题向中央做报告,尽量把各种具体材料报送中央,以便中央根据充分的材料作出更详细的指示。

临时中央在得到周恩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报告后,“左”倾思想虽未从根本上转变,但也承认了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有成绩。如193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sup>①</sup>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01页。

# 邓小平与高校招生制度的恢复

何 东 昌

邓小平 1975 年主持全国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不久就被迫中断,关于教育工作的整顿,还没有来得及贯彻,负责此事的周荣鑫部长就被迫害致死了。这件事在广大教职工中是记忆犹新的。1977 年,小平同志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两次谈话不胫自走地传到了学校,重新点燃起大家心中的希望。这一年的 7 月,小平同志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切企盼下恢复了党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大家更是把希望寄托到他身上。这种心情真如久旱盼甘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8 月 3 日我接到通知,去北京饭店参加由小平同志召集的座谈会。由于“两个凡是”的缘故,我在“文革”当中被强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当时仍被宣布为不能平反,只是由于学校党委极力争取,才得以在 5 月中旬恢复了工作,接到会议通知后,真是思绪万千。

参加会议的有 30 多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8 月 4 日会议一开始,小平同志就会议的目的作了说明。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抓科学和教育入手,并提出对教育的希望:能不能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二十年见大效?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会议的座次是排成环形的。每日上、下午讨论,小平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地插话。从他一开始讲了话以后,大家就踊跃发言,争着要把心里话向他讲出来,当时经过“文革”10 年的破坏之后,百废待兴,涉及问题很多。但在小平同志引

导下,讨论很快集中到主要问题上来。

8月6日上午,会议集中谈了教育工作中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就是“两个估计”问题。大家认为,“四人帮”对教育破坏极重,但至今重大路线是非没有澄清,因此干部不敢抓工作,教师持观望态度,积极性难以调动。这个问题在会上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明确回答。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明确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重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的估计。1956年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曾正确地作出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估计,但以后党的认识有过几次反复,党的领导层内也有不同的认识,这给文教科学战线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着重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还说,脑力劳动也是劳动,“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这些指示为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确定了科学的标准,保证了今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稳定性。

座谈会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高校招生问题。在讨论了对教育的“两个估计”后,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了这个热点问题上。在这以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已将方案刚刚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大家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认为为了早出人才计,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小平同志的

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会议上小平同志的讲话，许多都是涉及知识分子政策的。8月5日吉林的同志控诉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例举了涉及16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个上千人的大案。小平同志指示，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此外，小平同志强调了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这项政策中的“至少”、“必须”4个字，并指出，要有奖惩办法，但要以奖励为主，要用谈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帮助；对“文革”中违心地说了错话的科技人员要注意加以保护；除了精神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等等。他专门强调要加强科研与教育的后勤工作，改善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并表示要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回忆1961年，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主持审定了“高教六十条”这个条例，总结了建国以后12年的经验，分析了1958年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解决了我国高等学校的学校制度问题，要求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以保护教师的积极性。1965年小平同志又亲自纠正了一所重点高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无限上纲等“左”的错误。当时小平同志就已赢得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敬仰。这时又如此关怀知识分子，不能不引起广大教师由衷地感激和敬佩，更加坚定了大家把教育工作搞好的决心和信心。

在8月8日上午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作了著名的“八八”讲话，在教育战线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当时全国形势总的讲还处在徘徊中前进的状况，教育战线却能因此得以开始先行拨乱反正。会后不久即对“四人帮”插手的1971年全教会《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开展了揭露和批判，从而加速了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



1977年大学招生恢复了高考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政策，其影响远远超过了高考本身，结果调动了几千万中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学习积极性，“文革”造成的“读书无用论”被一扫而光。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被真正调动起来了。

〔傅颐摘自《回忆邓小平》(上)〕

# 一个值得查证的重要史实

——初期推动陈济棠同红军谈判的中共使者

力 群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后，陈济棠粤军履行与红军甫就达成的秘密协议，未对红军堵截，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粤湘边境。

关于当时双方的秘密谈判，何长工1982年在《难忘的岁月》、“粤赣风云”一章中，对于后期的谈判，即1934年9、10月间他和潘汉年在赣南奉周恩来之命前往陈济棠防区举行双方正式谈判并迅速达成协议，已有相当详实的第一手记述。但谈判初期的推动和酝酿，尚未见有信实的史料。

《朱德选集》中1934年9月关于抗日反蒋给陈济棠的信，开头便说“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看来是先由陈济棠派人来苏区商谈。在1996年6月的《名人传记》中还有文章说：“1934年9月，一位姓徐的粤军参谋带着陈济棠写的一封亲笔信走进了中央苏区，声称要见周恩来”，陈信中除赞同抗日、指定粤方谈判代表外，还建议苏区派何长工为代表。

陈济棠之所以要同红军秘密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是为了保存他在广东的势力。1933年1月17日中央苏区政府、军委关于订立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特别是1933冬同福建十九路军达成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对陈济棠也会有相当的影响。但是，陈济棠在下决心派人进入苏区要求谈判以前，在思想上显然还有一个接受推动和酝酿过程。

中共党员、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吴仲禧生前(1980年前后)曾为此记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事实,即在1934年夏中共党员王绍鳌曾奉命从上海来广州,经吴仲禧辗转设法面见陈济棠,取得了同红军互不侵犯的默契。

吴仲禧(1895—1983),原国民党军官,大革命时随军北伐,曾任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代师长,受到蒋先云等中共党员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积极参加邓演达组建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的活动,1937年在上海经王绍鳌介绍参加了共产党,长期在蒋管区从事统战、情报工作。他在1980年前后为了准备撰写个人回忆史料曾多次记述了他初识王绍鳌并经王介绍入党的经过。在一篇回忆草稿中,吴仲禧写道:

“……当时入党要求相当顺利,其原因如下:(1)我认识王绍鳌同志在1934年夏天在广州初次和他见面。那时我因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工作(福建人民代表)被南京政府通缉跑来广州避居(后为余汉谋参议)。他带季方介绍信来找我,他来意很清楚,说受上海各方面的委托要设法直接见到陈济棠谈些时局问题。我问他是不是关于反蒋问题,他说比反蒋问题更重要一点。后来他说:‘我要见陈济棠只要求一事,江西红军如果要经过粤湘边境时,只要广东不出兵,红军也决(不)来犯广东’,他可保证。但他也不说是谁派来的。后来我由同乡参谋处唐灏青请他转告参谋长缪培南,说明王某因事一定要直接见到陈总司令。几天后得到陈济棠同意约见。约见后他很高兴说陈已默契但绝对守秘。他不久就离开广州回上海。这是1934年夏天的事情。……”

尽管上述仅为吴仲禧个人回忆,有待进一步查证核实,王绍鳌当时也未吐露详请,但从下列三点看,王绍鳌在1934年夏曾经吴仲禧设法面见陈济棠,商洽同红军互不侵犯一事似属事实,这为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线索。

第一,从吴仲禧本人的情况看,他多次忆述此事以说明其入党前初识王绍鏊的缘由,他当时并未看到何长工 1982 年发表的赣南谈判经过,对此事的重大意义也不甚了解。他所提到的与此事有关的几个社会关系的身分和交往,经了解均为事实。例如,吴仲禧原不认识王绍鏊,只因 1934 年夏王来广州才相识,后经王介绍入党,这是有人证明的。季方(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在大革命时即为吴好友,后因吴参加第三党情谊更深,他们在“闽变”和吴来广州后仍有联系。当王绍鏊要来广州找人引见陈济棠时,季方介绍他找吴仲禧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缪培南和唐灏青确是当时陈济棠总部的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吴与缪培南在北伐河南时同属张发奎指挥(缪为第十二师师长、吴为第二十六师代师长),但久无交往。唐灏青虽是吴的同乡、交往甚密,但不是轻易见到陈济棠谈论政事的人。因此,吴请唐灏青转托缪培南向陈济棠提出王绍鏊求见,是合乎情理、切实稳妥的。陈济棠既有寻求政治出路的愿望,又有亲信参谋长代为引见,因而同意面见王绍鏊。

第二,王绍鏊(1888—1970 年)早年留学日本,民初国会议员,1933 年秋在上海经黄申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占区从事党的统战、情报工作,解放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他在 1933 年入党后至 1936 年 6 月被捕前的活动,据 1987 年 12 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民进中央宣传部编的《王绍鏊纪念集》中的记述主要如下:

(1)林芷茵的《王绍鏊传略》中说:王绍鏊 1933 年秋入党后,“由于他的身分和社会关系,组织上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分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暗中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他曾到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进行抗日,并设法让陈济棠与邹韬奋、黄申芎见面;……1936 年春,组织指示王绍鏊去执行一项重要工作,利用以前与阎锡山的交往旧

谊,到山西策动阎锡山参加抗日阵营……”

(2)王绍鏊的儿子王辅民所写的《安慰和回忆》中说:“从1934—1936,父亲风尘仆仆,南北奔波。他到港粤策动陈济棠抗日,又到山西劝导阎锡山加入抗日阵营……”

(3)刘人寿所写的《缅怀王绍鏊同志》文中,则只提到王“1935年参与陈济棠倒蒋活动”。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王绍鏊活动大的背景,即他在1933年秋入党以后奉命从事高层统战,1934至1935年间则集中做策动陈济棠的工作,从时间跨度、活动内容和地区看,他当曾多次南下同陈济棠方面联系。特别应该看到,当时的所谓策动抗日,特别是在毗邻红军地区,必然是与商洽同红军互不侵犯密切相关。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上海党组织给予王绍鏊的统战任务,是紧密配合着中央红军的斗争形势。即1934年当中央红军还在江西时南下开始同陈济棠联系,1935年当红军正在长征途中时策动陈济棠倒蒋,当1935年底红军会师陕北后又转往劝导阎锡山。这个大的背景,以及王绍鏊1934年开始策动陈济棠的记述,似可与吴仲禧的回忆相印证。《王绍鏊纪念集》中的有关记述,证实了吴仲禧所忆述的历史背景,而吴仲禧的回忆则以中介者亲身经历的身分,反映了王绍鏊1934年夏初见陈济棠的鲜为人知的经过和成效。

第三,在陈济棠方面,从1934年夏集中3个师攻占红军要地筠门岭到9月“主动”遣使进入苏区言和,相距约仅两个月。而且从徐参谋所持指名要见周恩来的陈济棠亲笔信看,包括指定双方谈判代表人选在内,陈似已充分摸底而决非初次探路。这个“奇迹”般的变化和发展,似只能从吴仲禧所忆述的1934年夏王绍鏊面见陈济棠取得默契中才能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更进一步看,当时陈济棠如无王绍鏊这样高层人士疏导,恐也很难下这样大的决心。由于阶级偏见、长期内战和当时中共的

“左”倾路线，陈济棠也像许多国民党地方实权派一样，尽管同蒋介石矛盾很深，对苏区、红军却不可能没有疑虑，他们更不愿在事机未成前即因“通共”涣散军心或为蒋的口实。特别是在1933年10月中央苏区同福建十九路军达成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后，12月5日中共又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指责福建人民政府“完全是反革命派骗人的把戏”，且在蒋介石大军讨伐福建时袖手旁观未予侧击，坐视“闽变”失败。在这种情势下，如无适当媒介疏导、承诺，光有共同抗日号召即可促使陈济棠遽尔之间主动遣使言和，反而不好理解了。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吴仲禧生前的几篇回忆草稿所作的一些考证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在季方、王绍鏊甚至吴仲禧本人的档案中，均未见有类似的具体记述。但是现有的这些资料毕竟给这段历史提供了值得进一步查证的线索。

## 也谈刘晓何时到上海任地下党负责人

翁 三 新

《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发表了张培森研究员撰写的《刘晓何时到上海任地下党负责人》的史实考证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文中提供的6份电报,是考证刘晓何时到沪的重要依据,但这6份电报中有4份落款只写发于某日,而无年和月,为查考带来一定的难度。张文根据刘晓致洛甫(张闻天)报告卢沟桥事件后上海党工作布置的电报标有“7月17日”,推断出“张闻天代表中央处理此事的3封去电时间必定是1937年7月”,并据此得出“1937年7月中旬刘晓到达上海任党的负责人”的结论,认为目前存在的刘晓“1937年5月去上海”、“1937年6月到沪”和“1937年7月初抵沪”的三种说法不准确。

笔者认为张文对张闻天所发3封电报的时间推断和刘晓7月中旬到达上海的结论值得商榷。

刘晓何时到上海恢复重建地下党,1988年前出版的上海党史书刊上大都采用1937年5月说。其依据是当事者刘晓1979年的回忆和冯雪峰1956年的回忆。

笔者1988年参加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时,查阅过张文提及的6封电报,并发现1份署名“刘、七日”的有关电文,对刘晓“5月抵沪说”存有疑问。我们根据电报内容,把有关刘晓到沪的电报作出如下时序的排列:

电(1):“彭、任、杨<sup>①</sup>:为建立沪方工作,决调刘晓、刘少文两同志。请即电调并令即日起身来中央,以便随周出去。毛、洛、博  
1937.4.4”

电(2):“允生<sup>②</sup>:(中略),刘晓同志将于日内动身来负责党的工作。刘到后暂由刘、你及另找一人组三人团为领导机关。此事绝对秘密,一切由刘面谈。 洛甫十一日”

电(3):“开<sup>③</sup>、允:陈家康已回沪,刘晓亦已动身,刘经西安交(通)站,由你们交通带沪,到沪后请予复。(下略)。 洛甫十六日”

电(4):“洛甫同志:(一)上海党的下层组织关系允生同志已交于我。允生将负责上海救国会与文化界的领导,已成一独立系统,与我经常联系。(二)允生同志已整理的工作基础甚好,以便发展。请即派中层干部数人来,使工作迅速开展。(三)政治情形随时电告。 刘、七日”

电(5)和电(6),是刘晓7月17日致洛甫的“卢沟桥事件后我们工作布置”请示电和洛甫19日复电。对这两封电报的年月认定,笔者和张文相同,本文不再摘录。

从上面列举的4封电报内容看,洛甫11日、16日电是判断刘晓何时从延安启程的关键,而“刘、七日”电则表明刘晓此时已在上海。笔者采用档案资料与背景材料、当事人回忆与调查互证互补的方法,断定洛甫的两封电报发于1937年6月,并由此推断:刘晓在1937年6月16日已从延安动身,7月7日前已在上海。作出这个初步判断依据有四:

其一,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结束于1937年6月10日,刘晓

---

① 即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

② 冯雪峰的化名。

③ 潘汉年的代号。



夫妇在会议结束后才离开延安。

正如张文所说,在全国白区工作会议的记录上有刘晓到会的记录。又据刘晓夫人张毅1989年1月来函提供:“刘晓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当时我也是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会议的,会议结束,中央指示刘晓去沪工作。张闻天总书记和毛主席找他交待了任务,作了有关指示,此后我们即匆匆南去西安”<sup>①</sup>。这实际否定了“刘晓5月抵沪”说。

其二,1937年6月17日前后,刘晓在西安。

刘晓生前回忆和张毅来函中都提到他们在西安时,刘晓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找我二次谈话,第一次一般谈谈,第二次谈话着重谈了到上海去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sup>②</sup> 笔者查阅《周恩来年谱》得知:周恩来1937年“6月16日(或17日)回到西安。6月18日,回到延安”,“7月7日至12日在上海。7月13日(或14日)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sup>③</sup> 可见周、刘在西安会晤,只能在6月16—18日之间。这就排除了刘晓7月由延安动身的可能。

其三,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刘晓已在上海。

笔者认为当事者回忆在时间上容易发生记忆误差,但重要的人、事和情节回忆,是极具历史意义和考证价值的。刘晓生前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重要情节:“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在上庐山前曾到上海找潘汉年和我谈话。那次,我接到通知后,就和张毅在贵州路中国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潘汉年陪了周恩来、林伯渠和博古来了,他们三人同我和潘汉年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据张毅回忆,这次谈话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或隔天。在中国饭店时,张毅负责放哨,

<sup>①</sup> 原件存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sup>②</sup>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sup>③</sup>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70—371页。

记得他们在谈话时，报道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号外新闻叫卖了)。”<sup>①</sup>  
抵上海。……在上海期间和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sup>②</sup>

其四，据目前笔者所见档案，刘晓到上海后最早送中央的工作报告，是1937年7月7日致洛甫电[详见电(4)]。

在张文中，没有提到这份落款为“刘、七日”的电报，张文认为刘晓7月17日的请示电“实际也是他抵沪后最早送中央的一份工作报告”。笔者认为通过这两封电报的分析比较，可以断定“7日电”早于7月17日电。首先，从7日电的内容看，发报人“刘”无疑是刘晓，是他到沪后不久向中央发的电报，只是简短汇报他已与冯雪峰接交了组织关系，进行了工作分工。而刘晓在7月17日的电报中，向党中央具体地报告了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党在群众工作、工人运动、国共合作、上层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关系等10个方面的工作部署，足见他对上海的形势、社会各阶层动态已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这决不是到沪几天就能够做到的。此外，刘晓在7日和7月17日的两份电报中，均要求党中央“即派中层干部来沪”，洛甫在7月19日的电报中答复：“中级干部决定先派刘长胜来沪”，从中也可推断出这份落款7日的电报当在7月17日之前了。我们曾依据这份电报，判断刘晓7月初到上海，致函征求有关当事者的意见。张毅在复函中没有坚持“刘晓5月到沪”之说，但她回顾了随刘晓到上海后，为创造公开合法的社会掩护环境，他们所做的接组织关系、安置生活等工作。她认为：“我们是绝不可能7月初抵沪的，否则在周副主席来沪之前，我们是完成不了以上所说的种种琐事的，可见我们是6月上旬或6月中旬抵沪的”<sup>③</sup>。

①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

②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70—371页。

③ 原件存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认为刘晓 1937 年 6 月 16 日已从延安动身,6 月 17 日前后在西安,6 月 20 日前后抵达上海。因此,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一书中,我们第一次引用了“刘晓 6 月抵沪”说,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则明确地写上了“刘晓 6 月下旬到上海”的结论。

张文还引用了一份洛甫致潘汉年和冯雪峰的电报,内容是:“开、允:上海党的情形你们知道吗?中央暂时不能派主持党的工作的负责同志到上海,你们能否在上海挑选几个可靠有能力的同志,组织一个小小的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党的工作,你们只同其中的一个发生秘密的指导关系,绝对保证不连累到你们的工作……”张文认定该电发于 1937 年 7 月 7 日,还据此证明党中央在 7 月 7 日尚未派出刘晓,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才最后作出调刘的决定。据笔者所知,这份洛甫电稿的原件上,落款也是只标注“七日”而未署明年月。因此,张文认定它发于 1937 年 7 月 7 日,依据不足。笔者认为,这份电报的时间当早于 1937 年 4 月 4 日电,亦即党中央作出调刘晓建立沪方工作的决定之前[详见电(1)]。否则,就很难解释两者产生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张文也说“人们看了这份电报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 1937 年 4 月就决定调刘的事,为何到此时又说调不出人来?”又说“事实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因为没有足够材料,这里不好妄加猜测”)。况且,已有充分材料证实刘晓已经在 6 月下旬到了上海。笔者曾查阅到一份发稿于 1937 年 5 月 13 日的《允生关于上海党情况的报告》。在这份近万字的材料中,冯雪峰向党中央汇报一个重要情况:1936 年底,遵照中央指示,在冯雪峰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由书记王尧山、委员沙文汉、林枫等 3 人组成,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的组织,为中央另派同志到沪负责党的工作作准备。笔者认为这个“临委”就是按照洛甫 7 日电的指示精神建立的。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

话,那么,这份落款只标“洛甫七日”的电稿,当发于1936年11月7日或者12月7日。因为,收报人之一的潘汉年是在西安事变发生数天后才离开西安到上海的,到沪后就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负责国共秘密谈判、情报工作和文化界上层统战工作,可见洛甫7日电就不可能发于西安事变前。当然,上述推断是否合理,尚待进一步研究。

# 有关罗易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 密电的历史档案

路 远 选译

**译者按：**史学界在论述 1927 年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时，大多提到罗易因给汪精卫看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而被解职一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该指示的原文、罗易的动机以及共产国际对此事件的调查结论，并不十分了解。现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藏与此事有关的档案节译如下。

文件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7 号  
（特字第 85 号）记录（摘录）<sup>①</sup>

**1927 年 5 月 30 日通过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作出的决定**

听取：19.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9. ——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sup>②</sup>同志发以下电报<sup>③</sup>：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

---

① 经查，该记录即罗易给汪精卫看的密电，与一般所说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内容一致。

② 即 O. IO. 普利切，1926 至 1927 年间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

③ 文件的缩写稿，见《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 10 卷，第 32—33 页。

为作斗争,但不要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罗易对谭平山之行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不应脱离工农运动,而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促进,否则就会葬送事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土地占有者作出的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的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

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不这样做,国民党恐怕会有脱离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4、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既然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示,你们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不报告?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惩治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6、请不要扣压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你们都必须用化名签署电报。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

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

文件二：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年6月22日于汉口

琼森<sup>①</sup>致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

柳克斯<sup>②</sup>蓄意夸大。他知道，我只不过给汪<sup>③</sup>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sup>④</sup>。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应该明确地给他们指出革命的道路。〔我们〕讨论了改组国民党和军队的问题。汪抱怨莫斯科无视〔他的〕意见。不能借助于过去和现在的外交手腕把左派领导人推上革命道路。必须明确地给他们提出革命任务，应当坦诚地鼓励和支持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受到反对派的影响。究竟谁真正代表莫斯科的意见，过去不清楚，现在仍然不清楚。应当消除这种不清楚的状态。这就是我的论据。

---

① 即 M. H. 罗易。

② 即 O. Ю. 普利切。

③ 即汪精卫。

④ 见文件一。

文件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秘密会议第 30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6 月 22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机构问题的通报。

决定：1. ——(1)批准给鲍<sup>①</sup>同志的指示并要求他准确地执行这些指示。

(2)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成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sup>②</sup>三同志，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sup>③</sup>。任命牛<sup>④</sup>同志接替他。

(3)致电汪精卫，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责成布哈林、库西宁、布劳恩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起草电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文件四：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4 日于汉口

琼森<sup>⑤</sup>致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

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决议的电报收悉。取道上海不可能，必须取道蒙古。我将于 7 月底抵达莫斯科。这里的局势很严重。我们

---

① 即 M. M. 鲍罗廷。

② 分别为 M. M. 鲍罗廷、M. H. 罗易和柳克斯(O. IO. 普利切)。

③ 见文件一。

④ 即 G. 牛曼。

⑤ 即 M. H. 罗易。



面临着全面失败。我不止一次及时地发出过警告。召回我，这并不是为挽救局势可以做的全部工作。徐州会议<sup>1</sup>作出决定：1)承认武汉的错误。2)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3)解除鲍罗廷的职务。4)联合进攻北京。

多数武汉领导人(汪精卫可能除外)准备接受这种立场。共产党人已被用中国方式开除出政府。谭平山未经党的许可就停止了部长工作。共产党人被开除出省政府。湖北农民组织和国民党地方党部被解散。

在徐州会议后进攻南京是不可能的。除唐生智外，将领们都反对同南京作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是唯一适合去实现这一目的的部队。仅靠这两个军是不可能打败南京的。武汉与南京可能和解，在北京组成统一的反共、也许还反苏的民族主义政府。应当寻求挽救我们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左派)的途径。我建议立即借助于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收复广东。〔必须〕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sup>2</sup>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可以从这个基地出发在相邻省份顺利实施土地革命纲领、组建革命军队、武装群众和使国民党民主化。这一计划不排除采取尽可能保留我们在北方的阵地的策略。邓演达想出国。汪也要出国。需要给他们以希望，否则，不仅国民党左派，而且整个国民党都将被消灭。汪本人认为，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党将意味着国民党的政治死亡，但他不能阻止这样做，直至我们给他指出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和帮助他走这条路。对于所提到的广东基地，应不通过国民政府给以直接援助。请尽快作出答复。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回莫斯科了。

---

1 徐州会议于1927年6月20日召开，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等人出席。

2 即汪精卫。

## 文件五：罗易同汪精卫谈话记录

1927年6月27日于汉口

### 同汪精卫的讨论

**汪精卫**：局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已达成全面协议。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他最近一份电报是经南京发来的。有理由认为，这是伪造的。今天的电报是直接从开封发来的（他念电报）。电报中说：

“共产党应对湖南和湖北的一切不幸负责。共产党阴谋消灭国民党。因此，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人的影响。应当把国民革命的一切敌人赶出国民党，如有必要，应予惩罚。立即联合进攻北京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任务。”

**罗易**：这份电报讨论了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怎么看？

**汪精卫**：暂时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已有许多领导同志看过了。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1)为了同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共产党与国民党密切合作。这可能激起反动派的立即武装叛乱。

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将维护出版、言论自由和共产党合法存在的自由。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那么，反动派就没有组织武装叛乱的直接借口。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赞成第一条道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紧急经湖南去广东。

陈独秀和谭平山主张退出国民党，为左派创造有利条件。

**罗 易**:进攻南京的前景如何?难道我们不担心,一旦进攻南京,冯玉祥就会进攻武汉吗?

**汪精卫**:对南京的这次讨伐取决于唐生智如何调解湖南的局势。如果我们能集中所有武装部队进攻南京,那么第二条道路会是理想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作出某种退让。

**罗 易**:您个人的意见如何?

**汪精卫**:我主张去广东。我们在武汉这个地方犹如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小岛上。我们在这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我无法根据我去郑州之前同您讨论过的方针做工作。谁都不支持我。我想通过南京对冯玉祥的电报作出很明确的答复(他念电报)。但谁都不赞成这份电报。只有孙科在经过一番说服之后同意了。

**罗 易**:您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一起去广东,那不意味着国民党的实际分裂吗?意味着公开向右派中的反动分子挑战吗?

**汪精卫**:是的。

**罗 易**:还有谁同您一起去?

**汪精卫**:邓演达,也许还有孙科。我同这两个人谈过。当然,孙科没有像邓演达表现的那样热情。但同他都说好了。

**罗 易**:是否需要同李济深进行一场军事行动或者可以同他达成某种协议?

**汪精卫**:我们应当进行战斗并推翻李济深。

**罗 易**:如果相信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谈论过去的事情就没有用了。在您回到中国以前,我就不止一次地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若不建立巩固的联盟,以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我们在武汉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危险。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认为有必要建立作战基地。在武汉,不可能把实施组建我们自己武装力量计划的工作和使国民党实行民主化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寻找一块我们有行动自由的地方。为此,我们绝对有必要收复广东。

**汪精卫**：我同其他同志也有分歧。但我必须服从多数。我坚持以下意见：南京是最坏的敌人，首先需要同它作斗争和收复广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同我们自己地区内的反革命作斗争。现在，如果我们想〔收复〕广东，那就应当改变我们工作的整个性质。国民党应当进行彻底改组。否则，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我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罗 易**：情况很清楚。只有两条路。要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开始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么向反革命投降。

但是，没有理由赞成第二条道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当空前地团结。应当相互充分信任，应当赞同共同的革命纲领，并为消灭反动势力而进行斗争。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sup>①</sup>，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但我认为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对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告诉一些同志。邓演达同志完全赞同指示。孙科也认为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关于推翻国民党的指示。但是不能对电报作出这样的解释。它很明确地指示共产党人去帮助和加强国民党，以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罗 易**：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我是指昨天收到的并在共产党政治局中作了讨论的共产国际给汪精卫的电报）吗？

**汪精卫**：没有。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他痛苦地补充说）。我处境很困难。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甚至也不能发电报。

（然后罗易同他讨论了两党关系问题和革命的迫切任务问题。罗易对他说，已就这两个问题起草了具体的建议。）

---

<sup>①</sup> 见文件一。

## 文件六：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年6月29日于汉口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非常惊奇地接到了以破坏纪律为由召我回去的通知。由于我不能取道上海返回，所以我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地回到莫斯科。我想报告许多事情。在所附的报告<sup>①</sup>中引用一些重要消息，您可以根据这些消息行事。是的，这里有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罪犯不是我。应当向这样一些人提出指控：他们在一个月来恬不知耻地无视莫斯科的详细而不止一次的指示，一直实行几乎毁灭共产党、断送革命形势的政策。尽管有对我的荒唐指责，我还是对于我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满意，这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整个活动时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忠实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证明，从我到这里时起，我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共产国际借助于荒唐的指控损害我的名誉，同时又承认我的所有建议都是正确的，并根据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这个事实令人振奋。我希望从政治和组织角度彻底改变这里的领导。不能把进行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革命的任务委托给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半国民党的领导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

<sup>①</sup> 报告尚未见到。

文件七：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的信

1927年8月30日<sup>①</sup>于莫斯科

致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

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但是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把我召回的结果是,中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政策得到了加强。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国家)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并且不止一次,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过他们。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罗 易

文件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sup>②</sup>

1927年8月30日于莫斯科

在听取了罗易同志的解释和熟悉了案卷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指定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sup>③</sup>得出结论: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罗易)、鲍和柳<sup>④</sup>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

---

① 日期是根据该文件的德文稿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斯大林的亲笔批注：“同意。И. 斯大林”。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9月2日会议上批准的。

③ 成立该委员会的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8月19日会议上作出的,委员会成员不详。

④ 分别指鲍罗廷和柳克斯(即O. Ю. 普利切)。

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调查委员会向书记处提出以下建议：

1、重申政治书记处 6 月 22 日决定。

2、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

“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有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错误，这个错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1927 年 6 月 22 日决定中作了如下表述：

‘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成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

由于我们 6 月 23 日发的电文是别的内容，现提请你们注意，这里所援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内容才是正确的。”

**附：**

文件一见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27—30 页。

文件二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1 页。

文件三见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25，第 1 页。

文件四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2—33 页。

文件五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9，第 207—209 页。

文件六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6 页。

文件七见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9，第 94 页。

文件八见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5，第 115 页。

# 在中国的经历及其他

[越]胡志明 著 洪左君 译

**编者按：**1961年，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以T.LAN为笔名，用第三人称写成《边行军边讲故事》一文，记述他在1920—1940年的一些革命经历。越南《人民报》从1961年5月至8月，将此文分13期连载。本辑所载的章节是胡志明在中国的一些经历和对中  
国革命评述的有关部分，并略有删节。

这个故事的开头距今已40年。我们在10几年前已经听过。我记得多少，就写多少。

## 一、1924年底至1927年中，在广州

1924年6月，伯伯参加完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后，于同年底秘密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正陷于混乱之中。在北方，由帝国主义操纵的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相互厮杀。在南方，孙中山的国民党同共产党正密切合作，掀起了革命高潮。国民革命政府设在广州，正准备北伐。

伯伯到广州后幸运地遇到在法国时结识的周恩来、李富春、蔡畅及其他许多同志。当时毛泽东正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刘少奇负责工运，彭湃负责农运。

伯伯在广州，一面为国民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当翻译，



一面在国民党中央办的英文刊物《广东周报》负责编宣专栏。

到了广州不久，伯伯便同黎红峰、胡松茂、黎瓚英等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为以后成立共产党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该会秘密从国内输送一些青年到广州进入政治训练班学习。该会将油印刊物《青年周报》秘密寄回国内进行宣传。

几年前，“法国属地尚书”<sup>①</sup>曾这样说：革命运动从巴黎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转到中国，尔后将从中国转到越南。他算是说对了。

伯伯得到中国同志的同意，成立了“亚洲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入会者有越南人、中国人、印度人、朝鲜人，人数相当多，活动频繁。廖仲恺被推举为会长，伯伯任书记。

这一时期，香港爆发了总罢工，工厂、码头、学校举行罢工、罢课、罢市。香港周围的农民不向英国人提供粮食。英国人的生活陷于瘫痪。许多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卷起铺盖溜出香港。当罢工接近完全胜利之际，由于蒋介石背叛，罢工中断了。

从1925年到1927年初，总的说来革命是很顺利的。在中国，广东北伐军打到哪里，胜利就到哪里。他们已占领了上海、南京并正向华北进军。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越南，许多在广州受训的青年已回国，并在从北至南的工厂、农村、学校中积极进行秘密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大搞白色恐怖。共产党和各群众组织都转入地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亦如此，伯伯也不得不秘密离开广州。

在国民党进行血腥镇压后，伯伯仍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必须同中国同志保持秘密联络，而且还要维持“革命同志会”的

---

<sup>①</sup> 法国政府海外领地部长——译注者。

工作。1927年5月初的一个深夜,阿岭同志(越南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公安局工作)跑来向伯伯报信:“国民党将要逮捕你!还在考虑什么?应迅速离开!”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伯伯马上秘密去香港。香港暗探局对他审问后要他24小时内离境。于是他来到上海。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相当厉害。为了掩人耳目,他把自己打扮成富人,住高级饭店。但是这种做法不能持久,因为开销太大。最后一条路只有回苏联。

## 二、1931年6月至1933年2月, 香港—厦门—上海

伯伯1927年5、6月间到苏联后,在莫斯科和柏林工作了一段时间,尔后去巴黎。不久被派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会议。在赴布鲁塞尔途中,他同日共创始人片山潜乘同一火车。会议结束后,他去瑞士、意大利,以便逐步迂回返国。1928年,他由日本乘船去暹罗(泰国)。在暹罗大约1年。这时他听到“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分裂成3个共产党派别,心急如焚,便秘密来中国,请3派代表来香港开会。1930年2月3日,经过几天热烈讨论,3派同意成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

伯伯在完成越南的建党工作后,到了上海、暹罗、马来亚等地,尔后又折返香港。1931年6月6日在九龙三笼街被港英当局逮捕。之后,英国秘密警察对该街道包围数周,妄图安此“捕鼠器”来抓同伯伯有关系的同志,但一个也没有抓到。他们检查伯伯的住房,对每一道墙、每一块砖都不放过,甚至用化学药品进行化验,想得到所谓的秘密材料,结果一无所获。

在暹罗、马来亚、菲律宾及其他不同地方被捕的中国革命者都

被遣送到香港。英帝国主义对这些人同在香港被捕的革命者一样，只关短暂时间，进行拷问获取口供，然后逐出香港，不判长期徒刑。

这实在是“宽宏大量”！但是当你脚踏上船（香港是一个岛，四周是海，不管要去什么地方，都非乘船不可），几乎所有被“驱逐出港”的同志都当场被国民党特务抓获。

伯伯关进牢房数天后，胡松茂<sup>①</sup>被解出监牢，准备“驱逐出港”。胡松茂乘机将伯伯被捕的消息告知香港律师公会主任英籍律师罗士比，请他帮助伯伯。

罗士比先生到监牢见了伯伯，说他将竭力为伯伯辩护。

伯伯说没有钱支付律师公会费用。

罗士比先生说：“我知道你是越南的一位革命领袖。我辩护是为了声誉而不是为了钱……”

从此，罗士比夫妇对伯伯一案和在牢中的生活，倾尽全力帮助。多亏罗士比先生相助，法国同志和红色国际救济会都清楚地知道了伯伯的情况。

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获悉伯伯被捕的消息后，派遣一大批密探到香港守候。他们用尽一切手段疏通政府、法院、英国警察，想把伯伯弄到他们手里。他们早已布置好船只，只要法院一发出“驱逐”令，他们就可以抓到伯伯并押上船，立即返回越南。他们以为这一次将兑现“殖民地尚书”官员以前所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话，即：将越南革命者除尽。

香港政府也想秘密把伯伯交给法国殖民者。但是罗士比律师

---

<sup>①</sup> 胡松茂，越南人，20年代在广州同胡志明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参加过“广州起义”。前后被国民党抓了4次，最后一次被逐出广东到香港。在香港又不为英人所容，1931年6月底被港英当局解回越南。他回越后一直参加抗法斗争。1951年2月在越南共产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牺牲。他还担任过越中友好协会会长。——译者注。

把伯伯的事公开化，并要求最高法院必须审理。由于法国殖民者宣传伯伯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布尔什维克；由于香港警方诬告伯伯阴谋颠覆这里的英国人政权，因此舆论界认为这是香港从未发生过的最重大的案件。

从6月到9月，法庭开庭共9次。每次开庭，入口处都有英国和印度武装警察把守，有许多高级官员前来观看。法庭的主要角色是：两位正、副审判长；两位公诉人，代表“王室”定罪；两位伯伯的辩护律师。

这些人身穿黑色大袍和按古时方式戴上假发。每个人的桌上都摆了一大摞法律书。他们打开书引证所要说的话。真是“言有证来证有据”。

罗士比先生在席上就坐。伯伯坐在审判席木栅中，不能说话。当需要同律师交换意见时，只能把内容简单写在一小纸条上。

律师的论据概括起来是：

1、逮捕伯伯是违法的，因为伯伯于1931年6月6日被捕关押，但是到了6月12日，港英总督才正式签署逮捕令。

2、职员违法向伯伯取供，因为他们向伯伯提问，超越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

3、强迫伯伯必须乘法国船去印度支那，这就是说故意把伯伯交给法国人，让他们杀害伯伯。这是违法的。

前两点，政府和公诉人承认有错。但是法庭和公诉人仍决定把伯伯驱逐到印度支那。

罗士比先生反对这一判决并上诉到“皇家会议”，同时请伦敦的诺威尔·丕力林律师为伯伯辩护。

到了1933年2月，将近阴历新年，“皇家会议”撤销上述判决，并下令让伯伯可以自由到任何地方，只要离开香港。

这是初步的胜利。但是去什么地方？如何走才能脱险？如果

安排不好出狱后将落入法国殖民者手中。

罗士比夫人托一位朋友买了两张头等轮船票。一天，一艘从香港出发途经厦门、上海去日本的外轮，起锚后刚驶入海域约3公里，忽得到停泊的命令。这时，香港总督的私人汽艇将一位中国士绅送到该艘外轮的头等舱……船到了厦门，刚好是阴历年除夕。这位中国士绅受到朋友的邀请，在厦门过了阴历新年。

经过20个月的艰难险阻，伯伯再一次从法国殖民者的恶毒阴谋中摆脱出来。这个胜利主要是得到罗士比夫妇的热诚帮助。

法国殖民者因抓不到伯伯而大为恼火，并把不满倾泻到英国人身上。他们的报纸大肆造谣，说伯伯在英国人牢中得了肺病，已经身亡。

伯伯在厦门住了不很长的时间，尔后乘船去上海。为了遮掩密探的耳目，伯伯仍一身绅士打扮，住豪华饭店。到了晚上便把房门锁起来，然后以红薯充饥，同时自己洗衣服。

1933年秋天，伯伯获悉欧洲有一代表团到远东各国宣传反帝国主义战争。代表团中有一英国贵族，一比利时议会代表，一法国文学家即瓦扬·古久里。这一信息使伯伯极为振奋。

但伯伯到了上海后仍未接上组织关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不能活动又长时间同组织失去联系。这使革命者日夜感到孤单。

这时到达上海的和平代表团受到国民政府和这个城市的白人的抵制，只好乘船到了日本，但日本政府也禁止他们上岸。在上海，宋庆龄女士秘密组织了一次集会，让代表团讲话。

于是伯伯给瓦扬·古久里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请该朋友代转。

这位朋友(伯伯只粗略认识)有威望，国民党和帝国主义都恨他，但只派特务盯梢侦察，不敢拘捕。

当时伯伯绅士打扮，租了一辆豪华的汽车，直奔法租界内那位朋友的家，敲门，交信，然后立即离开。回来时看到法国警察在各条街道拦截行人检查。车夫顿时显出犹豫，……伯伯告他：“尽管走！”大概是因为这辆豪华汽车，所以没有受拦阻检查。真险！<sup>①</sup>

第二天晚上，伯伯和瓦扬·古久里在一个秘密地点会面。两人十分高兴，忍不住哽咽起来。

过了几天伯伯再次会见瓦扬·古久里时，伯伯已接上了组织关系，那时刻高兴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 三、1938年底至1941年2月，延安

#### —桂林—衡阳—云南—广西

1938年冬，伯伯重返中国。与13年前相比，中国变化太大了。

1927年伯伯来广东的时候，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1938年伯伯到达陕北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共产党已经成长壮大，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伯伯到西安时，受到各位老同志的热烈欢迎，不过在这些日子里也还要“逃”日本飞机的轰炸。

在西安住了几天后，由几位中国负责同志护送，伯伯坐上装载碎布头（买来做鞋子用）的车前往延安。这车既不是汽车，也不是牛车，因为有许多时候要同时用一匹马、一头骡和一头牛一起拉。一天只能走几十公里。晚上就在农民家里歇脚，住宿费和伙食费2角

---

<sup>①</sup> 文中提到受信的“这位朋友”是宋庆龄。越南出版的《胡志明编年史》第二卷说，当年胡志明把信件送到宋庆龄在莫利哀29号的寓所。后来胡志明有一次到中国疗养，曾对周围的人谈起当年那段往事：由于得到宋庆龄的帮助，他才同党接上了关系。他愉快地说：“那时我口袋里的钱快用光了。如果没有宋庆龄相助，将不知如何办。”——译者注。

钱。

沿途伯伯看到许多来自各地的青年男女,大多是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奔赴延安。虽然他们已疲劳不堪,步履艰难,但是对延安的向往,却像信徒“朝圣”一样虔诚。

从西安到延安,有许多“豆斑点”地区,有属于国民党的“白”县和属于我们的“红”县,另外还有一种“半白半红”的县。这后一种县,县官通常是“白”的,老百姓有事只找红色干部。因此“县官”清闲得很。

各地青年学生在去延安途中经过白区时,有时被国民党绑走而失踪。

在白区,沿途通常有荷枪的国民党士兵守卫。在红区的一些路段,由农民、青年、妇女,有时由持红缨枪的儿童团放哨。

在一个晴朗的中午,伯伯正在一家饭馆休息。这时饭已煮熟。只见女主人急忙把饭锅端到后院去。街上有一队国民党士兵在巡逻。十分钟后,那位妇女又把饭锅端回来。伯伯问她:“饭刚煮熟,为什么你把它端走?”女主人回答说:“你们新来的同志不知道。他们吃饭不给钱,而且还要骂人呢。”

“他们”是指国民党士兵。这里的老百姓有一句话:“一兵二匪,搜括净尽,一匪二兵。”

在某市镇的一条街上,八路军和国民党各设一个募兵站。在八路军兵站,来登记参军的人十分拥挤;在国民党兵站,根本没有人问津。于是国民党兵站站长想出一个花招,把兵站布置得像八路军的兵站一样,果然,开始有人去了,但是进去的人又出来,转到八路军的兵站。还有许多国民党士兵暗地里同八路军联系。

通过这些小事,可以看到民心的向背。

伯伯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延安。

延安是一座普通市镇,地处山区,房子不多,但人口很多,大多

数住窑洞。所谓窑洞，即是挖成拱形大山洞，可以住上数十人，其优点是冬暖夏凉。一排排的窑洞是沿着山脚和山腰挖的。部队、学生、党政领导人都住窑洞。

到了延安，伯伯心情格外愉快，看到的新鲜事也不少，例如：开始分不清谁是军人谁是学生，谁是指战员谁是干部，甚至也分不清谁是男人谁是妇女。因为大家生活简朴，衣着一样。一些外国记者赠朱德以“火头军将军”的称号，因为朱总司令的穿着同伙夫一样。

在延安，每日吃两顿小米饭，配的是胡萝卜和白菜。开始吃不惯，咽不下去，过了几天就渐渐适应了。俗语说：“饿了，连盐也是好吃的。”每隔10天有一顿“加菜”。炊事员善于节约，把10天来节约下来的食品都用在一顿“加菜”上。这一餐有大米饭和猪、鱼、鸡、鸭肉等，像一次盛宴。

延安，从物质生活方面看，是一个十分简朴、清苦的地方；从精神方面看，她是充满着舒畅、欢快、振奋和紧张气氛的自由天地。人人都参加生产，人人都努力学习。

规模最大的学校是抗日军政大学，在几年内培养了许多万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学校空无一物，没有桌椅，上课时，学生各自带一张小板凳，用双膝垫着本子记笔记。

那时延安是18万革命军队和华北、华中八九个解放区的指挥中心。所有的人都朝气蓬勃，充满团结、奋斗的精神和必胜信心——这是延安的意志。中国群众给延安冠以“革命圣地”的光荣称号是最恰当不过的。

延安附近有几处著名古迹，如黄帝陵、杜甫川和嘉陵山上的宝塔。

伯伯急于到靠近越南的华南地区，在延安只住了两个星期便动身折返西安。这次去西安有5辆汽车，载着学生和中、高级干部。当汽车到了白区某地时，国民党特务命令车队停下来检查，还威吓



要扣留车辆和人。林彪对他们说：“我们此行负有紧急与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你们要扣留我们，请在书面报告中写清楚。”特务看到这种强硬态度便不敢纠缠了。

到了西安后，伯伯获悉广东已被日军占领，于是转赴桂林。桂林是广西省省会。八路军在这里设有办事处，单位不大。伯伯一面参加八路军工作，一面同越南国内联络。中国同志对他此项工作给予许多帮助。伯伯在八路军办事处被推选当俱乐部主任。俱乐部既是机关的文娱单位，而对当地群众来说又是一个宣传单位。

过了不久，伯伯随叶剑英到衡阳。当时叶剑英正率领一批教官给国民党军官办游击训练班。伯伯在训练班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同时兼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将收听到的国际新闻记录下来供单位作为时事教材用。这两项工作都是新的，但都很有趣。

在这个党支部内，有将军有战士，有男有女，有东南西北各地口音。支部在工作中对上述各类人都要照顾到。大事小事，从伙食、学习、文娱、纪律处分到个人问题，都要找支部书记。伯伯和两位副书记(女)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1940年底，伯伯来到广西边境，但未同越南国内联系上。后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来到了昆明。他在昆明遇到了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人。他想这次无论如何一定可以回国了。在商讨完计划后，他和几位弟兄折返广西。为了保密，伯伯装成一位不懂越语的中国记者。

在广西靖西，伯伯遇到一批来自(越南)高平的青年，领头的是黎广波、黄森同志。他们到这里是为了找寻革命领导者并已见了张佩公。张佩公此人是为中国国民党工作了多年的越南人，不懂军事，但却被蒋介石封为少将。现在蒋介石派他到边境来是为了把越南革命搞乱。张佩公见到这批青年后，便吹嘘自己是“爱国战士”、“革命者”，并打算接纳这批青年做他的“部下”。

这些青年也相当机灵聪明，他们听了张佩公自吹自擂，更觉得他不像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十分失望。当他们准备返回高平时，正好伯伯到了靖西。范文同、武元甲找这批热情的青年谈话，给他们阐明当前革命的道路，还同他们商讨办训练班的事。这批青年听了十分欢迎。他们说了就做，当晚便离开靖西。第二天张少将一觉醒来，他的“部下”不知哪里去了。他派人去追，但为时已晚。

黎广波带伯伯和这批青年走了一个晚上的路，来到了靠近越南边界的中国村落，向熟人借了房子，就办起了训练班。伯伯任训练班的负责人。训练班办得很有生气、民主、欢畅。村中的中国乡亲不知道他们教什么、学什么，但都称赞越南青年团结、好学、勤劳。村中的乡亲，尤其是出借房子的主人，很喜欢这些学员。不论什么时候，水缸的水总是盛得满满的，柴火堆得高高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室内有什么活要做，大家一齐动手干。特别是儿童，经常围住学员，学唱歌、跳舞，不像往日那样顽皮与打架。学员把山谷里的这一僻静的村落搞得热气腾腾。伯伯告诉青年：“这就是做民运工作的一种方式。”

1941年2月正好到了春节，训练班亦正在此时结业。正月初一晚上得到一个消息，说国民党专员将到这个地区视察（后来证实这不过是一个谣言）。伯伯担心暴露，便同这批青年卷起铺盖离开这地方。村里的乡亲们恳请伯伯留下来过年，如果非走不可，可等到第二天再走。

这一天晚上，雾很大，面对面坐着都看不清脸。所有的人认为这种天气有好处，易于保密。离开村庄走了一段相当远的路程后，谁都觉得腿酸肚饿。伯伯跟大家说：“这儿隐蔽。我们且坐在这儿等一会……”

休息不到两分钟，天亮了，雾散了，一看，原来都是坐在田埂上，哪有什么隐蔽可言！大家立即起身赶路，向着祖国的方向奔去。

这一天下午，黎广波带着伯伯和这批青年回到了北坡。伯伯离开祖国已经 30 年，为了同祖国联络，曾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但都未联络上。多少年来一直在想念、期待，今天终于踏上了自己的锦绣河山。当越过边界的界碑时，伯伯激动万分。从这一天起，北坡山洞成为越南革命者的大本营。党的一届八中全会<sup>①</sup>就是在这里召开。还在这里办了短期干部训练班、游击战术讲习班，发展“越盟”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制订武装反对法、日的计划……

#### 四、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9 月，柳州监狱

1942 年 8 月，伯伯有事来中国，遭国民党逮捕。他被捆绑了整整 18 天，从这个监狱转到那个监狱，最后被关进柳州监狱。这时候，苏联人民正全力投入神圣的抗战中，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正在越南横行，我国同胞在双重压迫下痛苦呻吟，党和越盟阵线的工作正迅速扩展深入到群众中，而自己却蹲在中国反动派的一间牢房里，真是心急如焚。但这不是正经的牢房，而是一间狭小的禁闭室，紧挨着张发奎的警卫队，只有伯伯被监禁在里面。有一些受处分的国民党士官也被送到这里禁闭，伯伯便利用这个机会学“官”话。

伯伯同几个看守的卫兵建立了感情。他们把每餐剩下的素炒瓜菜带给伯伯吃，略为改善一下生活。最宝贵的是他们每天偷偷地把《柳州日报》带来给伯伯看。这是伯伯的精神食粮。伯伯通过这份报纸了解战争的消息。

1943 年 2 月，伯伯看到一条消息：经过 6 个月无比英勇战斗，

---

<sup>①</sup> 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主持这次中央全会。会议确定当时越南革命是民族解放革命，决定成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即“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团结各种反帝力量，把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和法国侵略者，通过局部起义发展到总起义。越党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译者注。

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了大胜仗，俘虏希特勒的士兵 33 万人。伯伯高兴地跳了起来，险些把头撞到牢房的椽子。伯伯自己决定必须以食来庆贺这个胜利。口袋里只剩下一元钱。伯伯把这些钱通通拿出来，请卫兵帮忙买一些糖果和炸油条（用一元钱只能买五角钱的东西，这是牢房的规定），作为一顿饭。伯伯在兴奋中轻声地呼了“布尔什维克党万岁！苏联胜利万岁！”之后，一个人坐下来快乐地“觥筹交错”。自此以后，伯伯把苏联的每一胜利消息，看作是从远方送来的使他精神上得到安慰的礼物。

我说：“伯伯啊，你坐牢时写了许多诗<sup>①</sup>，如果伯伯同意在报上发表，干部和同胞一定会很欢迎……”

伯伯笑着回答：“如果你们不提起，伯伯也都忘了。伯伯不是诗人，而且写的诗也不好。十几个个月被监禁在一间昏暗、冷清的房子，孑然一身，不准跟任何人谈话，没有事情做。要想‘旅行’，竖只能走 5 步，横只能走 4 步。为了‘消磨’时间，只能哼上几句，把狱中生活概略地记下几笔，以此消遣。怎么能谈得上诗。”

伯伯获释时（1943 年 9 月——译者注），视力减退，两腿无法举步。他决心练习走路。每日走 10 步。尽管拖着步走，也要走上 10 步才甘休。最后他不但能走稳，而且还能爬山。他第一次登上山顶时，高兴地写了一首汉文诗：《新出狱，学登山》：

云拥重山山拥云，  
江心如镜净无尘。  
徘徊独步西峰岭，  
遥望南天忆故人。

---

① “伯伯坐牢时写了许多诗”是指胡志明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9 月在广西被国民党监禁年余期间写的 100 多首汉文诗。1960 年 5 月，越南和中国为纪念胡志明 70 岁寿辰，出版了其中的 100 首（含出狱后写的 1 首）。中国出版的版本书名为《“狱中日记”诗抄》。——译者注。

## 新 书 选 介

《回忆邓小平》：本书是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同志撰写的纪念文集。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 125 篇文章，全面展示了战争年代，建国后 17 年，“文化大革命”10 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的光辉业绩、伟大思想、崇高风范和卓越贡献。全书 120 万字，1998 年 2 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德生回忆录》：该书是作者 1930 年参加红军至 1990 年离开国防大学第一线工作岗位 60 年的回顾与思考。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到中央工作、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批林整风、同“四人帮”的斗争等章节，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全书 31.9 万字，1997 年 8 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长达 20 余年，涉及近 2000 万人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本书运用翔实的资料，集中叙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分析了这一活动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定宜庄著。全书 38.6 万字，1998 年 1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该书根据历史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及其下乡后的经历。全书分“上山下乡的前奏”、“大潮涌起”、“再起高潮”、“大潮跌落”四部分。刘小萌著。全书 68.8 万字，1998 年 1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顾洪章主编。该书记述了

1955年至1981年长达27年间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事要事。收编的范围,以中央一级的工作活动为主,适当选编地方的一些重大活动和突出问题,真实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全书18.4万字,1997年1月由中国检查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上、下卷):韩泰华主编。该书对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的始末作了系统、完整的记述,并突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和贯彻执行情况,从中反映出党领导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艰苦奋斗和伟大贡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全书60.2万字,1998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中国现代史论稿**》:张注洪著。该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史料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形成的学术论述的精选。全书分5部分,共37篇文章。其中学术评述(国内外对中国现代史若干方面研究的渊源、特点、趋向、优缺点评述)和史籍研究(对中国现代史籍在收集、整理、考证、校勘、利用中产生的问题的研究论述)部分,尤见作者治学之功力。全书40万字,1997年11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中国民族工商业史**》:王相钦主编。该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专著。时限上起夏、商、周社会手工业、商业的萌芽,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革命根据地工商业、新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全书72.4万字,1997年12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荣刚 选介)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六辑

作者 =

页数 = 203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